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10

1 9 7 5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苏联的“经济改革” ·

- 苏修“经济改革”陷入绝境梁 锋(1)
时间的考验〔苏〕И·勃里亚赫曼(4)
苏联社会主义的公司化〔美〕利昂·斯慕林斯基(22)
茨罗宾工作法进工厂〔苏〕И·舒姆斯基(29)

· 商品货币关系 ·

- 苏联社会面面观北京大学俄语系(32)
汽车“死魂灵”〔苏〕《真理报》(33)
在“秘密”的掩盖下〔苏〕《真理报》(37)
机灵鬼是怎样得救的〔苏〕《真理报》(41)
在高高的木板围墙背后〔苏〕《真理报》(45)
他们多么恼火〔苏〕《真理报》(48)
救命啊!〔苏〕《真理报》(51)
值钱的手迹〔苏〕《真理报》(52)
你要“伏尔加”还是“莫斯科人”?〔苏〕《劳动报》(54)
熊的道德〔苏〕《真理报》(57)
能挣钱的洋娃娃〔苏〕《真理报》(61)

· 国际政治问题 ·

葡萄牙独立遭受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

.....〔美〕《号角》月刊(65)

德斯坦完全改变了法国反对欧洲政治统一

的看法〔美〕《商业周刊》(72)

第二和第三世界之间团结的加强.....〔美〕《号角》月刊(78)

安哥拉报道〔美〕肯尼思·L·阿德尔曼(82)

· 国外农业问题 ·

美国农业的困境.....〔美〕威尔逊·克拉克(101)

日本的幻想：食品自给.....〔美〕罗兰·A·米尔豪泽(106)

菲律宾的土地改革.....〔美〕本尼迪克特·柯克弗莱特(113)

* * *

西伯利亚散记.....〔美〕罗威尔·汤姆斯(127)

三十年后的广岛.....〔美〕K·M·克莱(133)

评罗斯托的新书：《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美〕唐纳德·F·戈登(136)

评松下幸之助著《如何挽救崩溃中的日本》一书

.....〔日〕《人民之星》报(141)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

——评马克思：《资本论》

.....〔俄〕伊·伊·考夫曼(145)

美国经济学动态(156)

苏修“经济改革”陷入绝境

梁 锋

利别尔曼的“经济改革”，自从在苏联推行以来，已经满十年了。十年“改革”，情况如何？本刊本期选译的几篇文章，可资鉴别。其中，苏联经济学博士勃里亚赫曼的《时间的考验》一文，既介绍了十年“改革”的过程，又供认了苏联国内一片混乱的“改革”情景，是难得的自供状，建议读者一读。

勃里亚赫曼的文章一开头就谈到，时隔十年，关于“经济改革”的评论，在苏联国内，依然是“众说纷纭，论调各异”。据他归纳，大致有四种观点。一是悲观派，“变化任其多，不脱旧窠臼”，认为“改革”并没有获得“大”的结果。二是乐观派，认为万事顺利，“改革”有为。作者指出，这多是一批不熟悉经济情况的书呆子观点。三是对“改革”持有异议：“是否非改革不可？”不满的情绪十分显然。至于作者本人，当然是属于“不偏不倚”的第四种观点了：虽然困难重重，却是“史无前例”，“非改不可”。摆出了一副复辟资本主义的死硬派的架势。

在苏联，为什么长时期来对“经济改革”一直是议论纷纷，这不是可以发人深思吗？在今日苏联，除了那些不着实际的“乐观派”以外，从上到下都无法否认，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企业自

治为特点的利别尔曼“改革”，已经给苏联国民经济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这从勃里亚赫曼的文章中就可看到：

大企业乘机获利，小企业亏损倒闭。小企业一无资金，二无权力，根本沾不到“改革好处”的边。为了图生存，避免受大企业的排挤，唯一的一条路就是“钻空子，在品种、价格和协作上招摇撞骗”。

生产脱节，市场混乱，贿赂成风，掮客横行，到处是一片追逐暴利的无政府状态。里加灯泡厂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九七三年，由于灯泡管底用的薄钢片供应经常断档，工厂被迫停工。是因为薄钢片的生产缺乏原料？是因为计划中的遗漏？是因为轧钢厂任务过重？都不是。原来，毛病出在轧钢厂嫌薄钢片“油水不足”。连勃里亚赫曼也无法否认，这是苏修不得不吞食的苦果。

企业大权在握，经理神气活现，给苏修中央统治集团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而后者不得不大叫难以“集中统一”。这种叫嚷，反映了随着“改革”而来的苏修中央和地方之间、部门和企业之间勾心斗角、激烈争夺的紧张局势。

这些，都是勃里亚赫曼的文章透露出来的。实际情况当然更要严重得多。但仅仅从这些透露出的情况来看，“经济改革”这个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步骤，给苏联国民经济造成的混乱也够触目惊心了。经济上的混乱造成了苏修统治集团的政治混乱。各种各样的药方都开出来了：有的说，依靠电子计算机的“神力”，可以加强“集中领导”；有的说，看来物质刺激不是万能的了；有的说，问题还出在现有“改革”本身。尽管各有各的药方，不过，根据作者介绍，被选中的还是进一步强化“经济改革”。这中间包括：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使企业在国家面前完全“独立自主”，即“国家对企业不负有义务，企业对国家也不负有义务”；实行联合公司制，由垄断企业干脆把各小企业并吞；强行

实施排挤工人攫取超额利润的“谢基诺试验”、“茨罗宾工作法”。一句话,进一步强化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制度。

这些“改革”的补充措施,都是在最近的两三年当中实施的。结果如何呢?按照勃里亚赫曼的说法,仍是矛盾重重,阻力很大,进展不快。这种形势,确实使苏修叛徒集团寝食为之不安。

事实上,苏修的“经济改革”早已陷入绝境。国民经济的一切混乱,完全是苏修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造成的。苏修的“经济改革”,是为了把苏联经济完全、彻底导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引起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加剧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已经而且将进一步激起苏联广大人民的抵制和反抗。这后一方面,是勃里亚赫曼之流大叫物质刺激不灵、“经济改革”失效的真正原因。尽管苏修叛徒集团进一步推广“谢基诺试验”之类的敲骨吸髓的措施,但可以肯定,这不但不能克服由于“经济改革”带来的国民经济混乱,而且必然更加激起广大苏联人民的仇恨和反抗。苏修“经济改革”崩溃之日,将是苏联人民奋起之时。社会帝国主义的寿命决不会很长了。

时间的考验

〔苏〕И·勃里亚赫曼

自从苏共中央一九六五年九月全会决定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在那一年出生的孩子现在都已在二年级读书。然而环绕着改革，人们依然争论不息。

三种观点

象在所有的争论中一样，关于经济改革尽管众说纷纭、论调各异，但逐步逐步地终于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较多的是企业的经理以及厂里的一些工作人员。“变化任其多，不脱旧窠臼”，这一条法国谚语也许倒是较为确切地表达了这类人对改革结果的悲观主义的情绪。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A·阿汉别基扬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介绍了在一次专门调查中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一千零六十四名企业经理所谈的意见。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人诉说，上级机关仍然象以前一样给工厂规定了必须遵守的成本、人员定额等各项指标；根据经济改革条例，他们这些企业领导者，理应是有权自行决定的。

《真理报》上的这篇文章指出，这种侵犯企业经济核算权的事件并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而是相当普遍的。同《国营工业企业条例》的规定相反，生产计划经常被调整，但财务指标却不作相

应的变更。这意味着吞没了经济核算制单位所挣得的利润。被征询意见的百分之九十的经理，包括几乎所有大工厂的领导人在内，至今还是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扩大各企业单位的经济权。A·阿汉别基扬指出，近年来，“有一些部门正在逐渐地回到被党谴责过的即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方针上去”，而对经济刺激提高生产的作用却认识不足。

第二种观点，是一些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专家、新闻记者等人的观点。一般说来，这些人惯于从总体上思考问题，但对生产的情况却不熟悉。改革正在顺利地进行，企业单位已转变为完全经济核算制。现在只要善于利用这种崭新的、极为有利的经营条件就可以了。

这一乐观主义观点的拥护者们拥有令人信服的论据：几乎所有的工业和交通运输单位都转入新条件下工作（那些计划亏损的矿场、林业局、实验工厂和一些在相当恶劣的条件下经营的经济核算单位除外）。在当前第九个五年计划里，许多建筑公司和部属科研、设计机构，以及许多商业单位和服务部门正在实行向新经济体制过渡。

例如，请打开一九七四年国民经济计划。社会主义经济的利润总共是一千零四十多亿卢布。其中百分之四十三点四留给企业支配，用于完善技术、扩大生产及刺激工作人员。经济刺激基金几乎占了利润和其他收入中的二百一十亿卢布，比一九七三年多百分之九点三。而且，按计划刺激基金的增长速度要比生产量快二分之一。这一切难道不是证明了改革的力量和现实性吗？也许，经理们关于经济机构不够完善的牢骚怨言只不过是企图用“客观原因”来掩盖那由于自己的不善组织所带来的损失。

第三种观点：是否非改革不可？也许，扩大企业单位的职权

是得不偿失，反而招致恶果？着眼于提高自己局部利润的经济核算环节是否纳入旨在为公众、为全国造福的中央计划体系内呢？

有这样的事实：苏共二十四大就曾指出，有一些单位为了追逐轻而易举的利润，肆意抬高产品价格。他们把产品改头换面，以次充好，标以新价，而又不因提高价格而受到统计部门的注意，因为这是另一种新的产品。但从顾客看来，这种新产品并没比老产品好，可是卖价却贵了。这种情形在器皿餐具、家具甚至在设备供应上，都是经常发生的。

怎样利用这笔不属于中央投资的利润呢？工厂有了钱，就可以开始建设。建设的项目则完全是根据工厂领导的需要：仓库、房屋甚至是专供来访的检查大员们休息的芬兰式浴室。这些，当然都不是按照中央计划的要求去支配紧张的建筑材料。于是，就造成了许多祸害：捐客，贿赂，最轻的也是按照“你给我、我给你”原则进行的非法交易。

上面的三种观点，都有事实为根据。

但是事实毕竟还不是全部的真理。要对改革的成就和问题作出客观的评价，只能站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不囿于几棵孤立的、即使是丰满粗壮的树木，而要把整个森林，从林间小道一直到最边缘地带，一起全盘考虑，才能得到。

改革的现实性

首先，那种关于在按新体制工作的几年中，没有什么根本性改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是闭眼不看事实。也许，因为这些人成天“泡”在经济生活的中心，所以他们对于这些潜移默化逐步而来的改革，没有明显觉察到。

我们把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四年比较一下。对于工厂集体来说有些什么变化呢？变化是很多的。

第一，评价企业工作的标准不同了。在一九六五年，实际上只有一条标准，即把工作的实际结果同计划相比较，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集体奖金是根据超额完成计划的情况而颁发的。

这种情况对于战前和战后不久那几个五年计划年代是适用的。那时要求不惜任何代价来完成计划，至于企业的潜力，上面是能够盘算估量出来的。但是今天情况不同了。仅仅依照超额完成计划的情况去给予评价，势必造成大家贪图任务轻，对计划机构和财政机构掩盖自己内部的潜力。而现代的大型工厂由于它那庞杂繁多的产品品种以及五花八门的复杂的技术过程，以致无论那一个检查员或视察员，如果没有工厂全体人员的帮助，都不可能发现它的潜力。“上面”尽管经常有些委员会到企业单位来检查，但是他们的大多数都是依靠“下面”厂里的经济专家们准备的东西来了解情况的。这不算是秘密吧？

现在对全体人员生产的评价是按三条相互有联系的标准来进行的。超额完成计划的情况，特别是那些燃料、金属、化学产品和民用的高级产品，在施行奖励时是要考虑这一条的，但也只能是评价的因素之一。奖励基金的基本部分取决于企业生产比上年增长的程度和在该部门及同类企业中所处的水平。

评价企业集体工作的指标体制调整了。在一九六六年以前，类似的指标有三个：总产值、商品量以及降低成本后的节约额。现在考虑的是产品销售额、利润、赢利率（即利润对生产基金值之比）。

这样的调整是什么意思呢？在改革以前，一切衡量标准都是环绕着产品数量的。因此，尽管一件制品也卖不出去，商品生产的成绩照样可以是出色的。如列宁格勒的缝纫机工厂，在一

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五年中，虽然他们的产品因质量降低削价销售仍无人问津，但由于超计划地降低成本，仍得到了大笔奖金。这些卖不出去的大衣和服装的削价所造成的损失大大超过了虚假“节约”下来的数目。可见，这种制度只是适应于战争前后那些年代的条件。那时，不管什么货物，人们都争相购买，根本不敢奢望什么超时髦的商品，不会去追求什么汽车的美观性。

现在的标准是建立在销售产品、即订户已付款的产品的基础上。没有结算帐户的进款，就完不成计划。这比无论何种训诫都更有效。虽然财务部门按传统在工厂行政机构里占据着最不引人注目的房间，但是今天在这里不仅看得到总工程师、设计家，还可看到工人社会活动家。人们千方百计地削减堆放在工厂仓库里的滞销品的数量。企业单位甚至不惜提高成本借以改进制品质量。至于改进质量所化的费用，自有顾客来付。比如列宁格勒的机床制造者们过去在降低生产费用的速度方面虽然无可炫耀，但是出口产量却增加了四倍，国家和机床联合业因此获得了额外的利润。

新体制还有一个优点。在此以前，各单位都对如何向国家取得更多的投资感兴趣，因为这有利于增加生产总额、增产商品和节约成本。而现在的赢利率指标的分母里是该企业生产基金的总值。大家都知道，分母愈大，分数值就愈小。各企业开始考虑把自己的申请同预期的利润相一致。在一九七四年苏联国民经济计划中，工业生产增长百分之八点六，利润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强，可不是偶然的。

第三个新事物——建立了平衡各单位奖励条件的机构。对于资本家来说，利润是鉴别成功的普遍尺度。滥肆开发丰富的油层，垄断新技术，向竞争对手保密，由此得到的利益，给私有者牟取了特殊的盈利。一切东西，成本越低就越有利。

对我们来说，只有跟企业工作质量相适应的利润，才是奖励该企业集体的标准。要做到这一点相当困难，因为企业的经营条件各不相同，而计算利润的卢布却彼此平等，对它们的来历人们是不作任何调查的。

基金收费，这是经济平等的第一个环节。企业每年必须将国家投资的机器、设备、储存和其他生产基金价值的百分之六上缴预算。投资越多，付得也越多。

借比较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而获得的利润也不能成为奖励的理由。拥有丰富的矿产区，廉价的原料、燃料、未经开发的采木区等条件的企业，要以地租和固定缴款的形式上缴一部分自己的利润。此外，国家对同一货物的支付的钱也有所差别。举例说，同一吨煤，一种是从顿巴斯和沃林狭窄陡削的矿层采掘来的，另一种是从库兹巴斯或是从耶基巴斯图兹丰厚的煤层里采来的，对前者付的钱就要多。

在许多机器制造部，工厂上缴给部的新技术基金是同它的产品销售额多少成比例的。而这笔基金经费的拨用取决于新技术在工厂规划中所占的比例。因此，经常带头为技术进展开闢新路的厂家，可以从那些老是跟在人家后面走路的厂家的利润中获取一份额外数目的经费。另外，由提高价格和出售旧的生产设备等方面而获得的利润也不用上缴预算。

最后，第四点……即使是悲观主义的经济学家，也不能否认在改革过程中建立的经济刺激基金的意义。在许多先进的企业里，每五个卢布的劳动报酬内就有一个卢布是由基本工资之外支付的，也即由改革所建立的奖励基金支付。企业的利润成为组成工人们收入的重要来源。

新的计划体制和经济刺激体制有助于克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某些不良倾向。资金周转的加快，促进了利润的增长，也使基

金效率，即每卢布生产基金的销售额不再降低。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上指出：“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党在实行经济改革时，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对完善国民经济的管理工作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同时还有许多问题远未解决。”

经济核算制过时了吗？

在整个一九七三年，里加灯泡厂由于作灯泡泡头用的钢带供应不正常，生产一直时断时续。申请书按时打了上去，基金也拨下来了，计划任务在负责供应的工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定径厂也得到了核准……但是钢带还是没有。写信到自己的部和冶金部去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倒是几家兄弟单位颇表同情，贷给了少量钢带。

事情出乎意料地解决了：关于这家工厂的苦恼反映到了《真理报》。一星期之后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运来了八十多吨钢带。里加厂总算完成了计划。但是这个完成是花了怎样的代价啊！工厂经理和他的助手们的绝大部分时间不是用于关心完善生产，而是去寻觅材料。请问，由于生产组织的不完善致使成千个小时都“付诸东流”之后，要说服工人们珍惜每一分钟难道是容易的吗？

《真理报》的工作人员对此事进行了调查。象通常一样，在开始时，负责供应的工厂推说任务过重，而部里，则借口计划中遗漏掉了。但是，最后还是搞清了：既不是任务过重，也不是计划的差错，其实是因为生产这种薄钢片无利可图罢了。一心想自己获利，供应者拣中了“油水足的”——拚命生产大规格的厚钢带。有利可图的订货永远是轧进“截止期”的。而没有“报告”的工作，那就得“从缓”，放在季度末或是年终。到那时再要完成

订货实际上已经不可能。

毛病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是原料资源缺乏吗？一九七四年的计划已经对保证国民经济的燃料、金属和化学制品的供应预先采取了措施。同时，还应看到，苏联在采掘煤、铁、石棉、锰和其他一些矿藏方面，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而焦炭、水泥、石棉混凝土板、钢筋混凝土以及钢铁、木材的产量，也是举世无双的。

是经营者和计划者的觉悟和纪律性差吗？苏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全会指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消除违反计划纪律的现象（包括破坏物资技术供应，财务计划同建筑材料、设备、燃料、原料、配套零件、金属供应的脱节，等等），也就是要抛弃所有那些因不负责任、低水平的领导、肆意挥霍人民钱财而造成的不良现象。

在一般的经济情况中，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并不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形式，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定径厂中断对里加厂薄钢带的供应决不仅仅是出于对奖金的喜爱。提前完成计划吨数，也就意味着得到上级对企业成就的嘉奖和赞许，意味着该企业领导者威信的提高。

但是，难道不能用电子计算机的调节力量去替代可恶的物质刺激吗？ACY（自动管理体系）这个新名词进入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几年。在一九七四年，自动管理体系还只有六百五十台，它们负责管理技术进程，管理企业，自动整理全部门的情报。自动管理体系的能量很大，它们能记下在所管的对象的成百项指标中的变异，即刻加工和记下所得到的资料，从成千种可行的活动方案中选出最佳方案来。但是，自动管理体系这种神奇的力量能否取代经济核算制，从而给每一个工人指出通向目标的捷径呢？

有些自动管理体系的设计家完全忽视他们活动中的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照他们的意见，改革管理的问题仅同加强电子计算机的能量有关，建立统一的计算中心网和加强它们的数据可靠性有关。至于经济核算制，照他们的意见，仅仅是在理想计划纪元到来之前的权宜之计。可是今天的一切，并不只是加加减减，套套公式，或是用电子计算机便可包罗一切的。否则，这岂非成了个万能的萨满教者了吗？

即使是站在数理经济学的立场上来看，这种经济核算制过时论也是不经一驳的。按照经济控制论的奠基者之一诺沃日罗夫的计算，苏联国民经济分配资料的可能方案的总数达 10^{600} 。十的五百次方，这是一个天文巨数，比至今为止科学可知的最大的具体数目——可见世界的原子数还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管怎样的电子计算机思考体系都不可能在一个可能接受的期限内计算如此繁多的方案。因此，关于中央统一领导各企业所有的业务活动等想法只是幻想，至少在目前一代的时期里，它是实现不了的。

在国民经济的所有环节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这是苏共中央一九六五年九月全会规定的极其重要的改革方向。完全经济核算制是国家同企业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它是建立在经营单位的经济自主、收支完全相抵、物质上的利益和责任这样一些基础上。在通向这样的经济核算制的道路上，我们暂时还只是迈出了最初的一步。

在完全经济核算制条件下的经济独立，意味着企业资金在经济周转中的实际独立。这种独立原则是在列宁的一份法令中指出过、并且载入现行的章程中去的：“国家对企业不负有义务，企业对国家也不负有义务。”

这条原则丝毫不会危及较为重要的中央计划任务，也不意

意味着经营单位的完全独立自主。那样的自主，象实际表明的，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某些个别的企业集体对工厂私自占有的合法化，而这是列宁绝对反对的。

在改革前的有限的经济核算制时期，经营管理的独立性是由自负盈亏、独立的财会制度、银行结算帐户、法人权等来保证的。对于经济上的这些独立性，现在已显得不够了。还需要一套经济标准，这些标准给企业同社会间的支付和交换确立一种长期的、明确不移的依赖关系。这些标准应在“业务法规”中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对在同一条件下经营的企业集体来说，理应是唯一的标准。当企业了解到所有的利润、除了偿付社会提供的原料费用之外，全将留归其支配时，它就会努力完成紧张的计划，并力争向国家要得少些，向社会给得多些。

收支相抵……在有限的经济核算制时期，它仅仅跟日常的原料消耗、工资报酬等有关。以贝加尔纸浆造纸联合厂为例。该厂的销售进款大大高于其开支。照现在的标准，因它的高赢利率是可以受到表扬和奖励的。但是，除了日常开支以外，还有预先垫付的、一次性的开支，如用在基本建设、科研、干部培训、勘探、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再生产，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它们在生产的总开支中成了主要项目。如果考虑到这些开支还是由国家预算予以负担的，那末，对贝加尔纸浆造纸联合厂的贡献的评价就当另作别论了。

收支全部相抵，这就意味着企业用自己的收入偿付所有的生产费用；投资以长期贷款的形式得到，并要保证归还；为所用项目支付科研机关研究费用，偿付培训专家的支出；偿付使用农业土地的有关费用；保持水源清洁的费用；偿付所有被利用的自然资源。

实行那样一系列的付款后，当原有的专家不顶用时，企业也

不会申请新专家了，因为它觉得不合算；它将在工地上寻找荒地，而不去向执委会要求征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土地；人们对于采用新技术有何好处将会另有看法。

而最为主要的，由于实现了完全的收支相抵，最终将出现一条可靠的统一标准来评价企业集体的工作。它还将使物质上的利害关系能建立在企业集体自己创造的收入来源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上面拨下来的、严格限制的工资基金的基础上。这样一来，工资便成为名副其实的工资了。

物质责任至今仍然是公认的经济核算原则。但是，目前的罚款、违约金的计算取决于违约产品的价值，因此，里加灯泡厂对自己的供应者所能提出的那份起诉，也许还不能抵偿损失的百分之一。完全经济核算制要求：造成了损失，就得用自己的利润和奖励基金去赔偿。

改革的基本环节

经济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为适应科技革命的要求调整领导经济的方法的相当长期的过程。这样的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有幸首先把它的成就跟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在这条道路上不可避免地要有探求和牺牲，有所发现和试验。回顾在它的幼年所写的许多文章，今天显得多么幼稚可笑啊！

那种相信几项决议便能改变几十年来形成的经营体制的想法是何等天真！

体制这个东西，首先是关系到把它付诸实施的人们。要改变人们的思想和风格，发扬普遍的创造性、经济上的首创精神，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而进行普及的经济教育、建立领导干部

的培训网,用对待竞赛的态度去替代工作人员之间、各企业集体之间的劳动竞争,则是这条新路上的路标。但是,直至现在,习惯势力、未能灵活运转的经济机构,正如苏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全会所指出的,还在妨碍我们去解决新的任务。

很多经济学家在谈及改革时,只是着眼于评价奖励指标的调整。某一个“神奇的标准”,如定额加工价值,赢利率或“每人基金产量”同扩大经理的权力和不加限制的奖励相结合,经常被看作给一切工厂解苦救难的灵丹妙药。

然而一切远非如此简单。

无论是谁也没有找到一个万能的评价指标,而如果当企业集体不善于或不能够对生产实现改造时,那么奖金刺激也就无能为力了。今天大家都已明白:改革决不单单是一个刺激的问题。这是一套统一、完整的、能改善所有的经济机构的方法体系。

企业是基本的环节。正是在这里生产物质财富并体现新办法的效果。但是目前的经济基层组织是什么样的呢?五万家工厂、矿井、矿场中,有三万家不超过二百个工人,这里没有任何的科技组织。五万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收获季节里感到干部极端缺乏,而在冬天却又不知道让工作人员干些什么。五千五百个科研院所和同样多的设计院、三万个建筑机构、一万二千五百多个试验基地,四千多个安装公司……科研院所把总结和专题学术报告束之高阁,设计师、建筑师和试验基地,也把它们的图纸和试验样品束之高阁,他们中无人对科技问题的决定自始至终地担负责任。

经济基层组织的分散性是改革所遇到的根本障碍。正是因为这些小厂小业不会内行地支配自己的新权力,从而给改革的设想投下了阴影。

既然是奉行同一个条例，那么所有的经理表面上得到的可能性应该跟，譬如说，基辅厂的领导人是一样的。但仅只是表面而已，而不是实质上。有三万家企业没有自己的设计师、工艺师，甚至没有实行新技术的计划。大的科研机关和建筑组织认为不去同那些既无真正的资金又无全国性威望的订货者联系是理所当然的。结果，这些小经济企业为了获得奖金常常只有一条路可走，利用自己的权力钻我们计划机构的空子，在品种、价格和协作上招摇撞骗。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只是没有载于报章杂志上罢了。

我国工业在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五年将进行原则性的调整。四十五年来，是第一次对企业的本质实行改变，而不是改变隶属关系和领导的名称。现在起作用的已不是早先的生产基层组织——工厂等，而是生产或科学生产的联合公司——统一的经济综合体。

现在谈的是组织起来的新型的基层组织，它含有工艺技术锁链中的好几个环节。确定联合公司组成的是经济上的合理性，而不是部门和地区的配置。例如：“斯威脱拉内”公司的专业是多向电子仪器，其中每一部分都有一个同生产车间结成统一的整体强有力的设计机构。在托尔柯维契村有一家自己的玻璃工厂，它保证玻璃的供应。强有力的设计局为生产电子产品详细研究了自动装置，它们就在自己的装配车间里生产。

试分析一个与普通工厂经理有关的情报。从根本上来说，这只是些外部的情报，它们跟无数的供应者、加工者有关。实质上这些事情从外部决定了企业集体工作的效率。在联合公司中，许多这样的外部联系成了内部的、由公司领导监督的联系。对于这样一个能对事业负责，而不将责任推委于败事的“隔壁大叔”的经济单位，自动管理系统才能成为现实，因为电子计算机

能够管理的仅仅是独立自主的，时时刻刻都不会因外界的原因而中断自己的活动的综合体。

联合公司其实是科技基层组织的一种新形式。迄今为止，这个组织是对“研究——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负责：科学研究所负责按期交付科学报告并作相应的推荐；设计局负责制作新机器的图纸，实验工厂负责生产样品。在一段时期内，这样的安排曾经是唯一可行的，因为从科学设想到投产需要十五年至二十年。无论哪个工厂都受不了在自己的单位里设有这样一个需要等几个五年计划才能出成果的科研车间。这个车间势必被中断科研，而转向生产现行产品。

今天，正象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所表明的，在合理的组织下，科研生产的周期只需花三至五年。把科研同生产结合起来，今天已成了必行之势了。

在一九七三年，苏联有百分之九十四的科学工作者脱离生产实际在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工作。而在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五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在科研生产的综合单位工作，他们的产品不是报告，不是图纸，而是新的技术、操作工艺，新的生产组织和新的产品。

也许许多设计机构的命运也将改变一下。这种组织创建于三十年代，当时需要安装从国外买来的设备。他们同本国科学没有实际接触过。今天，在整个对外贸易中，十分之九的设备是按苏联学者的设计制作。因此，设计家们的位置应该在联合公司，那里有强大的科学基地和专门的建筑安装管理。

联合公司是新型的经济核算基层组织。只有经济独立、完全收支相抵和其他一些完全经济核算的特征才是可以思议和可行的。只有在大型综合体的范围内才能确定全部费用和经济活动的最终结果，这两者的比较即是经济核算的基础。只有这样的

综合体才有能力同供应者和订购者直接打交道，研究需求的长期趋势，以及象“基洛夫”厂和“瓦斯”汽车厂一样，关心技术服务和维修出售给国内外买主的机器……如此绝对的断言决非理论家们的无谓空想。仪器制作者们的经验可以作证。这里起先是全联盟的工业联合公司，而从一九七〇年起，全部工业经济综合体各部门均转为收支相抵。国家仅指定三项指示性指标（品种扩大以后的产量，生产中的固定资金量和物资供应量）。五年计划中还有两项长期定额：部门支配的利润的扣款（一九七〇年是百分之五十九，一九七五年是百分之三十三），每卢布商品的工资耗费额。联合公司从预算中什么也得不到：投资、发展科学技术、管理机构的维持——这一切全由本身资金拨款。企业必须归还所有从部的集中基金得到的东西。同时部完全不干预企业的业务管理，它还要向它们赔偿因变更计划等而造成的损失（有时这种变更对整个部门是必需的，但对厂方却有亏损）。对企业，那怕只是一项指标未完成的企业，奖金也要减少百分之三到五。

这项试验有许多方面令人不习惯。放弃工资基金计划……部对自己的企业负物质责任……但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三年的工作结果是：劳动生产率增长半倍，利润增长了一点三倍（工业上如此的增长需整整一个五年计划才能达到），在一九七三年，仪器的价格降低，管理机构精简了（从占工作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点八降至十一点九）。

一九七三年，苏联的联合企业已有九百个，其产量仅占百分之十三。在整体化的道路上主要面临着心理上和习惯势力的障碍。当把一个组织分成好几个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为之忙碌操劳、喝采鼓掌，证明改建的合理而联合公司遇到的则是反对者。问题甚至不在于物质收益。进入综合体的领导人员的工资并没下降，但是他们失去了直接接触上级领导的权力。

在五年计划的末期，一种新型企业——生产和科学相结合的联合公司在我国工业中将占优势。这样改革将最终得到同其实质相符的组织基础。

转向新的任务

经济改革的设想是在那些年代里产生的：当时，苏联经济许多部门的发展是依靠着一些粗糙的因素才得以保证的——如招募新工人，补充原料资源的使用，新地区的开发。即使是现在，国民收入每增加百分之一，就得增加百分之零点二到零点三的劳动力和百分之一的原料，而生产基金的价值甚至得提高百分之一二到一点四。

但是七十年代发展的条件已起了本质上的变化。在俄罗斯（除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河流域几个共和国之外），在北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除几个西部省份外），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劳动力的自由资源基本上已消耗殆尽。妇女已占当地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二到五十三。农村青年数量已不多，而完成农业工业化却极需农村青年。这一地区的出生率稳定在大多数工业国所特有的不高的水平上，并就其将来情况而言，也不会有任何“突破”。

我国的矿物蕴藏量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我们不知道经济危机。但是资源的开采费用越来越昂贵。已经不是从巴库和伏尔加河流域，而得到遥远的北方沼泽地去开采石油。已经不是从萨拉托夫和哈尔科夫，而是从中亚的沙漠和伯朝拉的冻土地带铺设天然气管道。矿井越来越深，矿物越来越少，运输路程越来越远。今天每节约一卢布的资源就能给国民收入补充三个卢布（以开采企业的建设和运输费用的支出计算）。

七十年代苏联成了地球上第一个建设强国。投资的规模超过了美国。但是即使在这里也还有另一个不足方面。主要是因为建设期限的拖延，设计能力的掌握问题和设备使用率仅为一到一班半，所以我们的投资额比起我们的竞争对手——西方国家，还多得多。

勃列日涅夫在纪念苏联五十周年的报告中说：“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大幅度改变方针，把重点放在领导经济的强硬措施上，以此保证经济效率的严格提高。”

改革的机构至今还不能充分促使这些任务的解决。它首先致力于抓数量“总额”指标（销售、利润等），但对提高这些指标所花的代价，尚缺乏应有的考虑。要改善这个机构首先应对所进行的试验报告予以仔细的考虑。

在新的工艺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基础上裁减工作人员，这就是一九七三年两百多家企业照谢基诺化工联合企业那样所进行的试验的目的。业已表明，花几年时间便可裁减约五分之一的工作人员而不给计划的完成带来损失。由此节余下来的资金须留归企业集体，用作工作人员的奖金和补贴。

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中，因实行了新的工资率和适当的工资额，工业部门平均工资将增加百分之十一，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工资增加百分之十八（设计师和工艺师的工资增加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谢基诺试验的方法将成为标准。对兼职给予的补贴还将使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们的工资提高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

应该完全同意著名的经济学家格·阿·库拉金的意见。几年来，他以充分的事实和经验论证在高等院校的科系内大量地培养蹩脚工程师的不合理性，因为这些高校既无严格的科学基地，也无试验生产的基地。

今天在苏联高校学习的大学生人数三倍于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数。在美国、日本和西德,两者之比正好相反。工业部门提出申请,因为年轻工程师比具有熟练技能的工人少得多,而领导者的威信还取决于他属下的获得文凭的工作人员的数目。但与此同时,工程师有一半时间是在推车子,当调度员和事务员。因此并不偶然,三分之一的工程师职位由未受专门教育的人占据着。许多院系、中等专业学校本来大可成绩卓著地培养技术员、专业工人。为什么在关着老虎的笼子上写着“狮子”呢?给一个将从事“收发”的姑娘学习重要而必须的科目——管理学,不是比让她去无休无止地钻在高等数学和理论力学的“牛角尖”里来得更妥当些吗?培养一个好车工,不是比培养一个在无关紧要的职位上混日子,而薪金又低、技术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更好吗?

苏共中央一九六五年九月全会和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全会相隔八年时间。前者开辟了改革的道路,后者则根据新的条件、积累的经验以及对这个极其复杂、多种结构的现象——社会主义经济机器的进一步认识,指出了调整改革的途径。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第四期苏联《涅瓦》杂志 谢天振译)

苏联社会主义的公司化

〔美〕利昂·斯普林斯基

“什么，这又是一次改革吗？”一个研究苏联经济史的学者，也许会把一九七三年四月颁布的部级管理制的改革，看作是又一次的行政更动。他以为这种更动只会影响到日常文件的收发，而不会触及到内在的经济现实的基础。

然而，这次改革却是四十年来同类措施中意义最为重大的一次。以前苏联工业组织管理的多次改革，涉及的范围虽广，但归根结蒂，无非是把一块块的积木（各个工业企业）换个地方，重新排列一下罢了。

每个企业对完成上级分配的指标，都要承担法律的责任。但是国家计委、部、甚至一个总管理局，却不会因自己的瞎指挥和计划脱离实际而承担任何法律和财政上的责任。经济核算原则，实际上只停留在工厂和矿山等这一级的生产单位。这样，在基层的生产单位同它的上层管理机构之间，就出现了严重的脱节现象：前者承担义务，后者享有权利。确实，柯西金一九六五年的那套改革，旨在把某些决定权下放到企业一级。但许多苏联经济学家认为，只要各个企业在规模、效率、历史和能力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差距，那末，任何有意义的权力下放，都是难以贯彻的。据认为，特别是对那些小型企业来说，它们要完成柯西金那套改革，还缺乏广阔的见识、经营企业的才能和充分的资金。并且，到一九六八年为止，苏联工业企业的百分之五十六点四，雇

用的工资劳动者都在两百人以下，它们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一点六，利润的百分之七点九^①。一个小型企业，哪能是一个部或一个总管理局的对手呢？说真的，只要高兴，不论部还是局级机构都能指手划脚，要小型企业围着它转。

难就难在这里：一方面，大多数工业企业甚至小到连近年来所推行的少得有限的权力下放也无法利用；而另一方面，从计划制订者的角度来看，则现有的企业又多得无法进行最理想的集中计划工作。

因而，奇怪的是不论是权力集中论者还是分散论者，双方都赞成大力削减企业数而扩充它们的规模。

* * *

四月改革在体制上的指导准则，由于允许很多例外情况的存在，就有某些难以理解之处。

按照这次的改革令，无论是作为苏联工业体制基础的企业，还是从十月革命之日起由列宁亲自倡议作为在企业 and 部之间的中间环节的总管理局，最迟都必须在一九七六年内撤销。在改革令正式颁布后的六个月内，各部必须拟定今后各自组织机构总的方案，具体选定采用两级或三级管理体制^②。

这次体制改革的主要媒介物，就是所谓“生产联合公司”。它代替企业成为贯穿苏联工业的基层单位。“生产联合公司”是把从事制造相关产品的和在地区上不太分散的许多企业合并起来而组成的。公司中的某一个企业，通常也就是其中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那个企业，被指定为主要企业；它管理着整个公司的业

① 苏联中央统计局：《一九六九年苏联国民经济》，第一八〇页。

② 法令全文见一九七三年第十四期苏联《经济报》第三、四页和第十一、十二页。在某些消费品工业中，允许提出四级管理方案。在某些无法成立生产联合公司的工业中，有些企业仍可继续存在。

务。其余企业通常就此失去了它们的法律上和经济上的特性，仅仅成为主要企业的一个分支机构。研究院、设计所和建筑企业也可以作为它的成员而并入生产联合公司。原先，这些单位的活动往往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相互间又缺乏协调；目前是，“生产、研究、设计和建筑都有机地溶合在一个统一的、综合的经济机体内，即联合公司之中了。”^①

生产联合公司可不是苏联经济舞台的生客。从一九六二年起，已组成有一千一百个了。它们合并了四万五千个工厂（约占工厂总数的百分之九，约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二）。它们在某些工业部门（占汽车工业产值的百分之四十二、轻工业的百分之二十六）和地区（占乌克兰工业生产四分之一）中，已显得颇为重要了。^②

新法令允许每一个部在两种组织形式中选择其中的一个。在两级方案下面，全部企业都分别被并入各个有关的生产联合公司，而生产联合公司则直接受部的管辖；在三级方案下面，则在原先的生产单位和部之间还增设了一个中间环节，叫做“工业联合公司”。它包括了全国或者一个大加盟共和国生产某种类型产品（如滚珠轴承）的所有企业（前者称为“全苏工业联合公司”；后者称为“共和国工业联合公司”）。据最近透露，只有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这三个最大的加盟共和国，有权成立共和国一级的工业联合公司；并且这些工业联合公司主要限于服装和乳制品等消费品。^③

① В·И·戈斯捷夫，见一九七三年第十五期《经济报》第三页。

② 德勒其钦斯基在一九七三年第二十二期《经济报》第七页上的文章；В·谢尔比茨基在一九七三年第六期《共产党人》第二十五页上的文章。

③ 见前引德勒其钦斯基的文章。采用三级方案的是这些工业部门：它拥有大量专门化企业的工业部门（如乳制品），或者经济上不值得成立生产联合公司的工业部门。

除了生产单位本身外，工业联合公司往往也包括了一些为本工业部门服务的专门研究所、设计和建筑单位。目的是对工业发展提供完整和统一的指导，即从生产前筹备阶段的研究开始，经过新工厂、新设备、新产品的的设计，直到规定基层单位的活动，乃至代表基层同国外的计划部门、供应部门和销售市场打交道。所谓基层单位，或者是指各个企业（是指企业被允许继续存在的那种意义重大的例外情况）或者是指各个生产联合公司。

全苏工业联合公司由全苏的部筹设并委派它的总经理。他得到一个由各组成单位经理构成的理事会的协助，负责协调各组成单位和整个联合公司之间的利害关系。理事会根据多数表决所作出的各项决定，总经理有权给予否决。总的生产指标、物资供应和银行贷款都是把联合公司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配的；然后由联合公司根据它所规定的有关定额在组成单位之间按计划进行分配（必要时，可以重行分配）。它的机动灵活在于有权处理那些自行掌握原料、燃料和设备的集中储备，并且保留一定数额的银行贷款和一笔后备的工资基金。工业联合公司的经营自由更加扩大了。工业联合公司也可自行处理由扣克各组成单位利润而积聚起来集中使用的各种基金，即：用于发给奖金的奖励基金；用于扩建老厂、兴建新厂的发展基金；用于研究和革新拨款的基金；最后，还有一种用于促进出口的特别基金。同供应者和购货者所发生的交易行为，也同上缴给政府预算一样，它既可以由工业联合公司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也可按选定的办法由各组成单位单独地来进行。

* * *

为了阐明联合公司进步性而提出的一个论点，就是联合公司很类似资本主义的多厂公司，而后者则“已经成为世界上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的基本生产单位了，并且反映了科学革命和现

代工艺技术的需要”。^①因而，在人们期待苏联企业合并的许多利弊之中，有一些是每一个研究资本主义组织的学者所熟悉的；而另一些则又反映了苏联资源分配制度的许多特色。

特色之一，就是苏联经济的二重性，它既拥有由大企业构成的现代化部门，又存在着由小单位组成的次要的、低效率的落后部门。

进行合并的意图主要是，把一个规模大、效率高的主要企业同许多个小单位并在一起，从而“把大量生产的优点推广给所有小厂”，^②用来消除落后部门。每个小厂就将成为在一个狭小产品范围内能进行有效的生产或运转的专业化单位。这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在各组成企业间重新分配设备、干部和物资供应以便各尽其用；同时，也把各组成企业的存货和货币基金储备合起来打统仗，从而减少单位产品占用的资金量。^③把会计、销售和市场研究集中起来，就可进一步节约开支并便于电子计算机化。

各研究所成了联合公司的组成部分，而不再是没有利害关系的旁观者，这就推动了技术进步。如在列宁格勒某些联合公司中，新产品因议而不决迟迟不能问世的情况，减少了一半乃至三分之二。^④

联合公司被准许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外国企业直接打交道并参与制订出口计划。它们享有较好的专利劳务权和更多机会获得最新的外国设备。^⑤

最后，由于把各组成工厂的党支部合并成一个强有力的党

① 见 I·波波夫在一九七一年第十二期《经济问题》第一〇三页的文章。

②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消息报》。

③ 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八日苏《巴库工人报》。

④ 见前引波波夫文章第一〇一页。

⑤ 一九七三年第十一期《共产党人》社论。

委,结果是“党对具体生产所作决定的影响也就加强了”。

改革本身引起了种种困难。

到目前为止,联合公司是社会主义的公司,可是,还没有一个公司法。立法工作不但没有为经济实验扫清道路,反而落在经济实验的后面了。因此,联合公司迄今还受有关企业法令的约束。^① 一个重要的计算机联合公司总经理抱怨说:虽然分配给他的任务都是很了不起的,但他还是象一家小企业经理那样缩手缩脚,因为“各联合公司还是象过去那些小企业一样,仍然由上级分派着和小企业相同的中央计划指标和相同的成绩指标”。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三日《苏维埃白俄罗斯报》)

许多资本主义公司所特有的那些垄断倾向和弊端,已经明显地表现在苏联某些部的活动之中了,而在那些分工较细的专业联合公司中很可能变得更为显著。^②

从属于联合公司的各个研究机构,无疑会使它们的研究工作同当前生产更为密切配合;但是,它们新头头的注意力却是着重于眼前拿得稳的成绩,热中于取得盈利,这就会导致对基础研究工作和理论探索的忽视。由于研究人员都把精力集中到一家社会主义公司的那些实际问题上面,结果“就没有一个人能分出身来,去研究那些有益于许多工业部门并具有普遍意义的题目了。有些科学家表示担心他们会在生产中被‘溶化’掉,科学会就此枯萎下去”。^③

现在谈一下苏联领导在考虑联合公司问题时的主要轻率之处。就是主要企业要在继续管理它本身的同时,还要管理联合

① 一九七三年第十一期《共产党人》杂志第三十页;一九七三年第六期《计划经济》杂志上拉贝捷夫一文(第九十二页)。

② 参看一九七三年一月十六日《苏维埃俄罗斯报》第二版。

③ 见前引波波夫文章;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真理报》。

公司的事务。它的设想是，预定要成为主要企业一级的那些现代化大工厂还有更多的管理能力；它们的行政管理人员还有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些新的繁重任务。这种设想是缺少根据的。

两个缠在一起的问题已经暴露无遗了。要成为联合公司的那些未来组织者和领导者早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了。此外，他们对联合公司应该进行的经济分析和长期规划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这里也存在着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的公司是否就能在实质上简化苏联工业的官僚主义上层建筑。例如，当总管理局解散后，人们原想它们那里的专家们会向写字台告别而走向生产岗位的。但是实际情况又怎样呢？根据某些调查报告来判断，他们就象玩抢座位游戏那样，只是简单地换了一个座位而已。在乌克兰钢铁工业总管理局撤销后被解职的那些专家，一下子就上调到部里去加强它的机构了。^①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冬季号英国《综览》季刊 陈中绳译）

^① 这是那位部长自己叙述的，见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六日《工人报》。

茨罗宾工作法进工厂

〔苏〕И·舒姆斯基

编者按：所谓“茨罗宾工作法”，是近几年来在苏修资本主义土壤上长出来的一株新毒草。按照这个“工作法”，工业中几十人的生产小组或工段成了“核算”单位，同厂方签订合同，承包任务，无论盈利、亏损，自负“物质上的责任”。同所谓“谢基诺试验”一样，这个所谓“茨罗宾工作法”不过是苏修统治集团强化工人劳动强度、残酷剥削工人的一种新手段。

莫斯科建筑工人尼古拉·茨罗宾在劳动组织方面倡议实行工作队核算的方法，已在苏姆州阿哈德尔工厂里被列奥尼德·波克伦斯基领导的综合工作队采用。《真理报》对此曾作报道。这种新工作法实施一年来，给机器工人们带来些什么好处呢？

工作队共六十八人：有车工、镗工、铣工、刨工、磨工、装配钳工和焊接工。总之，这里有完成整套生产所需的各种专业工人。大伙本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原则从事劳动，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对承担的生产项目负责。

工作队成立以前，车间日产不同规格的减压阀两千九百十六只，现在日产量是五千五百五十四只。电缆包装机和带式传送机的产量，前者从二百九十五架增加到四百八十架，后者从五十四架增加到八十五架。备用机器零件的生产增加了一倍多。

工人人数减少了。工作报表从一万八千份减到一百二十份。

工作队要求行政对生产定额再行提高。缩减掉四万五千个定额小时。在“茨罗宾工作法”实施期间，大家的工资报酬获得显著提高。

现在，追随列奥尼德·波克伦斯基的大有人在。邻近的翻砂车间和锻造车间决定联合组织一支车间之间的包产工作队，负责产品生产的全部工序，并把产品送入成品间。不久前还成立了一个自动电话亭和配电箱的装配、油漆、烘干综合工作队。波克伦斯基的倡议受到州委会的支持，并已在一些工厂推广，如：别洛波利耶机器厂、科诺多普“红色金属工人”厂以及以“伏龙芝”命名的苏姆州机器制造厂等。哈尔科夫市及第比利斯市的机器制造工人也来此取经。

革新的倡议者、工作队的成员们这样议论着自己的工作法：工作队长И·波克伦斯基说：“一年来集体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二十七。大家处处表现出对生产成果十分关心，表现出对集体事业的高度个人责任感。”

党小组长А·纳契温说：“劳动时间的浪费大为减少。旷工现象已根绝。工作队召集的进行教育的会议受到大家重视。”

共青团员们说，在他们倡议下已掀起一个掌握几门相近专业的运动，青年们要学会操作各种车床、铣床、磨床。

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哈尔科夫分所的一些专家们的意见是这样：工厂成立工作队的经验，即“茨罗宾工作法”应用于机床制造业的做法，已有充分理由证明；建筑工人所倡议的新经济核算形式是完全适用于机器制造工业部门的。工作队集体和行政之间通过合同方式组织承包工作，这是经济改革的一大发展。这种改革旨在最大限度和因地制宜地利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潜力。特别应该指出：承包合同不仅只是预先规

定按期完成生产任务,而且还应规定需要达到的高质量指标,尤其是减少产品成本和劳动强度。

“茨罗宾工作法”应用于机床制造业这一事实,标志着这种方法正在扩大它的应用范围。

(摘自一九七四年十月五日苏联《真理报》 方子汉译)

苏联社会面面观

北京大学俄语系

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为了加深对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认识，我们查阅并摘译了近二、三年来的苏联《真理报》等报上的部分文章。仅仅从苏联报刊自己披露的这部分事例中，也可以看出，苏修叛徒集团竭力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大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以致在苏联的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党政机关中，在文化教育卫生部门中大批地产生出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严酷现实，充分说明了勃列日涅夫之流鼓吹的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货色。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不管苏修叛徒集团如何倒行逆施，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终归是短暂的现象，苏联广大的人民、党员和干部必将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旗帜，推翻修正主义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的红旗必将重新飘扬在克里姆林官的上空。

汽车“死魂灵”

别兹柳季科曾一度担任罗夫诺州戈夏区“日丹诺夫”集体农庄总工程师的职务，然而却长期住在基辅市的多罗戈日茨卡亚大街。可是，他常常是既不在基辅，也不在戈夏。他坐上飞机往返于莫斯科、杜尚别、塔什干。在这些地方，别兹柳季科跑遍了各个部，进出于各管理总局和其他机关，到处探问道：

“请问，你们这儿有没有那种要报废，但还没有上报的旧汽车？”

“你想要什么？就直说吧！”

“什么都想要：载重汽车和自卸卡车、大轿车、嘎斯牌越野车、轻便运输车，还有带斗的摩托车，不带斗的也行……”

假如现在是乞乞科夫的时代，汽车“死魂灵”的买卖双方讲好了价钱，就算拍板成交，接着就可以着手订立契约了。而现在，办理成交手续需要有关领导机关的证明信、有关方面的批示。总之，需要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证件。

好吧，既然要证件，那就得去搞。于是我们这位主角就经常在基辅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农业部出现。他跑遍了各个办公室，拉关系，暗中察看着有什么东西随便扔在桌子上。在这里果然随便放着盖有部的公章的公文用纸。在短短几分钟内，别兹柳季科就用打字机打好了给苏联土壤改良和水利部部长的信，然后又替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农业部副部长签了字，这样，“证件”就准备好了。别兹柳季科又动身去莫斯科。在他的口袋里放着一笔交际费，几只篮子和手提箱装满胡椒浸的伏特加酒和各种

食品。

唉，在很多大机关里就有那么一些人，总是想让人请吃请喝。这位汽车“死魂灵”的批购商就是用白兰地酒，同苏联土壤改良和水利部经济管理局副局长佩图霍夫交上了朋友。有一次，佩图霍夫和别兹柳季科到“全苏医学技术联合公司”商业组织处处长勃雷金那儿去买眼镜。眼镜挑好以后，他们决定在饭店里庆祝这件医疗上的大事。话题不知不觉地从医疗方面转到汽车方面。客人小心翼翼地探问，在勃雷金主管的部门里有没有报废的汽车。

“有！”勃雷金回答说，“而且是完全能用的。您知道，急救车连有一点意外损坏的可能性都是不行的。”

“您能帮我弄到就好了。每辆车我给一百卢布。”

事隔不久，就在“全苏医学技术联合公司”的走廊里，别兹柳季科亲手交给这个联合公司的商业组织处处长四千卢布的现款。而这位处长也帮助那位同伙在自己部里弄到了二十三辆汽车。还有勃雷金的一位熟人——邻近的一个部的一位科长斯捷克洛娃也设法给他弄到了五十五辆汽车。

别兹柳季科在农业部、石油工业企业建设部和煤气工业企业建设部的每个办公室里，已经混熟了。这里同样也不怎么注意把正式公文用纸收藏在办公桌里。别兹柳季科带着一大叠署有伪造批示的假信奔走于各个企业、办事处和汽车队，凭着这些批示总计能搞到二百四十六辆汽车。在土库曼的塔赫塔-巴扎尔市和莫斯科近郊的柳别尔茨，在急救车站，在特种地质物理勘探托拉斯第一地质化学勘探队，在哈萨克斯坦的谢甫琴柯市和达格斯坦的基兹利亚尔城，在“乌克兰煤气设备建设局”和杜尚别警犬驯养场……他都弄到了报废的汽车。

我们的这位主角到处追逐廉价的汽车“死魂灵”的目的何在

呢？如果我们，比方说，到罗夫诺城，无意间去“和平”饭店走一趟，就全都明白了。瞧，我们这位主角坐在靠窗户的桌子旁，喝着伏特加酒。和他一起的还有两位我们不认识的公民。但是，他们在州里都是相当有名的人物。在这里，谁不知道杜勃诺夫斯克区“列宁”集体农庄的主席克麦奇和“共产主义曙光”集体农庄的头头别斯基德呀！

“汽车嘛，确实不算很新，”别兹柳季科边给他们斟酒，边报告说。“但是，在你们农庄还蛮可以跑一阵子。那末，你们需要多少呢？”

“越多越好！”主席们齐声回答道。“不过，这里最要紧的是，可别……是否一点问题都没有呢？”

“放心吧！”别兹柳季科安慰他们说。“这里面有副部长和局长级掌握的‘物资’。你们到机关去取汽车，不用付现款，正式办理划拨结算就行。这是符合估价委员会的条例的。每辆汽车你们付六百卢布就行啦！嗯，至于我嘛，每辆车就给三百卢布吧！”

“只要三百！”

农庄主席们简直有点不相信突如其来的红运了。为了消除一切疑虑，别兹柳季科邀请他们一起去基辅。主席们及其随行人员（农庄会计、发货员、机械师）和别兹柳季科一起从基辅飞往莫斯科，又从那里飞到阿什哈巴德。主席们给了别兹柳季科将近四千卢布作为预支款。后来，“共产主义曙光”集体农庄从各地弄到了十五辆汽车。至于克麦奇，在他的农庄汽车场里增加了整整十辆汽车……

现在，这位廉价汽车“死魂灵”的收购者，甚至也不在任何单位挂名工作了。没有时间呀！即使是把他分成两半，一半奔走于莫斯科各机关，另一半游窜于各集体农庄，那也忙不过来。但是肉体上分成两半是不可能的，所以就需要有助手。罗夫诺州

“集体农庄联合建筑托拉斯”第一机械化流动施工队原队长科诺普柳克也是一个象别兹柳季科一样的骗子。他介绍别兹柳季科同切尔沃诺阿尔麦依斯克区的“三八”农庄主席帕尔申和“列宁之路”农庄主席扎叶茨认识。别兹柳季科很大方地给了科诺普柳克一千卢布，来报答他的“效劳”。但别兹柳季科并不吃亏，因为此后不久他马上就从帕尔申那里骗取了集体农庄一万四千五百卢布，从扎叶茨那里骗取了五千二百卢布。

别兹柳季科毫无顾忌地把成千上万的卢布不断地放进自己的腰包。他在基辅买了三间一套的住房，开着自己的私人汽车，让老婆辞掉了工作，对她说：

“坐在家里休息休息吧！”

（原载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真理报》）

在“秘密”的掩盖下

塔林市的瓦尔格瓦兹街上有一幢红棕色的二层楼木屋。不过这幢房子还缺少一块“纪念牌”，不然，这块牌子就会写上：“著名企业家科斯坚科夫曾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二年在这里进行过难忘的活动。”

说实在的，科斯坚科夫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光辉的历程。倘若有人出于好奇心，要打听他的全部活动的话，他就会把手指放在嘴边低声地说：

“国家机密！”

然而，正是从这幢没有挂任何招牌的木屋的地下室里，一辆辆满载的汽车把一捆捆东西运到邮局，发往维尔纽斯、喀山、奥尔加、雅库梯亚、马加丹、萨哈林岛。

发件人的住址常常是：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拉克维列区伊卢米亚埃集体农庄。就是在这个农庄里有一个用“机密”掩盖起来的企业……

伊卢米亚埃农庄现任主席维伊德利克平常是个谈笑风生、精力充沛的人，而现在却愁容满面，郁郁不乐。她甚至不愿意提起有过这么一个秘密企业似的。顺便说一句，这个企业的头头科斯坚科夫现在已经神秘地从地平线上消失了。当他得悉共和国人民监察委员会已开始注意自己的这个很“保密”的机关之后，就如石沉大海，无影无踪了。

我和农庄主席后来进行的谈话，终于使她开始回忆起这个企业的某些事情来。不妨说，这是一个独特的印刷、石印和出版

联合工厂。这个联合工厂每年生产几十万份印刷品。不过它在农庄里既没有厂房，也没有设备，更没有工人。

从一九七〇年六月到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农庄出纳处共收到这个企业的进款二十万四千二百一十四卢布。除付给科斯坚科夫及其一伙六万四千卢布外，农庄获得纯利润约七万卢布。其余用于抵偿生产费用。

众所周知，只要农庄里有闲劳力，生产是就地取材，那么开办附属企业是允许的。而这个工厂是违反这两个条件的。

一九七〇年春天，科斯坚科夫遇见了当时的伊卢米亚埃农庄主席洛季亚克，很老练地探问道：

“需要钱吗？”

“钱嘛，什么时候都需要。”农庄主席答道，“你想要什么作交换呢？”

“我需要农庄这块牌子，要用农庄的图章，要以农庄名义在银行立户头。”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双方拍板成交。于是，挂着农庄牌子的“科斯坚科夫伙伴”印刷出版联合公司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还不到一个月，农庄的活期帐户就收到了第一批非常可观的款子。

科斯坚科夫轻而易举地就使共和国技术物资供应总局的领导人相信，需要拨给伊卢米亚埃农庄十二吨进口高级白纸，用在生产肉类和乳品方面。

纸张拨下来后，科斯坚科夫就把它运到塔林市第二印刷厂。该厂工人格列勃夫和萨阿格马上按规格裁开。这两个人从科斯坚科夫那儿得到二千三百九十七卢布的报酬，而按国家的计件工资定额计算，只应得一百四十三卢布。

随后，裁好的纸就运到中央统计局电子计算中心的印刷厂，

并印制成各种各样的教学宣传画。尽管任何一张画上都只字未提肉类和乳品的生产问题，但农庄这批定货不费任何口舌就完成了。“科斯坚科夫伙伴”公司把画分别打成包，以高于原价六倍的价格转卖出去。

“标准”生产联合公司接受了“科斯坚科夫伙伴”公司一万七千张供建筑工地用的技术安全宣传画的定货。“科斯坚科夫伙伴”公司付给“标准”公司四千八百二十三卢布，从买主那里却获取几乎多四倍的钱。

皮亚尔努渔业联合工厂也为完成伊卢米亚埃农庄的订货消耗了十二吨多白纸。

上面所举的例子很清楚地说明了整个企业的生产过程和利润来源。也许只有定货人的态度还令人难以理解。

这个附属企业的工资报表，解开了这类难解的谜。在工资报表各个时期所列的六十九人的名单中，可以看到有许多定货人的名字。例如，建筑部的一个工作人员给这个企业校订文章，就获得了四百二十五卢布的报酬。

遇到定货人提出某种刁难时，往往也就达成这类交易。这时，科斯坚科夫就让“定货者”担任“编者”或者“定稿人”，并慷慨报答对方的谅解。农业部兽医化验所所长拉乌特纳编了二十七张宣传画，获得报酬三百七十卢布。该部的一个局长拉胡米亚埃获得校订费二百卢布。

教育部视察员拉弗尼设法为企业拉了不少定货。他因此获得校订费一千二百零六个卢布的奖赏。

当拉克维列区执行委员会揭露了“科斯坚科夫伙伴”公司的内幕并准备予以取缔时（这个案件已经转到内务部有关部门），正是这个教育部成了一个清白的仲裁人。这个部采取了各种办法使这个附属企业继续进行活动。

共和国人民监察机关终于弄清楚这个企业的很不寻常的内幕：有些人连一天都没有在这个企业里呆过，但却把大笔的钱放进了自己的腰包。另一些人还没有出世，但已有人给他们支付酬金了。

企业里的另一部分在册干部只留下了委托书作为证明，科斯坚科夫就凭这些委托书支取了他们的工资。

科斯坚科夫支付报酬给别人的时候，从来不曾忘记过自己和他家里的人。十个月来，他付给自己约五千卢布，以他父亲的名义支取了几乎两千卢布。

（原载一九七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真理报》）

机灵鬼是怎样得救的

哈萨诺夫非常爱好养鸽、养鸭和毛皮兽。对此，他的解释很简单：

“我从小就喜爱小鸡小鸭。至于小野兽……”说到这里，他就稍稍放低嗓门说，“小野兽身上有皮子。这都是钱……”

不用说，哈萨诺夫很懂得钱的好处。在市区入口附近的绿荫如盖的果园里，有他的一幢独院住宅。院子里有坚固的家庭生活住房，住房旁边是车库，里边停着他自己的“伏尔加”牌和“嘎斯”牌小轿车。小河边放养着良种鸭子；离河不远的地方，是四周有围墙的养鸡场，屋檐下有鸽子窝。据说，这种鸽子别人家里是没有的。因此，鸽子的价钱也比一般的要贵。后院，有一些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兽栅，北极狐和其他品种的狐狸美滋滋地住在里边……

可见，“阿拉套”疗养院主任医师的产业是不小的。所以，他并非偶然地引起了采购人员的注意。采购人员坚持要哈萨诺夫签订合同向国家交售毛皮。根据合同，他必须在一九七一和一九七二两年内交售价值三千七百五十卢布的兽皮。今年，交售的也是这个数目。但是，从哈萨诺夫那里连一张毛皮也没有收购到。我们这位场主想：“如果自己出售能多赚两倍的价钱，干吗我要卖给采购站！我宁愿交纳不履行合同的罚款，这总共才不过百把卢布。”然而，应当指出，软心肠的采购员们直到现在一次也没有向哈萨诺夫提出过罚款的事……

有一天，哈萨诺夫从邻近的国营农场为自己的养兽业弄到

五袋死羊肉，并运回疗养院。和往常一样，主任医师示意司机，弄到食堂去。第二天，他们用绞肉机把死羊肉绞碎给北极狐和狐狸作饲料。这次“手术”被值班医师吉契金娜和值班营养护士雅内舍娃发现了。她们写了报告，寄往卫生防疫站和管辖这个疗养院的共和国卫生部。

你们会想：犯罪者受到惩处了吧？没有那么回事！直截了当地说，卫生部副部长尼格马图林压下了这个案件，而且很快就使雅内舍娃和吉契金娜懂得，并不是一切家丑都可以外扬的。同时，还表示关心地打听：她们或许想离开疗养院吧？

再举一个例子。既然哈萨诺夫有一辆公家的“伏尔加”牌轿车供他使用，为什么他还要两辆私人汽车呢？但是，这个人贪财之心极重。他还极力使他的部下也养成这种品德。疗养院的总务主任、厨师和司机都在哈萨诺夫的养兽场兼职。有一次，哈萨诺夫把司机塔谢耶夫找来，对他坦率地说：

“这样吧，你帮我的养兽场干活，我每次付给你十个卢布。现在咱们说定：星期六和星期日，我的汽车归你使用。其他日子，如果你愿意，可以用疗养院的任何车辆去捞外快，捞多少都行。只是挣的钱得咱哥俩分：你一半，我一半……”

于是，在阿拉木图——伏龙芝公路干线上出现了哈萨诺夫的“出租汽车”。一切都很顺利。可是有一天，汽车撞倒了一个行人。哈萨诺夫往国家汽车检查局跑了两个星期，他“证明”，当时司机是执行紧急任务，而行人是个醉汉，……你看，他就是这样作证的！

疗养院的副主任医师盖列里斯有一次试图劝说一下这位上司，可是，哈萨诺夫对他说：

“你不喜欢这里的规矩，那就把申请书交上来，我把你解雇。不过，我要预先警告你：不要用区委会来吓唬我。告诉你，我不

是党员，我担任这个职务是共和国卫生部部务委员会批准的，再说，我们这里没有党的组织，因此，你的鉴定还得由我来写，明白吗？”

就这样，他解雇了这位老共产党员，给他做了相应的鉴定。

医疗体育指导伊斯托米娜的遭遇大致也是这样。她“被解除的”职务由哈萨诺夫自己担任，还领取半薪。不用说，医疗体操的工作并没有进行。但他在三年内却平白无故地每月领取六十九个卢布。当人民监察员过问这次“手术”时，前来解救的又是那位副部长尼格马图林……

大家知道，哈萨诺夫总是逍遥法外的。这难道不是由于哈萨克共和国卫生部的某些领导人员想要把“阿拉套”疗养院变成自己的“世袭领地”吗？仅在今年第一季度，就有卫生部的十二名工作人员分文不花地在这里“休养”，而几个星期以前，持免费证到疗养院休养的还有位副部长彼得洛夫的母亲和女儿。

我们急于知道的是：哈萨诺夫到底是什么人？他在什么地方工作过？从前是干什么的？原来，不久以前，由于他的品行不端和贪财成性而被解除了“卡明斯克高原”疗养院主任医师的职务。当时，副主任医师和会计师们都受到了审判，而哈萨诺夫却摆脱得一干二净。此后，他不声不响地在阿拉木图卫生防疫站当了近三年的医师。当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开始被人遗忘的时候，领导上又把他提拔上来，担任“阿拉套”疗养院主任医师的职务。

哈萨诺夫上任还不到半年，控告他的书信就纷纷寄到了各级机关。列举的具体事实说明主任医师是一个贪财成性的罪犯。这些事情哈萨诺夫都知道了，于是，他就对控告者进行残酷迫害。在八个月内，疗养院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根据“本人要求”被解雇了。三年来，哈萨诺夫就解雇了四名副医疗主任，七名副

总务主任。

《真理报》编辑部也收到了控诉书，要求哈萨克党中央的工作人员处理这些问题。

这一次由于乌云密布，卫生部采取了非常措施：急忙把哈萨诺夫送进医院，并向劳动力丧失程度医务鉴定委员会提出报告。委员会的结论是：定为三等残废。越到后来，名堂就越多。此后不久，卫生部又决定发给哈萨诺夫共和国级的个人特定退休金，并派他担任卫生部负责疗养院和疗养地事务的主任检查员。一句话，机灵鬼这次又摆脱得一干二净。

（原载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真理报》）

在高的木板围墙背后

这条街在郊外，但你绝不能说它是寂静的街道。一座大型工厂和州贸易站的一片房子在附近落成了。带子似的一条柏油路把往日的关厢渔村与市中心联系起来。“莫斯科人”牌和“伏尔加”牌小轿车从路面上飞驰而过，公共汽车庄重地游动着，自卸卡车的低音喇叭呜呜作响……。但这一派喧闹景象，犹如顿河流水突遭阻塞，在两座拦街而立的红砖大房面前嘎然而止了。在一样高的绿色木板围墙的背后，在挂着密眼透花纱幔的窗户里面，有人过着一种不愿让外人看见的独特生活。《真理报》收到的一封信，讲的就是这种生活：

“我早就想写这封信了，但迟迟下不了决心。现在我再也沉默不下去了……几年前我们决定盖一个温室和一个花房。不瞒您说，为的是卖花赚钱。我们赚了好多钱，但还想赚得更多。温室里装上了煤气。冬天也在里面干起活来了。收入增加了一倍。钱是赚了很多，但是钱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快乐。在人们的眼里我们成了外人，邻居都不跟我们打招呼了，称我们是攒钱鬼。

“从前我们的家庭是多么和睦啊！邻居都尊敬我们。而现在丈夫一头扎进暖房，连跟孩子们搭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了。他还要我辞职，专门在家种花。他喝起酒来了，我们开始经常吵嘴。我不愿意辞职，我喜欢同事们，只有跟他们在一起我心里才舒坦。您知道，我现在连家都不想回。买卖做腻了，整天和土疙瘩打交道……”

这里需要插一笔。农庄庄员和城市居民的个人私有经济对

社会有利还是有害，这个问题的争论已有了结论。市场和商店的竞赛正在给共同富裕开辟道路。罗斯托夫人也喜欢中心市场，这不是偶然的事。主妇们把要买东西买齐之后，绕个弯儿到花摊上买一枝丁香或是鲜艳的郁金香，回家放在桌上作为点缀。

这样一来，有些生意人，便把他们的算盘打在人们爱美的心理上了。我们想见见这些生意人，探问一下他们朝思暮想的是些什么，他们的目标何在……我们只要将这两座房子的密眼透花纱窗帘撩开看看就行了，因为给编辑部写信的人正是把这房子的主人称为“同道”的。

这所房子里日月如飞——拦也拦不住的。自从当初这一对年轻夫妇，只为“自给自足”而决定筹建温室那个可纪念的日子开始，时光的流逝便特别急速起来了。起初他们是在温室里种些西红柿和黄瓜自己吃。阿纳托利当时是个汽车司机，通过一级考核后，就改开救护车了。至今他还记得，有一次在街上一个不相识的人向他伸出手来，说：“谢谢您，您那次救了我儿子的命……”塔伊西娅当上了公共汽车售票员。……

可是塔伊西娅不当售票员已经将近十年了，她成了一个家庭妇女。

这一切都是从打算买一辆小汽车开始的。不管什么牌子的都行，那怕是差一点的，反正自己就是司机，保险“玩得转”的。一家大小坐上汽车，那儿不能去，到草原上去，到顿河对岸去，躲开那挤也挤不进去的市区游泳场，离它远远的……于是他们就扩建了花房，种起了郁金香和菊花，拿到市场上去卖。每天清早三点钟就起床，天黑以后才离开花房。他们早就能买一辆小汽车了，但计划又变了。阿纳托利下决心说：“先盖一所带汽车库的新房子”。

这时，汽车司机的工作，已经不能给他带来以往那样的愉快

了。他扔下了救护车，一级司机被雇到水上运动站去当看守了。阿纳托利在温室里装上了煤气、自来水、电灯。他几乎每隔一小时就要起身看看温度表。紧挨着温室盖起了他的新房子。那不是房子，而是座一层半的堡垒。

阿纳托利带我们看他经营的花业。花房长约三十米。整个都罩在玻璃下面。土壤就象绒毛一样松软，一颗硬块也没有。遍地的郁金香，好似绿色的地毯。

我们再看看他那所房子。楼下是辅助用房、厨房、餐厅。楼上有五个房间，每一间都挂满壁毯，摆满光滑的家俱，餐厨里水晶玻璃器皿在闪闪发光。还有一架钢琴，两个大冰箱。就在这所房子里建有汽车库，里面停着一辆“伏尔加”。但是贵重的财物，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真正的欢乐。吵架越来越频繁。您瞧，刚才就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我们五年没去电影院了。”阿纳托利说。

“那怪谁呢？”妻子打断他的话。“朋友们全都不理我们了。不管他们什么时候来，我们总是在温室里。甚至连爹妈都不到我们这儿来了。”

这些人不知不觉地走上抓钱没个够的发财致富道路，却把最重要的东西——别人对自己的尊敬，丧失得一干二净。我们不禁为他们感到难堪。

（原载一九七三年三月六日《真理报》）

他们多么恼火

塑料配件公司销售处处长库雷列夫，有一次乘车去共青团湖畔呼吸新鲜空气。他在仔细观赏这个公共休养区生长得郁郁葱葱的各种植物的时候，忽然闪出了一个念头：要是在这个地方开辟一座香气扑鼻的私人花园，倒也不错呀。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经理谢甫琴柯。

“大家不会有意见吗？”经理有点踌躇不决。

“要是您、总工程师屠列茨卡娅、供应处长斯米尔诺夫、车间主任谢力格涅柯，凑在一起组成一个醋栗种植联合社，这就成了一个集体，而集体是不容侵犯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章程，然后去市苏维埃登记。”

“集体就是力量，”经理同意了，“就这样办吧。”

不久，市民在假日经常去游玩的风景区，就出现了篱栅，老远就可以看见看守人的身影。“塑料”联合社开始把休养区划作私人的菜园。

人们纷纷写信告发。检查员班尼柯夫带着其中的一封从利沃夫来到这里。噢，他多么恼火！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他大发雷霆地说，“你们这是怎么搞的？”

“我们错了，为了改正错误，我们也给您划一块地。”

“噢，如果是这样……”检查员的气消下来了。

这样一来，又一个大自然爱好者加入了这个联合社。在这块原是绿色的地区开始散发出除莠剂和化学肥料的气味了。许多

人除了掌握农业技术外，又开始搞起建筑来了。一幢又一幢的私人住宅出现在菜园里。那些稀缺的建筑材料不知是从哪儿弄来的。现在，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注意这个联合社了。局长赫沃斯托夫斯基亲自光临这个“解闷”之地。噢，他多么恼火！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他把园艺师兼菜园主大骂了一顿。

“我们错了，我们可以腾出点地方，接纳您加入我们的联合社。您也来盖一幢吧。”

果然，赫沃斯托夫斯基给自己盖房子了。后来，一辆“急救车”应召急驰而来。这是因为有一位土地爱好者中暑倒在杂草丛中了。这一意外事件使园艺师们作出决定，要吸收医学院的医生果罗特参加联合社。这样，联合社就会有自己的医生。紧接着，体育学校的校长切钦娜、民航站副站长尤罗夫斯基等人都陆续参加了联合社。

……在得到温尼柯夫市苏维埃批准以后，他们已经顺利地学会种植各种蔬菜。新住宅建筑也已全部竣工。

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灌木丛中的别墅更遮不住人的耳目。市苏维埃多次讨论了关于瓜分公共休养区并在那儿大兴土木的人的处理问题。噢，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是多么恼火！只不过这种恼火就是不见下文。联合社日益兴旺，现在已经有四十六个社员了。

塑料配件公司的经验很快就在其他一些企业普遍得到推广。自动装卸机工厂成立了汽车库建筑师联合社。不过，在这儿，事情是由于工厂的工会主席马特维基夫的倡议而开始的，因为他需要有一个私人车库。副厂长阿勃拉缅、总经济师列赫维阿什维利、动力总工程师卡拉谢夫等人也成了联合社的社员。一共有十三个人。忽然，有人想起了：“十三”这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于是，他们就决定增加社员，把机车车辆修理厂工会主席斯威德爾斯基、音乐学校校长布加耶也都吸收进来了。

联合社的组织者们使用工厂的材料和运输工具来建筑车库，也用不着去找工人，他们使用建筑车间的人力。

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建筑汽车库更躲不过人的耳目。市当局开始过问这件事情了。噢，他们多么恼火！就在这个时候，马特维基夫却被提拔为州的机器制造业工会主席。

（原载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真理报》）

救命啊！

伏尔加河畔某城市的建筑者们保证为工厂提前建成一个大型工业联合公司。应该看到，这些建筑者是多么干劲十足地工作着。但工程突然“卡”住了，因为机器上缺少调节阀门。于是，他们匆匆忙忙地派了一位工程师出差，去生产阀门的工厂。接待这位“急使”的副厂长仔细地了解了来意之后，突然问道：“如果我们帮助你们，你们给我们什么？”工程师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心想：如此突如其来的话不是对他说的吧。正好，这时电话铃响了，有人从远地请求拨去的也正是这种阀门。于是，开始了讨价还价。副厂长要求通话对方以自来水管、电线、盥洗池作为交换……“好吧，只要你们同意我们的条件，没有发货单也拨给你们阀门。”副厂长结束了谈话，放下听筒，神气十足地向来看客看了一眼，意思是说：问题就应该这样来解决！

工程师写道：“我小心翼翼地探问了一下：‘究竟向我要些什么东西？’我听到的回答是：‘您到我们供应处去，了解一下他们需要些什么。那里会给您准备一份清单。你们将清单上开列的所有物品运来，那时，就可以得到阀门了。’我当时不知道怎样走出这个办公室才好，我担心我会喊出‘救命啊！’我甚至忘了让副厂长签注我的出差证……”

（原载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日《真理报》）

值钱的手迹

“我是作家笛奇宁。”他这样做自我介绍，接着就抓紧时间（时间就是钱），谈起正事来。

“我可以写特写，写小说，写论文。可以给你们写一大本书。我会创作一部艺术画卷。譬如说，我们把这部书叫作《×××厂史》。它可以使你们单位名传四方。”

谁愿意默默无闻呢？各企业领导人对作家的盛意，感到受宠若惊，于是纷纷把……钱柜打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笛奇宁每当一大笔预支款到手之后，什么全体职工，什么企业前途，他就不怎么感兴趣了。

留下来作纪念的，就是一大包工厂管委会人员提供给他写《×××厂史》用的材料。但笛奇宁更经常的则只是把手迹留在现金单据上。

他签收现金一向是言简意明：“我（某某某）收到……以应编著×××厂史之需。”

就这样，笛奇宁通过预支所得现金为：电机厂六百卢布，库尔斯克联合企业七百八十卢布，橡胶技术制品厂一百二十卢布。

但从某时起，笛奇宁感到这样定期敛钱不方便了。他便在化学纤维联合工厂的发薪登记单上签字，领取工程师的工资，并老脸皮厚地在“计算机厂”拿工长的工资。

每当人们问起他写的“厂史”究竟在哪儿时，笛奇宁就回答说：“快了！”说罢，便急急忙忙地到其他企业去了。

笛奇宁这样四出揽活打短儿，不是什么捞外快，而是利用人

们尊重作家的劳动而进行投机。

“笛奇宁对生活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列宁区党委会有人对我这样说，“他在远东曾因各种丑恶行径而受到严厉申斥。而今又到库尔斯克市来‘谋生’了。”

我同库尔斯克的许多作家谈了话。他们都谴责笛奇宁的这种打短儿行为。有一位作家还引用了拉苏尔·加姆扎托夫的诗句：

荣誉和良心是无价之宝，
它们不能当作商品，
也不该拿到市场上卖掉。

（原载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四日《真理报》）

你要“伏尔加”还是“莫斯科人”？

在车站候车室的沙发上躺着一个身穿军装的人，艰难地呼吸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看到这种情况，断定这个军人病了。于是叫来了值勤民警。病人身上散发出一股强烈的酒味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请来的医生断定，这个人健康情况非常良好，但醉得很厉害。于是，这位陆军上校就出现在交通民警值班室。

在那里很快就查明了，这个人从来就不是什么上校，他穿军装是非法的。在他身上发现四本记有洛班名字的劳动手册，三份用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奥希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公文纸填写的工作鉴定，还有许多各种空白公文用纸，三个似乎是洛班的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复制本。

人们注意到，劳动手册上所有的记录都是一个笔迹，盖的都是一个公章。工作鉴定和毕业证书复制本盖的也是这个公章。署有“汽车运输工人工会”字样的这个公章就放在冒牌上校的皮箱里。

第二天，检察员民警上尉雅克利切夫同清醒过来的“军人”谈了话。但谈话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洛班不承认自己有任何过错。后来干脆拒绝交代问题。这样，检察员就不得不去奥希作一次长途旅行，因为被拘留者说，他是从奥希动身去白俄罗斯的利达市的。

在奥希，洛班的广泛而多方面的“经历”便展现在雅克利切夫上尉的眼前。

洛班当上奥希州执行委员会商业管理局检查组组长后，以

检查食品店、食堂、小吃店的工作为名，肆意勒索、酗酒、滥用职权。

一个半月以后，管理局领导决定弄走这位善于钻营的检查员。但是，洛班搞走了一大叠奥希州执行委员会的空白公文用纸留作纪念。后来，他当上了市中心储蓄所所长，打算搞几次推销彩票的活动时，这些空白公文用纸对他来说就非常有用。

体育用品商店经理哈萨诺夫很想买一辆私人用的“伏尔加”牌汽车，否则先买一辆“莫斯科人”也行。但这需要等候分配。就在这时候，他的一个熟人洛班仿佛从地里钻出来一样，出现在他面前。哈萨诺夫挑了几件毛料的运动服送给他，而洛班也就答应给他帮忙。

“好吧，您要‘伏尔加’还是‘莫斯科人’？”

于是，洛班马上就从公事包里取出一个用五个火漆印封好的大公文袋，拆开后面取出了一张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的彩票号码单和几张彩票，似乎这些号码就会中头彩。“幸福的”彩票也就在这儿。

“不管怎么说，我到底是个储蓄所所长。”洛班神秘地提醒对方说。

要知道，当时骗子早已被开除出储蓄所了，但他的口袋里仍然装着工作证。

哈萨诺夫非常了解，在我国，各种彩票开彩都是当众抽签的，根本无法弄虚作假。哈萨诺夫毕竟还是“上钩”了。这是因为渴望用一切办法，甚至不正当的手段弄一辆汽车的念头占了上风。哈萨诺夫犹豫了一会儿之后，还是选了两张“伏尔加”和“莫斯科人”的中奖彩票。

“此外，每张票我附上一份奥希州执行委员会的保证书，”骗子又说，“这样，事情就十分有把握了。您现在不妨说，您已经

坐在自己的汽车里了。买彩票的钱等您得到汽车以后再结算。不过现在您要给我一千五百卢布作零星开支。”

这样的高风格实在出乎哈萨诺夫的意料。这样一来，他一点怀疑也没有了。于是，他当场毫不犹豫地给了这个冒险家一千五百卢布。然而汽车呢？尽管有“保证书”，但始终没有弄到手。

奥希城的市民尤尔达舍夫的要求比他的老乡要低得多。他只不过想得到一辆“乌拉尔”牌的摩托车。就在这个时候，善于钻营的洛班仿佛从天而降，来到这位摩托车爱好者家里。他“偷偷地”向尤尔达舍夫推销的还是一张会赢得一辆摩托车的中奖彩票，同时附有一份“保证书”。这种州执行委员会的空白公文用纸他手上有的是。

起初，这位顾客对这种做法是否对头曾感到怀疑，但当洛班向他出示储蓄所所长的证件时，马上产生效果，一切怀疑立即消失了。双方约定，等摩托车到手后，再进行“最后”结算。而现在，二百五十卢布已搬了家，搬到储蓄所所长的腰包里去了。

（原载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劳动报》）

熊的道德

奥布卢奇耶市第七十中学是一所铁路子弟学校。学校教学人员的编制不属于区教育局，而属于远东铁路局学校管理处。但是，这个学校的工作却完全由地方当局领导。因此，两年前柯罗勃夫曾被请到区委去。

在这里等候他的有区教育局局长胡季克和从哈巴罗夫斯克来的铁路学校管理处处长济良诺夫。当着他们的面，有人建议这位在一所小的职工学校担任教员的年轻人转到一所大的第七十中学当校长。这所中学的前校长巴拉巴什现在已经去世。他当年打算退休的时候，曾经推荐过柯罗勃夫接替自己的工作。

在这以后，市里的人越来越信服老校长慧眼识人，他这次也没看错，给自己选了一个好接班人。同事们看到柯罗勃夫热爱儿童，关心大家，有真才实学。

不久前，就是在今年八月，共产党员柯罗勃夫又一次被请到区委去。

“柯罗勃夫，不得不解除你的职务。”

“为什么？”

“事情是这样，前区教育局局长胡季克需要你的职位，至于你，我们将调你去当教务主任，或者，你愿意的话，到本区的一个村镇学校当校长。”

柯罗勃夫不愿意在原来的学校里当教务主任，因为这个位子已经有了可敬的人了，但又不能同意去一所小的村镇学校，因为在那里不可能给他的妻子安排工作。柯罗勃夫表示愿意继续

留在第七十中学当一名普通教员。对于这件事，铁路局学校管理处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解除柯罗勃夫的职务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因此，最好让他写一份申请书，譬如说因病或者由于其他什么原因。

共产党员柯罗勃夫不愿意写“自愿申请书”，他觉得自己身体非常健康，这就是说，如果有理由，有打算，将我免职好啦。免职的“打算”，据我们了解，是有的，只不过没有理由罢了。

读者会问，区教育局长胡季克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把他降职呢？

五年前，他安排一个叫什良霍娃的女人当了区教育局的会计主任。她得到局长同意后，在国家银行分行立了专用帐户，本区学生把废铁卖给第二黑色冶金公司所得的钱就开始入在这个帐户上。开立专用帐户这件事，胡季克和什良霍娃并没有通知财政机关。因此，这个帐户一直是无人检查的。

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底，胡季克从来没有检查过什良霍娃的财务工作，对她从银行支取的现金的使用情况也不过问，只管在空白支票上签字，交给她去区教育局的储蓄所取钱。这样，国库一共损失了六千零八十五卢布三戈比。

第二黑色冶金公司的工作人员，平均按每公斤两个半戈比的价格回收学校交来的废铁。人民法院不难想象，有多少吨少先队员拣来的废铜烂铁肥了这位“阿姨”。今年五月底已依法剥夺她的自由。而那位“叔叔”又怎样呢？他只以证人的身份出席法庭。

胡季克的财务“活动”，用侦讯机关的话确切地说，即“失职”，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条应该“剥夺自由三年或者服劳役一年，或者予以解雇”。换句话说，胡季克应该和会计主任一起坐在被告席上。但侦查机关认

为，可以根据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的特赦令，对他进行处理。因此，在开庭前，对胡季克的刑事责任就不予追究了。

现在的问题是免于刑事处分的区教育局局长今后怎么办。问题本身并不复杂，但具体情况难办。原来胡季克的妻子胡季卡是区党委的一位负责干部。区党委第一书记普里霍特科和第二书记巴拉诺夫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是：“怎么办，假如我们不给胡季克安排一个好的职位，他就会离开我们这个区，那他的妻子胡季卡由于家庭关系也就会跟着走。而我们又舍不得她……”

总而言之，委屈了“丈夫”，就会失掉“妻子”。因此，胡季克仍被留在党内，只给予警告处分。据我们所知，这已经不是他当局长以来第一次受警告处分了。接着就给他找个合适的职位，因为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物质上、精神上受到影响。在区的范围内，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职位要相当于中学校长，具体说来，相当于第七十中学的校长。那么，柯罗勃夫怎么办呢？

忽然有一天，铁路管理局学校管理处处长济良诺夫找到了他说：

“柯罗勃夫，您还得要离开学校。我曾设法阻止，但没有效果。因为区党委推荐胡季克接任你的职务。你知道怎么跟大家交代吗？这个交代对你是很不利的，说是‘为了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唉，你还不如写一份申请书，说是‘因病……’。”

柯罗勃夫不愿意“生病”。于是，不久就因为“对学校领导不力”而被解除职务了。这样，大笔一挥，一个优秀工作者就变成不称职的人了。

此外，还有一件事，胡季克到铁路局学校管理处报到时公开声称，干脆把留下来当普通教员的柯罗勃夫从第七十中学弄走。管理处不同意这样做。柯罗勃夫于是暂时还上课。为什么说“暂

时”呢？因为新校长的夫人，主管本区教育问题的胡季卡有一次来到学校，以不容违抗的口气说，柯罗勃夫非离开学校不可。因为，正如胡季卡委婉地说的：“二熊不同穴嘛！”

（原载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二日《真理报》）

（上接第 156 页）

车的服务，修建新建筑物时要充分利用太阳能，要改变人们的饮食习惯，要提倡利用废旧物资，等等。

这本书的出现也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不少人的争论。一些环境保护论者认为，这本书为他们的运动提供了一本圣经。但有些经济学家则指出，这本书是重弹破了产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老调。总之，这本书之所以成为畅销书，无疑是因为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日薄西山、无可奈何的心情。这本书还鼓吹要让垄断公司负起计划之责，这就表明作者无非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御用经济学家，从另一角度力图挽救快进博物馆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已。

（张仲礼整理）

能挣钱的洋娃娃

假设我们因为用了属于我们个人的服装、便鞋、衬衫和领带，以及新闻记者的用具——活页本和自来水笔，而向编辑部要折旧费与耗损费时，那我们的同志们会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深信，他们一定会露出惊异的神色，说道：

“怎么，老兄，你们发疯啦？”

但要知道，就有那么一些幸运儿。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歌唱家、舞蹈家和音乐家都在领这种私人服装和道具的折旧费。比如说，演员穿着西装和皮鞋一出场，这就得拿二十五戈比。便帽一上头，又是五戈比。身穿平衡表演演员的衣服从侧幕后一露面，就是十二戈比。要是同时又把一块桌布、四块胶板、十块五彩积木、六只小车轮、四根杂耍棒槌搬上台，又得给半个卢布。唔，那么他要是一拿起活页本和自来水笔，不也得给他钱了吗？！

这在原则上说倒也无可非议。演员为了艺术而牺牲自己的衣物，将它穿破用坏，而以剧院行政当局为代表的社会也不想亏待。

关于这一点，文化部甚至还颁布了一个专门价目表。如果严格照章办理，那么国营克拉斯诺达尔边区乐团演员托米林的全部装备和道具的折旧费应为一卢布十一戈比。但乐团领导怕烦琐，每场音乐会竟付给他四卢布的折旧费。

检查员们大略计算了一下，一年要付他多少钱，不禁失声惊呼：属于托米林私人财产的服装和胶板、积木、小车轮、棒槌等等，给自己的主人带来九百一十八卢布的收入，超过了上述价目

表的规定。

他的妻子、女演员托米林娜的物品“挣钱”就更多：九百七十三卢布。这就叫人思忖起来：是谁在工作呢？！是演员呢，还是他的物品？托米林娜有一个洋娃娃。这对女主人来说，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洋娃娃，而是一棵摇钱树。只要洋娃娃在舞台上一开口说话或合着藏在幕后的录音机的节拍放声唱歌，那么每个词儿就是五戈比。摇一摇头，向观众递个眼色——，瞧吧，又是十戈比。这样，洋娃娃一年可以“挣”几百卢布。多年以来，洋娃娃这棵“摇钱树”一直在逗观众发笑，一直在领折旧费，青春长在，始终是原来那个安安泰泰、爱说爱笑的小美人儿。

托米林夫妇所共用的一台录音机，是他们巡回表演的固定伴侣。它伴奏着，用一切音调歌唱着，朗诵着。按价目表规定，它每月是十五卢布。

“咦，这定的是什么价？”物主们愤愤不平了。“每一场演出都要把录音机用个声嘶力竭啊！”于是要求改变价格。

于是他们开始按新定价领钱了：这位艺术搭档——录音机每演出一场，托米林可得一卢布八十九戈比，他的妻子可得一个卢布。

赚钱方式更新奇的是斯维尔贡。他是个报幕员。他所钟爱的家常话语言风格，使他不能着表演戏，也不能利用杂技演员的特技和其他道具，——不能象有些人那样凭这些道具便可捞大钱。但要知道，如果能想出个法子，就能叫大雪起火，就能跟闪电对火抽烟。而斯维尔贡就找到了这种法子。

一辆戏称为“快乐之车”的微型公共汽车，在黑海沿岸地区飞驰。它来往于阿纳帕、诺沃罗西斯克、格林吉克、图亚普谢各市之间，不时在俱乐部和文化宫门前停下来。司机熄了火，走出汽车来，用棉丝擦净两手，看了看表，便走进负责人的房间。

“我们都急坏了，以为您要破坏演出啦！”激动的、浑身是汗的负责人对司机说着，并急急忙忙递给他一张音乐会的节目单。

“您怎么啦，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速度，亲爱的，您知道速度有多快呀！”

司机从上场门走上舞台去，拉开帷幕，注视着座无虚席的大厅，习惯地高声说道：

“朋友们，你们好！我们的音乐会现在开始！……”

他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麦克风前，宣布着下一个节目，用开心的噱头、故事、笑话逗引着观众们。这里演出一收场，他便驾起“快乐之车”，向另一个音乐会疾驰而去。

当然，读者可以猜想到：斯维尔贡是一身二任。不错，他在乐团既是一名家常话风格演员，同时又是“快乐之车”的司机。开车是兼职。这种身兼二职，自然会反映到工资单上来。此外，这位机械化的报幕员竟能巧妙地将同时在三个居民点的旅馆住宿的单据提交会计科。而乐团的会计科也一切照付，显然认为：一个人就象微型公共汽车似地，也可以被拆成几份儿。

乐团的行政当局十分注意对自己的工作人员加强物质奖励，所以每逢节庆都发给他们奖金，赏给他们礼品。就拿乐团的建筑工程师苏多甫采夫来说吧。他在同设计院重订编制设计预算合同时表现出随机应变的才能，于是立刻得到一个月薪金的奖赏。

其他的人得到床单、被里、咖啡壶……的奖励。

可别让人们以为，仿佛乐团的领导是不器重天才似的。演员规定得一份工资，但你可以拿两份，不然就三份。不过得有创造，有闯劲儿。

当我们得知，克拉斯诺达尔乐团有些歌唱家、舞蹈家、马戏演员都挣多少钱以后，老实说，我们甚至想过：要不要改行当演

员呢？唉，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用男高音从“多”唱到“西”或者能踩钢丝的。

文化部规定：演出人员的工资不得超过两份定薪。而在克拉斯诺达尔却有独创的制度。我们已经熟知的演员托米林，平均月工资是五百七十八卢布，而有一些月份甚至达到一千。请注意，定薪可是一百五十卢布！沐浴在金海中的不只是托米林，还有他的妻子托米林娜，她每月平均挣三百六十卢布。演员苏契科夫是四百四十七，女演员舒里莘娜六百二十。

（原载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一日《真理报》）

葡萄牙独立遭受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

〔美〕《号角》月刊

葡萄牙武装部队运动的领导人，在掌权第二个年头开始的时候说，他们将避开两个超级大国，而且至少在三到五年内不会把政权移交给葡萄牙现在的任何政党。

“我们是在争取真正的独立，既独立于东方集团，也独立于西方集团之外，”在纪念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武运反法西斯政变的一周年、全国性投票前不久，武装部队运动最高级负责人德卡瓦略准将这样告诉新闻界。他强调说：“我们不想同任何超级大国企图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事有任何关系。”另一个武运的领导成员科廷奥海军上将说，葡萄牙不应同今日世界上“两个帝国主义大国”中的任何一个拴在一起。

武运的领导人说，武运也不打算受现在的葡萄牙各政党的控制。武运的官方发言人、政府新闻部长热祖伊诺海军中校指出：“我们还没有一个代表全体居民的真正利益的政党。”他说，在去年政变之后，“允许建立政党也许是个错误”，并且还说如果武运建立自己的党倒是“合适”的。

科廷奥海军上将用更坚决的语气告诉新闻界：“必须”建立一个代表武运自己政策的新党。他认为这样一个党能够由“社

会党和共产党的某些部分来组成”。

为了表示它担心现有各政党的不健全，武运在投票之前不久使所有主要政党签署了一项保证，同意由武运在至少三年到五年内掌握最高政治权力。

武运领导人对两个超级大国干涉的关切是在最近几个月的实际体验中产生的。作为一个在战略上位于大西洋同地中海汇合处附近的又小又弱的国家，几百年来，葡萄牙一直是列强争夺的目标。

在葡萄牙的美国军事基地

美帝国主义在葡萄牙有好几个军事基地，包括亚速尔群岛上重要的拉热斯基地，在十月战争中，这个基地曾作为向以色列输送军用补给品的美国飞机的加油站。武运现在坚持该基地的这种使用必须停止。

最近苏联正式要求利用葡属马德拉岛的“捕鱼基地设施”。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另一个超级大国一样，总是把间谍船伪装成“渔船”。在许多人看来，苏联的要求无异于要求一个军事基地。继北约国家包括美国的海军船只在前几个星期的演习之后，苏联海军于四月末在距亚速尔群岛不远处也举行了大规模演习。

葡萄牙的渔业非常需要今天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要求的两百哩捕鱼区。沙丁鱼，一种传统的葡萄牙产品，已经移栖老的三哩界线以外。沙丁鱼正在被极其现代化的苏联渔船队所捕捞，现在葡萄牙发现它自己不得不向苏联购买冰冻沙丁鱼。当做出象征性的姿态要“帮助”葡萄牙渔船队现代化的时候，苏联（同美国一样）反对两百哩捕鱼区，甚至也反对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所要求的比较低一些的五十哩捕鱼区。

葡萄牙受到超级大国的威胁

葡萄牙的民族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受到了两个超级大国的上述这些和其他方式的威胁和损害。武运领导人最近的发言显示葡萄牙政府想遵循一条独立的路线，不允许任何一个超级大国欺负它。这种态度同武运对葡萄牙主要政党的新态度是密切相关的。这几个党就是社会党、人民民主党和共产党。它们在最近的选举中分别获得了百分之三十八、二十六和十二的选票。

所有这三个党都同外国势力有密切联系，而且都名不符实。社会党是一个类似英国工党那样的改良主义政党。社会党希望葡萄牙同西欧国家结盟，并且成为它们那样。

人民民主党是一个崇美的右翼政党，企图使葡萄牙同华盛顿搞在一块儿。该党头目同去年被赶下台的旧法西斯政府渊源很深。所以葡萄牙工人和其他进步人士，经常包围人民民主党的集会，并用石块、瓶子袭击该党的头目，这种行动有几次正是在马列主义组织的领导之下搞的。

共产党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的党，而是紧紧投靠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的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它的阴险的特点以及同它在最近选举中的不体面的成绩大不相称的突出的作用。

共产党首脑库尼亚尔，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目前在西欧的修正主义头子中最听话的走狗。在他那一伙人中，他是一九六八年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罪恶行径叫好的唯一的一个。第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修正主义党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他对苏联的奉承讨好，超过了所有的其他人。他讲，苏联是“革命力量的最大堡垒”（其实是修正主义和背叛革命的最大

堡垒)。他还说：“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苏共之间紧密的、真挚的、公开的和明确的合作……是符合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各支队伍的利益的唯一政策。”

他接着又大肆污蔑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正当的马列主义立场：“我党……认为，对中国领导人的、由于所谓‘文化革命’和最近在北京召开的党代表大会而愈益加剧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扩张主义、反苏和分裂的言论与活动采取明确的立场，是对葡萄牙工人阶级与人民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应尽责任。”这种阿谀的发言赢得了勃列日涅夫和与会的其他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头目的热烈喝采。

库尼亚尔是这样一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以至于和追随社会帝国主义同样关心追随本国资产阶级的西欧一些其他修正主义头子，以同他为伍而感到尴尬。意大利修正主义党最近公开谴责了葡共并几乎与之断绝关系；西班牙修正主义党领导人卡里略上月在访葡时，存心冷落库尼亚尔并拒绝同他见面。

另一方面，库尼亚尔在莫斯科受到的却是空前的欢迎。苏修理论家苏斯洛夫上个月告诉一个法国来访者：“我们十分熟悉库尼亚尔，我们经常在莫斯科见到他。”

在库尼亚尔领导下，葡萄牙共产党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仆从党，它的目的就是担当操纵葡萄牙使其接受社会帝国主义领导的杠杆，这就是为什么武装部队运动的杰出的领导人现在谈论要建立他们自己的党，并暗示他们很想把社会党和共产党拆成两部分，同各该党的一部分合并，而摒弃其余的一部分。

武运掌权一年以来，经历了许多变化。它的最初纲领有三个基本目的：1.赶走旧的法西斯政府；2.停止在非洲的殖民战

争；3.把政权移交给一个选举产生的政府。他们已经做到了头两点，可是今后把政权移交给一两个投靠外国势力的政党这种前景，使他们改变了关于第三点的主意。最近的投票不是为了选出一个新政府，而仅仅是为了要选出一个起草必须提请武运批准的新宪法的议会。

武运是作为一个非常广泛的反法西斯联盟而开始活动的，甚至葡萄牙垄断资本的非法西斯成分也参加在里边。显著的例子就是斯皮诺拉将军，他得到葡萄牙三大金融寡头之一尚帕利马乌德家族的公开支持。武运让斯皮诺拉担任了政变后的第一任总统。

可是斯皮诺拉想塞给非洲的那种改头换面的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遭到了解放运动的强烈反对，他们一向认为他是一个凶手和敌人。他们挫败了他用一种比较“开明”的方式来挽救旧秩序的努力。斯皮诺拉想要葡萄牙采取的一种温和的改良的垄断资本主义，也不能为武运的其他力量所接受，后者代表了长期受到垄断企业的控制和压榨的葡萄牙中小资产阶级。经过一年来的一系列斗争和危机，斯皮诺拉及其主要支持者被迫下台并逃出了本国。

根据最近的声明和所采取的措施来判断，看来今天武运的领导权掌握在葡萄牙的民族主义的有爱国思想的资产阶级手中。那些担当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西欧帝国主义利益的买办分子们虽然也在其中有代表，但只限于起次要的作用。无疑将会有进一步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这一派或另一派的资产阶级将争取压倒其他派系。在这方面，库尼亚尔的修正主义党又显出是一个特别的威胁。但目前民族主义的具有爱国思想的那个阶层似乎占了上风。这个阶层谈到，象秘鲁和阿尔及利亚那些国家是可以学习的榜样。

在发生上述一切的过程中，工人阶级怎么样了呢？武运的领导人亟需工人的支持，否则他们不能防止旧的法西斯政府或斯皮诺拉派重新掌权而将武运成员投入狱中。工人阶级已经数次通过群众行动，援救了武运政府，击败了右翼的复辟阴谋。然而武运同时也拚命反对工人阶级承担国家领导和把国家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任何尝试。

去年夏天，在政变发生几个星期之后，看来葡萄牙工人本来是可以做到那一步的。罢工浪潮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其中许多是政治性的，目的在于撵走各种公司的旧的亲法西斯的资方。工人委员会控制了许多生产单位，群众运动如野火燎原，几乎把当时还在斯皮诺拉领导之下的武运挤到事态进程的主流之外。去年夏天有两种情况阻止了四月二十五日反法西斯政变继续向无产阶级革命发展。首先，葡萄牙的马列主义者还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能力领导这样一场革命；其次，修正主义分子还有足够的力量去破坏和阻止它。

在修正主义党的怂恿和支持下，武运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总的来说是针对工人阶级、特别是针对马列主义者的革命活动的镇压法令。当时的劳工部长（一个葡共党员），签署了一个对工人罢工权利加上种种限制的国家法令。这些限制在西欧仅次于西班牙，如取缔未经官方允许的罢工，取缔同情罢工和支持性罢工，取缔政治性罢工，实行强制性的仲裁和“冻结期”，但资方封闭工厂却是合法的。

马列主义力量正在成长

反罢工法甚至被用来对付例如莱斯纳韦造船厂的工人，他们是为了撵走公司的法西斯老板而进行罢工的。当六千多造船

工人去年九月在里斯本举行反对反罢工法的游行时，修正主义党污蔑他们是“极左派”和“被法西斯党徒引入歧途”。

其他的法令使政府能在事实上禁止一切政党、报纸、游行示威或其他表达意见的方式。虽然也有正确地针对右翼政党的一面，这些措施却更多地被用来对付葡萄牙的马列主义者。葡萄牙新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若干组织被迫转入地下，他们的报刊被封闭，领导人被逮捕，或被禁止参加最近的竞选运动。在诽谤葡萄牙的马列主义者和要求当局压制他们的活动中，修正主义党总是最活跃的力量。修正主义的葡共在四月二十五日以来的阶级斗争中的表现，粉碎了它作为反法西斯政党的早先形象。它用来攻击工人运动和马列主义者的毒辣和凶恶的言行，使它充分得到了“口头上社会主义，行为上新法西斯主义”的特征。

葡萄牙马列主义者虽然力量还小，却是一支成长中的势力。他们每天都从工人阶级最先进的那一部分中吸取力量，那一部分就是重工业和大规模生产部门的工人，他们最敏锐地察觉到修正主义对他们的阶级和国家的叛卖。也有报道说马列主义正在武装部队的士兵和水兵中，尤其是在传统上最革命的军种——海军里面迅速传播。越来越多的葡萄牙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在反对旧的法西斯政府的斗争中起了显著的作用——正在积极地揭露修正主义并加入马列主义组织。尽管还面临许多障碍，葡萄牙的马列主义者拥有各种客观可能性去掌握葡萄牙革命的领导权并把葡萄牙从西欧最落后的国家改造成为西欧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译自一九七五年六月号美国《号角》月刊 福建省
三明钢铁厂工人何亮亮译）

德斯坦完全改变了法国反对 欧洲政治统一的看法

〔美〕《商业周刊》

在就任的头十二个月里，法国总统瓦列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以一个社会改革家的姿态出现，一心要使法国有几世纪悠久历史的阶级结构变得现代化起来。在国内已开始进行改革之后，德斯坦又开始了一项根本改变法国对外关系的计划。他打算完全改变反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政治作用的做法，这种做法是十五年前夏尔·戴高乐提倡民族主义时开创的。

德斯坦预言共同市场下一步要采取的步骤是政治性的。“我认为我们已使尽了纯技术和经济步骤的一切可能了，”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是政治上有所协调，有了政治上的协调，我们对政治统一就有了新的推动力。”

法国总统指出，他的几位前任对经济共同体有可能起政治作用，是存在怀疑的。他解释道：“但是我认为，时代在改变。现在在法国方面，有强烈愿望要有某种的政治统一或联盟。”

起而领导，时机已告成熟

改革家德斯坦所尝试的这种转变政策，可能是最易引起争论的，因为它包含着把全世界的经济等级进行激烈的重行调整。一个政治上统一的欧洲将是一个经济上的强有力者。法国和西

德的国民生产总值(法国大约是二千八百五十亿美元,西德大约是三千八百六十亿美元)合计起来接近于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七千九百六十亿美元)。此外,在计算机、化学制品和半导体方面,欧洲国家有苏联所缺乏的尖端技术。如果把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也合在一起,那末,总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九千九百七十亿美元)就令人印象更为深刻了。

法国今日情况很好,足以领导欧洲进入某种政治组织。它在度过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时,情况并不比其他国家差,而是要比大多数国家好些。虽然实际的(即消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经济成长,在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将从去年的百分之三点八跌到零,预期下半年将稍有好转。通货膨胀率已从去年的百分之十六减去了一半,并且法国仍在采取抽紧银根和紧缩信用的政策,以迫使通货膨胀率进一步降低。失业人数七十五万人(大约占劳动力的百分之三),按法国传统来说是高的。但这数字同西德的一百十万人(百分之四点七),意大利的八十万人(百分之四点二),或美国的八百二十万人(百分之八点九)来比是低的。

更重要的是,法国的国际收支在去年出现了四十五亿美元逆差后已接近平衡。吉斯卡尔认为法国的国际收支帐目能保持平衡,因为在出口上尽了一番努力,内阁中的许多部长周游了全世界,象旅行推销员一样的推销法国产品。结果是法郎坚挺了。

在过去十年中,法国的经济发展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来得迅速。哈得逊研究所的哈得逊欧洲研究公司是专门研究欧洲大陆上所有国家的经济的,它的董事长埃德蒙·施蒂尔曼预测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到一九八一年将超过西德。

外交姿态

对同共同市场进行谈判受到挫折的美国国务院来说，统一的欧洲是好消息。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时常抱怨他不能就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同经济共同体进行谈判，因为经济共同体的发言人要等到所有的成员达成了坚定的协议，从而经济共同体不能改变它所同意的立场后，才能进行谈判。

从他的对外观点来看，吉斯卡尔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任何一个法国领导人更为亲美，但是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地不显露出这一点，担心这样会疏远了反美的左派和戴高乐分子，从而要丧失选票。但是，他还是设法用圆滑的政治措施，使法国更接近美国。

在过去六个月，他同福特总统开过两次会议。他让妻子和女儿分别访问美国，弥合了友谊上的裂痕，这事干得漂亮出色。一位很了解吉斯卡尔的巴黎银行家说道：“他心目中的法国模型是美国社会。他要每个人有机会获得成功。”

尽管出了很大的力并且是满怀好意的，但是吉斯卡尔同美国的关系在石油和货币两大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法国人认为要降低石油价格是没有办法的，他们向美国政府提出要举行三边会议，让石油使用者、生产者以及所谓第三世界实行对话，这样可以多少缓和未来的价格上涨。在这里，法国人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他也没有能够说服美国维持美元。随着美元贬值，法国的某些出口计划也要受到影响。国营雷诺汽车公司已经减少本年秋季要输入美国的 R-5 型汽车的计划，因为美元的卖价不到四法郎，一辆 R-5 型雷诺汽车零售至少要三千五百美元，这对

那种超小型汽车来说是很大的数字。

新的方针

吉斯卡尔是一九七四年五月在危险的形势中就任的。他获得的选票比社会党-共产党候选人弗朗索瓦·密特朗只超过百分之零点五的微弱多数，因此，左右两方的选票他都不能失去。但是，他还是灵巧地从那时候几乎站不住的地位移到了一个今天他被广泛地认为是“所有法国人的总统”的地位。

他做到这一点，部分是由于他把法国总统变得富有人情味了，而戴高乐及其继任者乔治·蓬皮杜则总是保持着威严的原则。在吉斯卡尔主持下，总统府爱丽舍宫成了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大众化的地方。他为法国政府带来了新的管理作风。当戴高乐任总统时，总统只对一些大问题感兴趣，把内阁和政府让蓬皮杜总理去管理。同样的是，在极大部分任期中病得很重的蓬皮杜，让雅克·沙邦-戴尔马总理管理政府。对比起来，吉斯卡尔则事必躬亲地管理政府和内阁。他所挑选的内阁部长是一般人认为称职的和正直的。他的总理雅克·希拉克虽然不象总统那样才华横溢，但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好的行政管理人。

由于吉斯卡尔擅长于主持小型会议，而不擅长于主持象法国法律所规定的每周全体阁员会议那样的大型会议，所以政府的许多事务是由一个六、七人的小组通常在星期二早晨开会处理的。出席会议的是：希拉克、财政部长让-皮埃尔·富尔卡德、总统办公室主任克洛德·皮埃尔-布罗索莱特以及内政部长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这位内政部部长已成为吉斯卡尔政府中的出主意最多的人，于是促使一个法国工商界人士这样说：“听听波尼亚托夫斯基今天所说的话就知道吉斯卡尔在三年中

要说的是什么了。”另外还有两三个同所谈问题有关的人出席会议。在会上，吉斯卡尔非常坦率而谦虚，不象他的几位前任，他是很仔细地听取批评意见的。

虽然他同普通老百姓一起吃饭这件事，在法国国外引起了某些人的窃笑，但法国人对这种做法总的来说是印象良好的。此外，他几乎每个月要上电视台作一次无拘束的炉边谈话，他的口才经法国国家剧院演员辅导后有了进步。

上周，为了庆祝就任一年，总统出现在几个长时间的电视节目中，他的出现几乎赢得了一致的热烈好评。有一个节目是，他砸烂了爱丽舍宫和总统家庭的保密传统，引导法国电视观众周游总统府，象十二年前肯尼迪总统夫人杰奎琳在美国电视上展出白宫那样的展出总统府。节目是以吉斯卡尔弹钢琴开始的。

这个节目使人们对这位成为总统的细长、俊美、文雅的人了解了许多情况，而早先许多法国人却认为他是太贵族化了，甚至在竞选中也是不会成功的。他在十二个月中的作为，甚至使不是他党内的政治家如中间派的独立共和党人都尊敬他。他们中有人说：“吉斯卡尔是当代的佼佼者。他擅长于经济学。他和人民相处融洽。他是一个新型的政治家。”接着，这个人又说：“在欧洲，他是唯一能改变形势的人物。如果法国不出来领导改变形势，那是将会一事无成的。”一位法国银行家对吉斯卡尔的评价总括为这样一句话：“他将成为法国的罗斯福。”

他之所以会获得这样的评价，是因为在法国国内政策方面，吉斯卡尔采纳了他称之为“社会公正”的做法。他从左派政纲中借用了许多思想。例如，他要使一切法国人机会均等，特别是无论何人都有权利受大学教育。过去在法国，劳动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受大学教育是有困难的。此外，他放宽了流产法，把服用避孕药片纳入国民健康计划，他把投票选举的年龄限制从二十

一岁降低为十八岁。

今后，吉斯卡尔打算要征收资本收益税以及对有非常高的收入的人征收较重的税。他答应到一九七六年四月时要彻底进行税制改革。他通过促使经营发生困难的雪铁龙汽车制造厂同经营好、有利可得的囊齐渥汽车公司合并的办法，来加强法国工业。为了使这笔交易能成功，政府还出资予以帮助。本月初，在计算机行业中他又坚决让摇摇欲坠的法国计算机制造厂国际信息科学公司同美国的霍尼韦尔公司进行合并，而不是继续采用无利可图的以荷兰为基础的菲利普斯以及以德国为基础的西门子的欧洲数据标准化计划。不过，这却是一次不受欢迎的合并。

很可能在他第一次任期于一九八一年届满前，吉斯卡尔将把某些形式的“德国的共同参加管理计划”带到法国工业中来，根据这个计划，工人将在公司的监事会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权。

据称，吉斯卡尔能够解决法国大多数的经济问题，因为在他背后有这么许多人支持他。一位法国出版商说：“当你是一位法国人，你看到只是由于百分之零点五的微弱多数而使共产党人不能参与政府，这就是最大的国内问题，你不用担心其他任何问题了。”吉斯卡尔在国内的最大政治力量来自人们担心共产党人参与政府。他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而成为欧洲一个最有权力的政府首脑。

（译自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美国《商业周刊》 唐雄俊译）

第二和第三世界之间团结的加强

〔美〕《号角》月刊

世界经济危机已加深了美国和苏联同世界各国包括同它们自己的盟国的对抗。这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正在企图加紧剥削世界其他国家，以便使自己摆脱经济危机的负担。但是第三世界国家对此坚决抵抗，这可以从石油输出国为维持石油公平价格的斗争的例子中得到证明。

第三世界反对超级大国经济剥削的斗争，已大大地孤立了这些帝国主义巨人。但是现在许多较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加入第三世界的共同阵线，以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发号施令了。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们自己有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剥削的记录，现在已具有“第二世界”的特征。虽然，它们是先进的工业国家，但仍然受压倒优势的超级大国的控制，结果是，因国际局势的变化，第二世界正在某种程度上同第三世界结成联盟。

近来的两次会议说明了这个新的团结的某些特征。第一次是洛美^①会议，这次会议在重新组织九个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和四十六个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方面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二次是一次失败的生产国和消费国国际会议的筹备会议，是由法国总统德斯坦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许多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站在共同的阵线，反对美国破坏会

^① 洛美是多哥共和国首都。——译者

议的做法。

洛美会议经过十八个月的协商之后，达成了某些非常重要的协议。多年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贸易关系方面的不平等，特别表现在进口第三世界商品的高关税和其他进口障碍的政策，而第三世界则被迫毫无限制地接受发达国家的出口货。但是洛美会议却将此颠倒了过来。现在，参加会议协定的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签字国的所有产品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二，将毫无限制地被允许享受在欧洲免缴关税和不受限额限制的权利。

另一点是，欧洲国家将不再可能象过去那样使用通货膨胀这一武器去反对第三世界了。过去，每逢第三世界国家试图提高原料价格时，欧洲国家也总是提高它们制成品的价格。现在四十六国集团已建立了一种特别基金，用以补偿制成品价格上涨所带给它们的损失。

洛美会议虽然要求欧洲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经济援助，却特别指明，“援助”不得用来作为干涉这些国家内政的借口。

只有一点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和四十六国集团不能同意的——这就是砂糖的价格。即使这个问题只影响寥寥可数的几个产糖国，但所有四十六个发展中国家作为团结一致的标志，都拒绝在协定的这个部分上签字。正是四十六个国家的这种坚定团结，使得它们在洛美会议上取得全面胜利，它们拒绝作出有损于这种团结的妥协。

两个超级大国都非常密切注视这次洛美会议的召开。美国集中力量想分裂这次会议，它批评欧洲经济共同体对第三世界过于“软弱”，而不是同美国一道采取一条不对第三世界作任何让步的“强硬路线”。另一方面，苏联把它们宣传对准第三世界国家，它竟然威胁说，如果第三世界国家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

协定,而不同苏联和苏联“共同体”签订协定,则将招致“不愉快的后果”。苏联报刊在洛美会议期间傲慢地说,第三世界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通过同苏联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进行“接触”。

在洛美协定签字六星期后,德斯坦召集了世界上某些最大的消费国和生产国的代表,企图通过共同协商以解决分歧。这次会议其实只不过是讨论召开一次大会的议程,但是甚至议程也成了辩论的焦点。阿尔及利亚、伊朗和许多其他国家坚决主张,议程应包括许多项目,其中应有石油、粮食、货币制度、国际援助、等等。但是美国拒绝讨论任何其他问题,而只愿讨论石油及其价格问题。

在这次辩论中,法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在会议过了一半时,德斯坦飞往阿尔及尔,同阿尔及利亚主席布迈丁商议,他们两人提出了共同的主张:议程必须包括第三世界希望讨论的和那些西方国家认为是主要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甚至拒绝再参加会议。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言人对美国退出会议作出反应说:“美国人长期来一直是劝我们要一道坐下来谈谈的。但我们刚希望谈谈除石油以外的任何事情时,他们便收拾行装走了。这说明他们只是希望利用象这样的一次会议为他们自己谋利益。”

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都提出了“强硬路线”的办法——一条对抗和横行霸道的路线。它们希望,依靠它们的核武库和游弋于世界各洋的海军,它们能够迫使第三世界完全接受它们所蛮横指定的经济关系。但是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第三世界已经在世界上不但如在越南战场上,而且在经济关系领域内,抗拒了这条道路。

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所赢得的胜利,甚至已对第二世界国家

指出,通向真正独立和发展的道路在于坚决地反对超级大国。这已为这些力量的团结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当欧洲国家面临着两个超级大国对它们的主权越来越广泛地进行侵犯时,情况更是如此。

(译自一九七五年六月号美国《号角》月刊 丘日庆译)

安哥拉报道

〔美〕肯尼思·L·阿德尔曼

安哥拉是葡萄牙最后放弃的领地，也确实困难最多的领地。自从一四八三年迪奥戈·卡姆首先来到他称之为“扎伊尔”大河的河口以来，葡萄牙一向以保有这块宝贵的领地自豪，它的面积为宗主国本身十四倍，差不多两倍于得克萨斯州。除了同葡萄牙有这些牢固的历史联系以外，还有几个使安哥拉向独立过渡成为紧要的、困难的以及如我们行将了解的那样具有潜在爆炸性的因素。



安哥拉是一个富饶的国家，相对地说尚未开发。的确，业已获得独立的国家几乎都没有这样的矿藏财富，没有这样的经济繁荣前途。现已发现具有丰富的石油、钻石和铁矿石，至于这块勘探工作搞得极少的土地还有些什么宝藏，那就谁也说不上了。由于它的矿藏财富，安哥拉完全可以在非洲成为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未加工的初级产品占全部出口的百分之八十，包括大量的农产品（原棉、鱼类制品、香蕉和木材都有出口，安哥拉还是世界上第四个出产咖啡最多的国家）。

由于这些自然资源，经济繁荣是不足为怪的。从一九六六年以来，安哥拉的实际生产增长率一直超过百分之六，一九七三

年出口总额增长百分之三十七，结果形成贸易出超的增加，达到令人惊奇的百分之八十三。一九七四年的统计还要更乐观，因为出口猛增，超过一九七三年第一季度，达百分之一百八十四，使得一九七四年第一季度贸易出超额差不多等于上年全年的出超额。虽然从上年夏季起，由于政治不安定，经济发展放慢了，当稳定的政府逐渐确立时，经济就会逐渐恢复的。安哥拉一九七三年国民生产总值为十五亿美元，似乎处在一个长期保持经济增长的时期。

在六百二十万安哥拉人中，白人大约有三十五万，因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除南非外，成为白人人口最多的地方。

部分地由于葡萄牙政府鼓励，六十年代初以来，很多新的移民来到这个地区。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七年间，安哥拉的外来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增加了四倍。这些移民大部分是农民、不熟练的和半熟练的工人以及轮班服役期满被迫留下来的葡萄牙士兵。因此，安哥拉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有为数很多的白人，而且在于他们半数以上是处在经济的低层。只有在安哥拉，人们才看到白人农民和黑人农民在毗连的土地上劳动。非洲各国首都中，也只有在独特的罗安达，人们才能突出地看到白人的佣工、建筑工人和手工工人。这个白人工人阶级的成员，一般把自己看做安哥拉人而不看做葡萄牙人，并且希望在独立以后留下来。他们已经把他们自己安顿好，正在过着充裕的生活，或许比他们在葡萄牙的兄弟们略微好些。此外，他们别无去处，因为葡萄牙的悲惨经济情况不能引诱他们回去；移居南非或其他非洲国家从事某种营生，又缺少资本。

安哥拉的白人有少数是比较典型的殖民地移民——商人、大农场主或者经理和行政官吏。这个集团实际上控制了安哥拉的经济和大部分地方政府，尽管有些黑人在行政部门中占有高

级职位(这是黑人发迹的传统的进身阶梯)。

安哥拉现代化部门中这种微不足道的黑人代表，是葡萄牙长期忽视殖民地教育和社会事业的反映。安哥拉识字人数的比例低得令人可怜，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在黑人中则低于百分之十，在白人中略低于葡萄牙本土，即百分之六十。

现在，初等学校教育大概是强迫的，虽然只有一部分黑人儿童入学。初等学校儿童升入中等学校的不到百分之十五。安哥拉大学几乎专为中等和上等阶级的葡萄牙人服务——在一千五百名学生中，黑人或混血儿都不到百分之三十。此外几乎没有黑人得到去外国读书的机会。

二

安哥拉各个解放运动集团的互相竞争，给葡萄牙人提出了无数问题，并给未来带来了严重的不安。不象在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葡萄牙人不能简单地把安哥拉移交给任何一个集团。四月政变时，有三个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其中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以下简称“解放运动”)又分裂为三派。

“解放运动”成立于一九五六年，其中一部分人是安哥拉和葡萄牙共产党的成员。它在一九五九年三月被逐出罗安达以前，还能够吸引少数追随者，大部分是城市知识分子。后来这个运动转到科纳克里，又到金沙萨，最后就一直设在布拉柴维尔。

一九六二年，“解放运动”选出的新主席是革命诗人、医学博士、被葡萄牙人逮捕过几次的直率的激进主义者安东尼奥·阿戈斯蒂纽·内图博士。不久他到美国旅行，寻求支援，但是由于他的共产党背景，没有成功。以后几年中，他几乎完全依靠俄国援助，阿尔及利亚也补助了一点钱。

内图博士是解放运动的领袖中的极左分子，赞成由国家控制生产工具，并同苏联紧密联系。由于内图是一个医生和知识分子，得以吸引许多受过教育的黑人、白人左派分子和混血种人。虽然他的追随者包括罗安达、洛比托和新里斯本的城市居民，他的大部分支持者还是来自本种族人，当时所有三个解放运动都是如此。内图是一个姆崩杜人，这个种族在黑人口中约略超过四分之一，并且据有罗安达附近的安哥拉中心地带。

“解放运动”的整个历史都因连续不断的内部纠纷受到损失。四月政变使治理独立的安哥拉的希望成为现实的可能性而不是遥远的梦想，但政变以后，这个运动却分裂为三派。杰昆·平托·安德雷德领导的一个有七十名知识分子和“解放运动”高级成员的集团，公开谴责内图的“主席说了算”和独裁统治，随后撤销他们对他的支持。更加严重的是，内图在赞比亚和安哥拉东部的军事指挥官丹尼尔·乔利奥·希潘达的叛变。一九七四年八月在卢萨卡召开的“解放运动”的会议期间，希潘达和安德雷德谴责内图忽视他在战场上的军队，却大肆挥霍，周游世界。当他们要求彻底清查“解放运动”的收入时，内图愤然走出会场，并把忠于他的代表一起带出，任凭其他一些代表随意选举希潘达为“解放运动”的新主席。

正当葡萄牙准备就独立问题进行谈判时，这次分裂发生了，使非洲总统们大大地感到苦恼。一个月以后，赞比亚、刚果共和国（布）、扎伊尔和坦桑尼亚各国总统在布拉柴维尔开会，强使三派重新联合起来，至少在名义上如此。早些时候，内图、希潘达和安德雷德曾经试图调和他们的分歧，但失败了。有关的非洲各国总统命令内图从飞机场回来并进行商谈，他却又一次离开这个首都。当时准备了一个精心制定的文件，任命内图为主席，其他两人为副主席，并创立两个委员会，采用复杂的投票程序决

定重大政策。但象所有勉强达成的协议一样，这个精心制定的计划不久就被置之不理，内图和希潘达都自称为“解放运动”的主席，随后相互把对方从运动组织中开除出去。

由于希潘达公开谴责内图使用纳粹的策略，杀害他的高级指挥官，充当苏联的仆从，他称内图是一个“反常的怪人”，这些分歧终于证明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葡萄牙人的帮助，内图得以占了上风。每当内图部分裂使他的地位急剧下降时，葡萄牙人总是设法使他不被打下去。葡萄牙人拒不承认其他派别，始终把内图看做“解放运动”的主席和唯一的发言人。葡萄牙人虽然公开宣称保持中立，但是利用政府控制的安哥拉广播电台，支持内图和他的具有极左思想的声明。这种偏袒的态度，渊源于葡萄牙人早已把内图看做最有势力和最聪明的解放运动领袖这个事实，渊源于他们自己的思想和内图的左派思想是类似的，而且还渊源于密切的个人的联系，特别是内图和他过去的同班同学、社会党领袖、现任葡萄牙外交部长马里奥·苏亚雷斯之间的联系。不管怎样，内图现在牢固地控制着“解放运动”的主要组织，在同其他两个较大的解放运动团体进行的蒙巴萨预备性会谈中，在同葡萄牙人进行的阿沃尔最高级会谈中，都曾代表了“解放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二月中旬，希潘达投靠了第二个较大的解放运动团体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以下简称“解放阵线”）。

三个运动中历史最长、军事上最活跃的“解放阵线”，幸而没有“解放运动”那么复杂，因为它一向由霍尔敦·阿尔瓦罗·罗伯托领导。这个运动在提倡恢复刚果王国的部落组织中有其根源。罗伯托自己是巴刚果人，曾在扎伊尔的金沙萨住过，在安哥拉本土则只度过最早的两年。罗伯托的团体搞解放战争始于一九六一年的三月起义，这次起义最后使葡萄牙人死去四百，非

洲人牺牲的则有四万之多。一九六二年三月，罗伯托任命其他部落的一些成员、包括奥维姆崩杜人乔纳斯·萨文比担任他的流亡政府的领导职务。但是这种扩大他的种族基础的企图失败了，现在“解放阵线”差不多完全依靠巴刚果部落的支持（这个部落现时估计约为安哥拉黑人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包括现在居住在扎伊尔的七十五万到一百万安哥拉巴刚果人）。“解放阵线”的军队在各个解放运动中力量最强大，从而在人民的支持下，全凭军事力量，就控制了安哥拉北部。

罗伯托讲求实用主义甚于讲求意识形态，从一切可能的来源多方筹集援助——如六十年代初美国的政治支持和财政帮助，七十年代初世界教会理事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医药供应，最后在一九七四年有来自罗马尼亚的武器和来自中国的顾问及装备。但是这些年来，大部分外援始终是扎伊尔提供的金钱、军用帐篷、顾问和全面的政治支持。罗伯托虽然最近同罗马尼亚和中国结成同盟，在三位解放运动领袖中，他仍被认为是最倾向西方的。

第三个团体，即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以下简称“全国联盟”），开始是“解放阵线”的一个支流。一九六四年，乔纳斯·萨文比放弃他流亡政府外交部长的职务，谴责罗伯托的“极端丑恶的部落主义”和从“美帝国主义者”取得援助。萨文比当时象是试图参加“解放运动”，但被拒不接纳。不管怎样，他动手搞他自己的，一九六六年建立了“全国联盟”，可是在第二年便因破坏赞比亚到西海岸的联络线——本格拉铁路而被驱出他在卢萨卡的基地。后来萨文比住在开罗，一直到一九六八年中期，那时他的团体回到安哥拉东部，成为第一个完全在国内开展活动的解放运动。葡萄牙人容许他们这样干，因为葡萄牙人认为“全国联盟”较当时正在这个区域作战的其他两个运动好一

点，也因为他们只有很少的军队，不能构成军事威胁。

萨文比从洛桑大学获得政治学的学位。从一九六八年起，他一直是热衷于实行提高农民政治觉悟、发动农村地区革命的毛泽东的策略。他把他在奥维姆崩杜人（安哥拉最大的语言和种族的团体，约占黑人居民的百分之三十三，大部分住在南方）中所得到的支持加以巩固。虽然在前几年可以从中国得到一些装备，但萨文比不靠外部援助而继续存在，自豪地声称他的武器有百分之八十不是巧妙地弄来便是缴获来的。

从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八年的“十二个带刀的人”开始，到一年以前，“全国联盟”已戏剧性地成长为混乱一群的小团体，今天又成长为羽毛丰满的人民运动。这种成就，一部分是由于萨文比的政治敏感性，他在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运动”和保守的“解放阵线”之间创立一个中立的、温和的运动。萨文比虽然宣称社会主义并保护农民不受资产阶级剥削，却不是一个空想家，因此在政治上比内图更为灵活。他不象罗伯托，实际上不依靠外部援助，这使他能自行其是，几乎不受什么限制。最后，萨文比比罗伯托或内图更容易赢得非洲领导人和新闻记者的尊重和信任。很多人认为罗伯托只有一般的才干，内图虽然很聪明，但却冷酷而固执。萨文比现正赢得众望，在今天的任何自由选举中一定会得到最多的选票，这基本上是因为他所获得的支持具有最广泛的种族基础。“全国联盟”由于得到安哥拉白人商人、特别是南部白人商人的捐助，现在开始摆脱过去筹措经费的苦恼。

在解放力量分裂为三个集团的地方，向独立过渡是很困难的，从最近几年所有三个集团之间的异常强烈仇恨和冲突看来，这种过渡的前景已是完全可以预料的。每个解放运动同葡萄牙人作战都有自己的种种难题，他们的相互斗争又消耗了很多时间。一九六一年的叛乱使安哥拉北部人口大大减少。此后，“解

放阵线”不能再进行有效的游击战争，而这种战争的成功是要依靠地方人民的支持和保护。总部设在布拉柴维尔的“解放运动”，主要因为扎伊尔禁止“解放运动”的军队通过它的领土前往安哥拉北部作战，就有怎样投入战斗的种种问题。邻近的卡奔达是“解放运动”的主要战场，却有其自己的解放运动在积极地反对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此外，安哥拉东部是“解放运动”另一可以作战的地方，但相距很远，又缺少森林、村民和葡萄牙士兵。“全国联盟”则缺少武器、金钱和受过训练的战士；再者，作战如果过于频繁，就常常会被葡萄牙人赶出去，而且因为这个集团早已受到卢萨卡、布拉柴维尔和金沙萨驱逐，又可能无家可归。

因为这些困难，反葡萄牙的战争劈里啪啦打了多少年，却没有什么实际的积极的成果。例如，在一九七三年全年，葡萄牙人只损失八十一名士兵，其中真正在战斗中被打死的不过十五人，余则死于地雷。这些解放军部队虽然在非经常性的散兵战中打败了，还是为赢得战争作出决定性的贡献。由于十四年来迫使葡萄牙在安哥拉保持五万到六万人的一支军队，正是这些解放军部队制造了足够的愤慨，以致引起葡萄牙的政变。

这些解放运动虽然是偶然遭遇到葡萄牙人，但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彼此都积极地相对抗。“解放运动”阻止“解放阵线”把控制力量扩展到接近罗安达的姆崩杜人地区，于是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在安哥拉北部发生了战争，这个战争在相当规模上一直继续到政变。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四年初，在东部，“解放阵线”和“解放运动”之间的战争又发展了，当时实际上是两个集团在互相消耗力量。“全国联盟”也卷入这次冲突，在其北面同“解放阵线”作战，在其南面对“解放运动”作战。

尽管这三个团体的共同目的是把葡萄牙赶出安哥拉，他们在政治上却从来不设法进行合作。一九六一年十月，其中的两

个团体(在金沙萨都有总部)曾讨论过合并问题,但罗伯托却止步不前,他说“解放运动”中共共产党的势力太大了。一九六二年八月,内图和罗伯托又讨论合并问题,但是这些谈判在两天以内就结束了。他们第一次合作协议,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签字的,后来很快地就被置之不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扎伊尔总统蒙博托企图把这三个团体联合起来突然搞一次漂亮的行动,但是因为内图既不相信罗伯托,又不相信蒙博托,不敢按照协议的规定将总部迁往金沙萨,这一努力很快地就归于无效。一九七四年七月,三个团体又在扎伊尔的布卡武签订一次协议,声明他们要完全合作,并且对葡萄牙人提出一个联合阵线。在几个星期以内,这个协议还是被所有三派置之不理。协议的主要设计者蒙博托后来由于护送“解放阵线”的一名高级官员参加同斯皮诺拉将军的秘密会议,单方面提出“解放阵线”的意见,从而公开地违反了这次协议。

不断增加的国际压力和葡萄牙人对建立过渡政府缺乏耐心,导致了达成新近的一些协议。一九七四年底,萨文比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与宣传”和在同葡萄牙谈判中提出一个联合阵线等问题上,分别商得“解放阵线”和“解放运动”的同意,为签订这些协议铺平了道路。最后,一九七五年一月,“解放运动”和“解放阵线”在肯尼亚的蒙巴萨预备性会谈期间,签订了双方协议中最后一个文件。当然,这些合作协议实际上究竟维持多久,仍然有待观察。

除上述三个运动以外,原来还有安哥拉的第四个最大的种族团体——白人移民。四月政变以后,葡萄牙人声言现有的三个解放团体可以代表全体安哥拉人,拒绝承认任何白人运动。这种政策开始引起白人的忿恨,其中很多人曾经积极反对解放运动,有一个时候,还担心发生白人叛乱,也许是担心罗得西亚类

型的单方宣告独立。一九七四年春季和夏季，这样一种叛乱的条件已经成熟：白人害怕的，不是未来的激进的政府，就是内战；不必担心葡萄牙军队会去反对白人移民，几个月以前，葡军在莫桑比克已经拒绝这样做了；而且在全国没有能够抵抗叛乱的解放军部队。尽管有恐惧，叛乱并没有实现，除了九月和十月在罗安达发生较小的偶然事件以外，白人移民一直是出人意外地保持消极态度。

几个因素有助于解释他们在政治上的克制。政变以后，很多白人立即因为旧的独裁统治已经过去而感到安慰，但是也许没有认识到最后可能发生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他们完全是无组织的，在政治上也无经验。白人居民——从上层的企业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直到普通工人和不识字的农民——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确是层次太多，不能形成一个单一利益的集团。此外，即使有这种愿望，他们也不知道怎样有效地把自己组织起来。安哥拉始终是由里斯本控制的，地方上并没有参与或体验政治生活的机会。简单地说，当白人有机会掌权的时候，却没有引导运动发展的组织或领导人员。在那时以后出现的两个白人团体，所谓基督教民主党和安哥拉联合阵线，都没有追随者，不是被解散了，就是在政治上不起什么作用（这种缺乏政治经验的情况同罗得西亚显然相反，在那里，白人是高度组织起来的，而且在一九六五年单方宣告独立以前，实际上经营他们自己的事业已有三十二年）。大多数安哥拉白人既然是工人阶级，他们或许不是那么感到立即受到独立的威胁；他们没有投资，他们不妨认为，至少在可能危及他们的工作以前，政府的变更是不会使他们受到损失的。最后，又有人坚持说，多少世纪来葡萄牙人在种族问题上的宽大态度，可能已经消除了白人生活在黑人领导下的一些恐惧情绪，而在其他非洲殖民地中，这种恐惧是非常普遍的。

很多白人并不积极反抗，已经离开安哥拉，虽然退出的人数远不如离开莫桑比克的那么多。葡萄牙当局估计一九七四年离开的白人大约为四万。但是，其中大部分是暂时离开家属，因为家长一般都把他的家属送到里斯本，直到新政府建立。

留下的白人大多在等待并且希望迅速而和平地向独立过渡。有些人采取和黑人非常相同的方式，不断参加那些解放运动。因此，南方的白人农业工人加入“全国联盟”，北方的矿产和咖啡的大生产者加入“解放阵线”，城市的无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则加入“解放运动”。葡萄牙限令白人在政治上只能参加上述三个团体之一，这种政策在长期内也许是有利的。这种政策鼓励白人加入一个有机会治理全国的团体，禁止他们组织独立的种族组织，并鼓励他们当团体要求白人支持者援助的时候，在各个解放运动内部作为一种调节力量发生作用。

三

使安哥拉向独立过渡变得错综复杂的最后因素是卡奔达的脱离主义运动，卡奔达是安哥拉在外国境内一块很小的地区，虽然在地理上是同它分开的。由于这个地区的丰富石油资源，卡奔达问题本身是重要的，而从安哥拉本身的领土完整来说，对卡奔达的控制则是象征性的。

卡奔达是一个只有七千平方公里、插进刚果和扎伊尔之间的很小地区，人口不到八万。葡萄牙首先对坚硬木材的森林感兴趣，签订了一八八五年锡米尤兰布科条约，这个条约规定这个在外国境内的领土归葡萄牙保护，对它的地位作任何改变，都必须同卡奔达人民协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萨拉查为了行政目的把卡奔达并入安哥拉，而且宣称这些地区合在一起都是葡萄

牙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从而违反了这项规定。

一九六六年在靠近卡奔达海岸的地方发现石油以前，这个问题是比较不重要的。已查到的蕴藏量非常大，随着钻井逐年增加，看来前途更有希望。一九七四年间，卡奔达每日平均出产石油十五万桶，按照一九七四年石油价格，当地政府的全年产值约为四亿三千万美元。这使这个小小地区对于独立的安哥拉，对于卡奔达人自己（他们单从石油收入就可以每年每人平均得到五千多美元），对于邻近的刚果和扎伊尔两个国家，都是十分有价值的。

卡奔达的领导人认为，在种族方面和文化方面他们自己都不同于安哥拉人，行政上把他们同安哥拉人联合起来，迄今还不到二十年。因此，他们组成自己的解放运动，即卡奔达被包围领土解放阵线（以下简称“卡奔达解放阵线”），倡导从安哥拉分出来，自己独立。这个解放阵线曾请求在非洲统一组织或联合国主持下举行公民投票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它同时也建立了自己有一千名士兵的军队，其中半数以上曾在葡萄牙军队中服务，因此，有非常好的训练。“卡奔达解放阵线”的军队，得到蒙博托总统很大支持，并经常驻扎在扎伊尔，几年来不时同“解放运动”在卡奔达的军队作战，最近的冲突发生在去年十一月。

直到最近，葡萄牙当局对“卡奔达解放阵线”的意见，是非常愿意考虑的，刚果和扎伊尔也暗中支持这个运动，各自让“卡奔达解放阵线”的一个派别在它的首都活动，并且加以资助。刚果和扎伊尔一直是这样做的，尽管“全面支援”同它们结盟的两个解放运动（即“解放运动”和“解放阵线”）。但这两个解放运动则强有力地反对卡奔达独立。在蒙巴萨协议中，经三个运动领导人一致同意的第一个、实际上也是唯一的原则，是通过保留卡奔达作为“安哥拉领土不可分割和不能转让的一个部分”，以“保护安

哥拉的领土完整”。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五日最高会议协议中，经取得葡萄牙的同意，重申了这句话。

因为卡奔达这个小小的被包围领土久已不能完全保持独立，正如安哥拉难题中的每个因素一样，卡奔达这一部分也是复杂的。卡奔达假如不能牢固地成为安哥拉的一部分，最后将会证明那个价值五亿美元的不动产对扎伊尔或刚果的诱惑是太大了。

除了卡奔达本身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以外，解放运动领袖们还认为它是安哥拉统一的象征。非洲黑人的种族感情仍然十分深厚，决不能拒不考虑分离主义运动。安哥拉有三个较大的种族团体，据有国内的不同地区，现时在政治上各自由一个解放运动代表着，那里的形势是特别严重的。与其说安哥拉有三个民族解放运动，倒不如说有三个希望接管全国的地区的基本上是种族的运动。任何一个运动如果不能成功，它也很可能试图在国内割据它那一部分地方，脱离安哥拉。安哥拉的运输系统证明是最有利于实行脱离的，因为公路和铁路几乎完全是由东向西，由内地向海洋的，这是非洲殖民地运输系统的典型。把安哥拉居民分开的宽扎河只有一条由北向南的主要公路越过河面，没有铁路。可以设想“全国联盟”可以只用破坏横过这条河的主要桥梁和封锁飞机场或沿岸港口的办法，使南部从北部分出来，从而建立一个在防御上很安全、在经济上可以自立的、具有大量农业和矿产资源的地区。象“解放阵线”那样的运动，特别是有了蒙博托的军事支援，则能使北部从南部分出来，而且依靠钻石、咖啡和矿产资源的收入，完全可以维持下去。因此，萨文比公开表示，真正的危险在于，如果卡奔达丢了，就“会在安哥拉其他地方激起脱离主义运动”。

四

安哥拉的矿藏财富和经济繁荣的前景，为数很多但没有组织起来的白人人口，三个解放运动内部和相互间的强烈冲突，以及卡奔达的脱离运动和产生其他脱离主义运动的可能性，这四个因素使此时此刻的安哥拉成为外来势力不受限制的和有引诱力的地区。邻近的非洲国家都特别关心那个地区的发展，因为这些发展必然要影响它们的前途。安哥拉有重要的出口产品，又有运输这些产品的工具，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但邻国扎伊尔和赞比亚就不是这样，它们依靠安哥拉的运输网。卡奔达的邻国扎伊尔和刚果对那个宝贵的地区的前途显然有非常热烈的兴趣。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国家也都被卷入安哥拉的局势中了。

最近，“解放运动”主席内图说：“在我们摆脱葡萄牙的殖民主义以后，我们必须从我们的邻人和兄弟的殖民主义中得到解放。”他首先提到蒙博托总统，今天，就安哥拉来说，这位总统卷入最深、也是最强有力的外在势力。扎伊尔在安哥拉的事态中有着巨大的利害关系，这种情况是极其自然的。两国一千五百英里的共同边界，把各个重要的部落团体、最突出的是把巴刚果人隔开了。由于这个区域过去发生的冲突，在两边都有逃亡者，在扎伊尔现时有多达一百万的安哥拉人，在安哥拉的加丹加叛军则有四千之多。安哥拉的本格拉铁路是扎伊尔主要出口产品铜的一个主要通道，从那里获得国家外汇收入的四分之三。甚至在葡萄牙统治下，当时蒙博托也完全支持解放运动，他通过安哥拉连续送出差不多百分之四十的铜，如果政治情况好转，数字一定会增加。一个友好的安哥拉可以向扎伊尔供应非常需要的食物。另一方面，一个多少同扎伊尔有联系的独立的卡奔达将

是最受欢迎的，正如蒙博托大规模参与训练和装备“卡奔达解放阵线”的军队所表明的那样。最后，过去九年多中，蒙博托对霍尔敦·罗伯托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他总不愿意看到这项投资被浪费掉。

在政治上，蒙博托需要和平的安哥拉边界，使他有时间去形成一个以颂扬领袖（被不客气地称为蒙博托主义）为基础的新的扎伊尔政治制度。边界纠纷可以破坏他列在国内最优先地位的这个宏伟计划。在国际方面，安哥拉给蒙博托以争取外交威望的最重要的真正的机会，这是他在过去几次范围广泛的旅行中徒劳无功地追求的东西。蒙博托渴望成为非洲大陆领袖的形象，对安哥拉局势起了最显眼的作用，策划了几次失败的协议，诸如一九七三年“解放运动”和“解放阵线”的合并以及布卡武和布拉柴维尔等协议。

蒙博托以调解人的角色变为辩护人的角色，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罗伯托辩护。他不顾自己策划的布卡武协议，在九月同斯皮诺拉将军和“解放阵线”一个代表会见。为了削弱罗伯托的主要对手内图，蒙博托鼓励希潘达叛变（有人说是用大量资金作为诱饵的），并且一直把希潘达称为“卢萨卡大会选出的‘解放运动’主席”。在苏亚雷斯外长多次到金沙萨期间，蒙博托试图说服他同希潘达谈判，不要同内图谈判，但是没有成功。总之，扎伊尔在安哥拉的过渡中有很大的利害关系，蒙博托将尽一切可能保证这次过渡以罗伯托的成功告终。

赞比亚参与安哥拉的问题，一向比扎伊尔公平些，但它在这个地区的利害关系也是很大的。赞比亚同安哥拉的六百英里边界并不太重要，因为这个地区的居民和查明的资源都特别少。特别关键性的是，安哥拉的运输网乃是赞比亚通向海洋的生命线。两年前罗得西亚就封闭了它的边界，最近又发生坦桑尼亚限制

使用它的公路的问题，因此，赞比亚现在必须依靠本格拉铁路，把它足足过半数的铜运出去，而铜是赞比亚唯一的重要出口产品。这条联络线是如此重要，以致卡翁达在一九六七年把萨文比驱逐出境，为的是后者妨害赞比亚使用这条铁路。由于葡萄牙人即将离开和坦桑尼亚施加限制，赞比亚业已请求安哥拉让它三分之二以上的铜运出去，赞比亚的经济将来几乎完全要依靠安哥拉。

赞比亚在政治上一向是中立的，支持所有的解放运动，而且多次允许内图的“解放运动”、希潘达的“解放运动”、“全国联盟”的军队，通过它的边界进行军事活动。在整个战争期间，特别是政变以后，卡翁达都在强调和平和团结，这与他的非洲人道主义哲学，与他要在新兴的非洲国家中取得领导地位的愿望是一致的。尤其是，卡翁达总希望安哥拉和平地向独立过渡，这样可能使铁路运输的延误减至最小限度，并消除洛比托海港现时由于政治不稳定而发生的工人问题。

刚果(布)由于意识形态和经济两方面的考虑同“解放运动”发生关系已经很久。它可能欢迎在那个地区有一个象内图那样的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同盟者，而且确实是渴望插手卡奔达。对于经济贫困的刚果说来，卡奔达比对矿藏丰富的扎伊尔具有更深的意义。

最后，南非由于安哥拉和纳米比亚(西南非)相邻而拥有经济投资，在安哥拉也有利害关系。在罗安达如果是一个敌对的政府，一定会加强纳米比亚游击队的活动。南非在安哥拉有投资，包括安哥拉—纳米比亚的库内内河大规模水力发电系统以及安哥拉的钻石、矿产和本格拉铁路的私人股权。

正因为这些非洲国家在安哥拉事态中有那样重要的利害关系，它们将继续施加政治影响来引导未来的局势。刚果和扎伊

尔将分别在安哥拉赞助“解放运动”和“解放阵线”，并在卡奔达独立的问题上赞助“卡奔达解放阵线”中与它们自己有关系的派别。反之，赞比亚则希望政治分歧得到迅速地和平地解决，只要火车按时行驶，对于究竟是谁打赢，并不真正关心。在这些国家中，扎伊尔、而且只有扎伊尔，除了它的政治影响以外，如果觉得必要的话，还可以考虑进行军事干涉。

安哥拉事态中比较间接但仍然很重要的，乃是美国和俄国等国的影响。十二月间，希潘达说他盼望大国对安哥拉局势发展的结果施加影响。蒙博托显然赞成这种意见，因为他打算十二月到莫斯科去，阻止俄国对内图进一步的帮助。

六十年代初，美国暗中支援霍尔敦·罗伯托，首先同解放运动有牵连。但是，从肯尼迪政府以来，美国对所有解放运动一直公开表示中立，当时在罗安达盛传的关于中央情报局不断对“解放阵线”给予大量支援的谣言，美国官员还加以否认。美国在安哥拉的主要关心，在政治上是鼓励在一个有潜在力量的非洲大国建立友好的政府，在经济上是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特别重要的是美国第四个最大的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的利益，它对卡奔达的石油具有专利权。就贸易来说，美国是从安哥拉输入货物的主要国家，甚至走在葡萄牙前头，也是向安哥拉输出货物的第三个最大国家。国会最近通过对葡萄牙和它的前非洲领地都给予外援的提案，表明了美国的积极兴趣。

苏联一开始就支持“解放运动”和内图，这是为了要在这个地区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方面争取另一个盟国，一个有希望比刚果(布)强大一点的盟国。

尽管大国在安哥拉有利害关系，历史情况也很复杂，目前的局势还不大可能引起大国的对抗。

五

在今天安哥拉这样的复杂局势下，预言今后事变的任何方向，看来可能都是笨拙的。一年前，谁也不能想象这个世纪的任何时候葡萄牙会自动放弃安哥拉，六个月前，几乎没有人认为萨文比是一个重要的领袖。然而历史事实，连同最近涌现的事件，的确说明了某些显而易见的和多少还不明显的结论。

首先，或许最明显的是，将要统治到今年十一月的安哥拉过渡政府，势必充满内部斗争，而不是有效的管理。三个解放运动领袖和葡萄牙官方人员在一月十五日签订的阿沃尔协议，规定四方分别管理政府的各个方面，并使每一方得以对其他各方实行牵制。这个方案要求葡萄牙高级专员保证各方遵守这个协议，帮助指导外交政策并参与公布法令。设立一个三人的总统委员会，每一个解放运动各派一名代表组成。总统委员会规定了一个相当独特的轮换担任总统职位的办法，并且同政府各部公布法令有关的重要问题，须经三分之二多数表决。对十二个部的控制权则由葡萄牙和三个解放运动加以公平分配。

新的政府机构，虽然似乎过于复杂，但是它却迫使三个解放运动领袖中必须有两个同意，才可以采取任何重大行动^①，也给葡萄牙官方人员以重大权力。方案的最大弱点是各部的分配，这将引起无数纠纷。“解放运动”似乎得到了精选的最好的几个部，即宣传、计划、财政以及司法等部，从而控制了广播电台，财政和法院系统。“解放阵线”没有这样好，只得到一个重要部，即

^① 因为某些理由，三个解放运动的领袖在阿沃尔决定，他们都不应当正式参加过渡政府。因此，内图、罗伯托和萨文比虽然仍是他们各自的运动（仍然几乎完全象几个独立的团体那样继续存在）的主席，他们在安哥拉却没有官方的职位。

内政部,包括一些内政方面执行法律的官员和地方当局。“全国联盟”也只得到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即劳工和社会保障部,处理全国劳工事宜。利用这些职位来推进各个解放运动,冲突是可能发生的;无疑还会有种种非难:广播电台偏向“解放运动”,执行法律的官员正在助长“解放阵线”的势力,劳工部的官员们对“全国联盟”给予政治支持比对合理解决工资问题更加关心。

现在安哥拉的军事形势确实紧张,境内有五个单独作战的部队,各有各的武器、队伍、司令官,各有各的目标。安哥拉如能在没有破坏性的内战和全面混乱的情况下向独立过渡,这个在经济上富有的真正多种族的社会就可以很好地把曾经是世界上爱搞种族争吵的麻烦的区域引向和谐的发展。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四月美国《外交季刊》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谷凡译)

美国农业的困境

〔美〕威尔逊·克拉克

直到最近，大多数美国人才得到足够的粮食供应。这个国家强大的农业劳动生产力一直被认为是减轻世界粮食危机的最有效的希望。但是，美国的农业体制正开始显示出衰老的迹象。

美国粮食生产的关键（有些人则认为是最虚弱的环节），是农业对矿物燃料的依赖超过了对人力或畜力的使用。史丹福研究所为国内防务局所作的研究项目中，对农业依赖于能量的情况，阐述得十分清楚。他们说：“我们能够立即表明，如果没有石油，美国的农业生产实际上是不可能进行的。”

在农业上，能量的基本用途是用于开动种植、喷药、施肥和收获作物的机械。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迈克尔·佩雷尔曼指出，在美国，开动五百万台以上的拖拉机，需要八十亿加仑的燃料，即相当于它所生产的全部粮食所含的能量。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今天，在我们桌子上的食品，可以说，既来自活的植物，又是死的植物（矿物燃料）中生产出来的。最近，几个石油公司已开始从事于直接从矿物燃料中提炼单细胞蛋白质的试验，打算完全不使用土地，而把人类粮食生产直接同矿物资源联系起来。

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巴里·康门纳和他的同事进行的研究表明：生产化肥以及农药和除草剂等农用化学品，都需要广泛利用矿物燃料的能量。根据康门纳的研究，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六八年间，农用氮肥和农药的生产分别增长了百分之五百三十四和百分之二百十七。在伊利诺斯州，如果要求一九六八年的亩产量同一九四九年的亩产量相等的话，化肥使用量必须大大增加：一九四九年需要一万一千吨氮肥，而在一九六八年，则需要五万七千吨氮肥。

虽然，一九六八年的玉米亩产量多于四十年代，但实际上，化肥对作物的效果却下降了五分之四。而且，化肥的过度使用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如水源中增加了硝酸盐的成分。然而，我们就是靠化肥才提高传奇式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自从最近国际石油价格逐步上升以来，生产化肥的成本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即使在如此高价的情况下，一九七四年也还出现了缺少五十万吨肥料的情况。这种不足的现象也许还要变得更坏。

在现代化农业中，灭虫和除草也要依赖于化学合成物。这些化学合成物大多数是从矿物燃料中得到的。在原始的农业中，控制害虫的基本办法是种植多种多样的作物，这样将不致于因虫害而颗粒无收。这种办法在大规模的、单一经营的生产中是不现实的。在现代化大生产中，一种小麦或玉米被种植在连绵许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而依靠农药和除草剂虽然可以使生产上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但却造成了环境污染的后果，并遭到了社会上严肃的、大量的指责。最后，纵使环境污染不能强迫农业少用能量，但石油危机或许可以迫使回到较少使用能量以控制虫害的方法。

在用机械装备的现代化农业中，另一个大量耗费能量的方

而是灌溉。加利福尼亚州设计了一个复杂的水坝和渠道工程，预计能把水从该州的北部引到该州南部的农田里。完成这项水利工程将花费一百二十亿美元（加利福尼亚州每人约负担五百美元）。这个水利工程的灌溉设备，估计每年需用一百三十亿度电，而水坝工程的净发电量只有五十亿度，这样，每年还将缺少八十亿度的用电量。

机械化和农业化学品的广泛利用，改变了美国粮食生产体制的本质和面貌。在郁郁葱葱的旧金山南面的色灵勒丝山谷，那里的农业已变成一项重要的工业。到处是农业机械在播种、施肥、撒农药和收获。十年前，每亩作物用上三百磅化肥，仿佛已经够多了，而现在，在色灵勒丝山谷的两熟制土地上，每亩地每年施肥超过了一千磅，有的甚至高达二千五百磅。机械化收割还能够把农作物在田野里立即装箱运到附近的仓库去，然后，用卡车或火车把这些产品运送到美国各地。

联邦能源管理处的埃里克·赫斯特发现，在一九六三年，粮食生产部门平均给消费者一个单位的粮食能量，就要消耗六点四单位的能量（其中大多数是从矿物燃料中得到的）。另外，那些经过加工的水果和蔬菜消耗能量就更多了，每供应消费者一个单位的食物能量，要消耗十五个单位以上的矿物燃料能量。在今天，这个比例甚至会更大一些。

美国人从食物中获得高能量的一个基本办法是大量消费动物蛋白质，特别是吃牛肉。法兰西斯·穆尔·拉配在她的《为一个小行星的饮食》一书中指出，一亩地生产的谷物中所含的蛋白质，比用一亩地的谷物饲养牲畜所得到的蛋白质多五倍；种植豆科植物（豌豆、蚕豆）所得到的蛋白质比肉食中所含的蛋白质多十倍；种植多叶的蔬菜更是比肉食中所含的蛋白质多二十倍。正如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粮食专家乔治·博格斯托罗姆说的，富裕

世界的牲畜直接同贫穷世界的人民争夺粮食。”他还认为，富国和穷国之间在食物热量消耗上的差别，远远超过了通常所认为的标准。在美国，平均一个成年人每天消费的食物热量是三千三百卡；但是，在印度，则只有一千九百九十卡。而且，在印度肉食消耗量也是非常低的，印度人只能从肉食中得到七百六十三卡的追加热量；而美国人从肉食中得到的追加热量高达一万零十七卡。博格斯托罗姆说：“在美国和印度，每人每天吸收食物热量的差异，并不是通常所说的一千三百十卡，而是超过了九千一百八十二卡。这件事情的本身反映了一个可怕的差异，它阐明了一个被严重漠视了的粮食和人民的争端问题。”

按照密歇根州立大学生态系统设计和管理规划主任赫尔曼·凯尼格的意见，美国的肉类生产过分机械化了，以致效率反而不高。一些牧场能同时饲养好几万头牛，例如在科罗拉多州，格雷里附近的蒙福特公司的牧场，操作是在计算机控制下进行的，高度的自动化，每年可以饲养和屠宰十万头以上的牛。当牛重七百到八百磅时被饲养在栏圈里，五个月以后，长到一千一百到一千二百磅时，就被屠宰了。大量的玉米从饲料产地，从公司的仓库里装运到蒙福特，在这里进行饲料加工。公司的加工厂每天为饲养牛而生产的玉米片比克洛格公司为市场消费者食用而生产的还要多。

如此庞大的操作过程造成能源的浪费，根据凯尼格的意见，饲养二百到三百头牲畜的牧场，才能够高效率地利用能量和资源。从地区和全国来看，我们可以设想，规模较小的牧场有利于经济的改革和节约能量。“我们还将开始考虑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那就是限制机械化的规模，以提供就业机会的可能性。这个办法既能增加工人的就业人数，发挥人的潜力，并能使我们同自然环境的关系更为和谐，同时也能够减少一些社会的压

力。”

甚至，就连那个曾经为促进大规模农业发展做了很多工作的农业部，在它已发表的几个技术研究报告中，也证实了小农场具有非常高的效率。农业部的经济研究机构说，“完全机械化的个体农户，有能力凭借机器从事于大面积的农作物生产，这样的小农场普遍是技术效率很高的农场。如果从农作物生产的单位成本来看，小农场所取得的经济效果是最好的。”

尽管如此，小农场仍然不断地从美国的土地上消失，而联合的大农场的出现已成为规律。坦尼科公司就是这样的例子，它在石油、化学和造船工业等方面都拥有巨大的资产，它已进入加利福尼亚和西部其他各州的联合化大农业中。这个企业的格言是：“我们从事农业的目标，是从秧苗到超级食品市场的整体化。”

美国的农业体制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它从合理利用资源到大量浪费有限能源，从小农场到工厂化大农场，但是，正如威斯康星大学研究人员约翰和卡罗尔·斯坦哈特所说：“农业工人和食品工人完全没有缩减，改变的仅仅是工人所做的工作。昨天的农民，今天成了制罐工、拖拉机修理工和快餐服务员等。”伊利诺斯大学计算中心的布鲁斯·汉农最近举例说明，食品包装也需要耗费能量。在全国各地开设的麦克道尔德饭店一九七一年内用了一千二百七十万吨煤，平均每个顾客要耗煤二点一磅。当代美国的生活方式为能源的浪费大开了方便之门。

在今天世界各地面临饥馑的情况下，美国的粮食浪费和农业体制的弊病更是一件最大的恨事。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二月《思潮》杂志 上海市五七农场青年工人杨建文译）

日本的幻想：食品自给

〔美〕罗兰·A·米尔豪泽

日本正在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试图增加食品自给的斗争。一九六〇年的自给率是百分之九十，一九六五年是百分之八十一，一九七三年为百分之七十三。如果扣除了进口饲料，即使一九七三年的百分之七十三这个数字也是虚假的，实际的自给率将缩减到百分之五十三。

在一九七二年财政年度里，日本的农业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六，超过了上一年，这是四年来的第一次增产。

一九七三年，种菜的土地只占农田总面积的百分之四，比上一年要少。这一年，包心菜、胡萝卜和洋葱都减产了。

今天，整个世界的储备粮只能满足四十亿居民吃二十七天，因此，日本加强食品自给的目标决不能轻易放弃。代表日本稳健派实业家、享有声望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说：“把我们的食品自给率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三或八十是很重要的。”日本农林省仍然期望到一九八二年，在蔬菜、水果、鸡蛋、牛奶和乳制品方面的自给率能高于百分之八十。

真有可能吗？当然，这是能够做到的，不过这需要花费惊人的补助金，而这将会毁坏整个日本的经济。

普遍关心稻米

就以政府给的稻米增长补助金为例，多年来，日本政府曾对

种植者付出了相当可观的“生产者价格”来购买稻米，同时又以较低廉的“消费者价格”出售给商人。

结果是，日本的稻米自给率提高了。一九七三年稻米收获量为一千两百一十五万吨，其中消费量为一千一百五十万吨，还有百分之五点三的剩余。但在政府的粮食专户中却出现了五千六百亿日元(约合十八亿六千六百万美元)的赤字。

今年大米的生产者价格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二点二。农民协同组合要求增加百分之九十六点三，全国农协会则要求增加百分之六十四点七。

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是日本最大的工会组织，它支持农民的立场。日本四个在野党都表示，这种增加是不够的。与此同时，各个在野党都坚持反对提高大米的消费者价格。

目前大米的生产者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二点二，消费者价格也应当有所提高。否则，今年的政府粮食专户中将会出现一亿零六百六十亿日元(约为三十五亿五千三百万美元)的巨大赤字，这笔金额同日本当前的国防预算差不多。

现已决定，自十月一日起，把大米的消费者价格提高百分之三十二。这将导致整个日用品价格上涨百分之一一点零八八。如果要完全补偿大米生产者价格的增加所造成的损失，大米消费者价格就必须提高百分之六十一一点七。

百分之五十七的谷物不足

日本的谷物自给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三。今年，政府对小麦种植者的补助金空前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点一，而生产者却要求增加百分之七十三。政府希望依靠这些补助金，使小麦自给率到一九八二年能达到百分之十五，而现在只有百分之五。

据说，今年北海道的小麦种植面积几乎是去年的一倍。然而，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自从一九五〇年以来，小麦种植面积正在慢慢地减少”，并且今年只比去年多百分之二或三。

《日本时报》的一篇社论指出：“即使一九七四年提高了小麦价格，可是，农民的种麦收入仍然远不及种稻的收入。”

日本社会党将在下届议会上提出一项解决谷物缺乏的简易提案，以便日本能在十年内，达到米、小麦、大麦、大豆和其他主食的自给自足。它们号召采用一种双重的价格制度。依靠这种制度，农民就将得到应有的补偿金，而消费者只需付出合理的价格。

日本现在每年进口小麦约六百万吨。在一九七三年财政年度期间，这项支出已增加到百分之二百一十六点一。虽然如此，但毫无问题的是，进口象小麦之类的谷物，还是比在日本国内种植的要便宜得多。

新的奢侈品：肉类

去骨牛排，在东京每磅价格是十三点五二美元，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是两点二九美元，而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是一点九三美元。今天，陈列在东京百货公司的最上等牛肉每磅价格是四十五美元。

日本人的牛肉消费量虽有增加，但它还远远落在美国人的后头：日本每人每年的平均消耗量是八点五磅，而美国是一百一十六磅。由于价格昂贵，最近日本的牛肉消费量正在大幅度下降。

大量增加日本肉用牛的说法，是十分荒唐的。日本曾进口了它的动物饲料的百分之七十，在过去的十八个月期间，饲料价格提高了一倍多。

农林省正把重点摆在放牧牛群上。日本还有许多山脉丘陵，多是没有耕作的土地，因此，这好象还是个切实可行的建议。

在一九六〇到一九七三年期间，日本养牛的农户已由二百三十万户下降为五十九万五千四百户，而每户饲养的牛数从一点二头增加到三头。在这个时期内，肉用牛总头数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即从两百三十四万头降到一百八十二万头。

然而，农林省却打算到一九八二年增加国内的肉食产量：牛肉五十万吨，猪肉三十万吨，家禽一百一十六万吨。

家禽，是日本最便宜的肉食。但应注意到，它在一月份的售价却低于去年同期的百分之六，此后，曾降到百分之十的纪录。六月底的冷藏家禽肉库存量达到了四万五千吨，三倍于正常的水平。六月份的平均批发价下降到每公斤两百八十一日元（约合每磅四十二美分），低于每公斤三百二十日元（约合每磅四十八美分）的生产成本。为了减少库存，在七月中进行了一次去骨幼禽肉的全国性销售，售价降低到每一百克五十九日元（约合每磅九十美分）。

如果是由于肉价关系，因而消费者拒不购买，这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日本不多进口以降低售价呢？

一九六六年，政府设立牲畜业促进公司，控制了整个牛肉进口额的百分之九十二。这个由前政府官员操纵的准政府性机构，实质上是一个固定价格的垄断者，它控制了牛肉的消费价格以保护当地生产者。去年它进口了十六万吨牛肉，其中四分之一是存放在冷藏库，以防止目前肉价的下跌。

在一九七三年财政年度里，政府分配了十二万吨的澳大利亚牛肉进口额，其中的五万吨没有进口。而且从二月份起，还禁止一切牛肉进口。

由于日本强迫限制牛肉进口，美国为此而大为烦恼。美国

农业部部长助理帮办在路过日本的停留期间，曾请求日本政府恢复它的牛肉进口。

因为需要七到八磅的谷物饲料，才能长出一磅牛肉，而大量饲料又必须用高价才能进口，这对于日本继续人为地采用高价牛肉政策以保护国内生产者，显然是非常不经济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今整个世界都有过剩的牛肉，但人民却买不起牛肉。按照长期为日本经济刊物撰稿的约瑟夫·Z·雷迪的说法，如果牛肉成本不能下降，“牛肉就只能成为少数上层阶层的象鱼子酱和鹤鹑那样的食品项目了”。

高成本的饲料和化肥

对日本肉食品生产成本关系最大的，是进口饲料的昂贵费用。由于饲料价格飞涨，北海道三万两千名牧场主今年曾把他们的牛奶倒掉，以表示对他们产品规定限价的抗议。这是日本牧场主第一次采取这样的行动。

日本的执政党考虑设立一个事业团，专门从事饲料的购买、贮藏和供应。可是，大藏省和农林省却小心翼翼地仔细检查这个计划，这是因为饲料的剧烈波动，可能会引起巨大的赤字。

除去进口饲料的过高支出以外，日本农民还面临着器材和化肥费用的大幅度增长。在一九七二年财政年度中，这些费用上涨了百分之五点五，但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到一九七四年二月期间，它们却上涨了百分之三十点三。

农民的收入和消费者

不管这些变动是怎样关系到日本农业，农民的收入是不会

象工人那样低。在一九七三年财政年度中，每家农户平均收入是两百六十五万二千日元(约合八千八百四十美元)。名义上它比去年收入要好些，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三，但实际上只增加了百分之三点四。可是，这个收入约相等于工资劳动者的一点三倍。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农民收入只有百分之三十来自真正的农业，其余来自兼搞的非农活。

也必须注意到这个平均数是骗人的。只有百分之十八的农民才有特别高的收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每年收入低于一百万日元(约合三千三百三十三美元)。

农民挣得这么多。那末，消费者的情况又如何呢？总的说来，在一九七三年财政年度中，粮食价格增加了百分之十八点三。农产品成本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并且后来增加得更快了。东京的蔬菜价格，七月要比六月高百分之三十三点四。一九七四年六月全国日用品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高百分之二十三点六。

出路何在

日本食品问题的出路在哪里？政府是否还需要为增加食品自给率而追加支付不合理的补助金总额？政府是否还需要为将来的消费而贮藏愈来愈多的食物？政府是否还有必要去鼓励国外食物增产以便日本的进口？

那种继续增加国内食物生产补助金的看法，是完全不合理的。这将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生活费用最高的国家。

一个私人组织的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认为，无论如何，日本农业都必须给予补助金，但是它告诫说：“补助金只能用以奖励有

效率的大规模的农业。”

商品贮存在一定程度上，并非总是不合理的，但是随着主要食品价格的巨大波动，投机活动也是很危险的。此外，目前还存在着贮藏场地的问题。举例来说，有人强烈要求增加日本的现有六十八天石油储备量，然而贮藏设施却完全不能适应。其他各种商品也正由于缺乏贮藏设施，而大量堆放在海边的驳船里。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日本为了进口是否还需要鼓励国外的食物生产？在这方面，那些发展中国家对于日本的垄断商业公司企图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剥削，已经表现出极大的愤懑。

从上面所谈到的，可以明显地看出，要解决日本的食物问题确实不容易。或许象《日本时报》社论在总结形势中所指出的那样：“鉴于从扩展国内农场中所碰到的许多物质上的限制以及为实现自给自足规划所必须承担的庞大财政负担，因而，要走向雄心勃勃的粮食自给是完全不可能的。保证日本食物供应问题，只有建立在牢固的国际联系中，才能得到解决。”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十月号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 楚学译）

菲律宾的土地改革

〔美〕本尼迪克特·柯克弗莱特

在马科斯总统宣布全国戒严的一个月之后，在人头拥挤、装饰华丽的总统府玛赫列卡大厅里，总统正站在那里做报告——题目是“把佃户从土地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个报告因总统宣布了下列命令而达到了高潮：“为此，我……特以总统的权力命令：自即日（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起，全国佃农一律解放。”话音刚落，电视摄影机“呼呼”作响，内阁官员以及其他要人掌声雷动。在总统面前席地而坐的与其说是农民不如说更象学生的青年男女，也莫不热烈鼓掌。但站在后面的那些上了年纪的庄稼人，却显得象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似的。当他们乘着军用卡车回到乡下矮小的农舍之后，还在大惑不解，这项法令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一日颁布的总统第二十七号法令以及其他几项法令和官方文件概括了整个纲领的内容——该纲领允诺将土地交给全体种稻和种玉米的佃户。这项纲领影响所及的佃农（在六十五万至一百万人之间）和土地（在一千三百万至一千五百万公顷之间）究竟共有多少？官方的种种估计互有出入。但是有一条：未来的土地所有者在取得土地所有权之前必须履行某些规定——必须在十五年内清偿地价；加入政府举办的合作社；缴纳专门基金，以保证其他佃农在拖欠地款时仍能如期偿付地价；采用现代耕作措施（包括采用高产品种）以及缴纳土地

税等。地主由佃农处直接得到清偿(除地价外,另加百分之六的利息,分十五年付清)或按照其他办法通过政府机构间接得到清偿。官员们一再强调这一土改纲领对马科斯“新社会”的重要意义。在纪念纲领颁布一周年时,马科斯本人也声称:“土地改革乃是衡量‘新社会’成败的唯一标志。土地改革一旦失败,‘新社会’也就化为乌有。”

纲领由土地改革部会同其他许多机构一起贯彻执行,其中包括农业和资源部以及中央银行等。后两者监督各项计划的执行,从土地测量直到郑重其事地向佃农发放“土地转移证”为止。美国国际开发署马尼拉分署的作用也是令人瞩目的。

政府选择的并不是一次就把土地分掉的办法,而是采取分阶段进行的措施。开始时,土改对象以田亩在一百公顷以上的大地主为限;自一九七三年六月至十一月期间,则以拥有土地在五十公顷以上、一百公顷以下的地主为对象;对拥有田亩在二十四公顷至五十公顷之间的地主,则放在十一月以后处理。至一九七四年三月为止,政府已经就二十七万五千五百一十八公顷的土地(其中绝大部分都属于五十公顷以上那一档的),颁发了二十二万二千一百八十七份土地转移证给十五万七千七百二十三个佃农。虽然还没有一个佃农开始偿付地价,而且互换地权的事情也还没有发生;但政府已经宣布地主应在一九七四年得到第一次土地付款;政府并在土地银行储存了四亿比索。此后,每年还拟存入一亿比索,直至存款总额达该银行的规定股金总数三十亿比索时为止,其中十二亿作为帮助偿付大地主之用。菲律宾政府、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世界银行认为,土地银行足以解决以前土地改革纲领中的主要问题——即按规定偿付大地主的问题。

但是,在政府的“完整”的土改法中,土地的再分配仅是其中

的一部分。其余还有：小农贷款、支援农业服务、基本建设与水利工程以及政府对合作社的扶植等项目。上列各项的主要实例就是一九七三年的“马萨格纳—99号”计划——该计划规定贷款三亿七千五百万比索给三十九万一千一百七十五个农民，供培养高产稻种之用。上述贷款以及其他各项贷款，使一九七三年农贷总数空前增加。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世界银行则帮助提供贷款。前者为一九七三年“马萨格纳—99号”计划提供资金达七千七百万比索以上。

马科斯总统并不是为了推行土地改革而宣布戒严令的。

在戒严令下，土改除了原有意义外又有了新的动机。实施戒严令的理由，首先是针对农村“共产党”集团的所谓革命威胁。所以，政府方面强调土地改革，显然是聪明的。正如马科斯和他的阁员们常说的，土地改革要把农民争取到政府这一边来。如果政府能制止或至少是减少农村的动乱；那末，政治动荡的根源就得以消除了。马科斯想比较顺利地继续执政并吸收大量外资（这是他总政策的基石），那就需要稳定；而且招致外国（尤其是美国）商人的主要吸引力也在于菲律宾的“社会安定，秩序井然”。这个公式正是美国政府所鼓励的开发模式；而最近它之所以同菲律宾签署了一项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五年（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九年）农业发展计划，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土地改革的另一个动机，就是解除他潜在敌手的武装。戒严令颁布以来，马科斯政权已经向下列四大目标大踏步地迈进了；把政治和经济权力较前更为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使菲律宾成为一个军事国家；取消民主自由；比较以前更多地为外资敞开大门。在戒严令颁发之前，由于许多方面的顽强反对，这四项中的任何一项也是行不通的。但是，由于土地改革之类的纲领经常在政府控制的报刊上大事宣传，毋庸置疑，它骗取了许多菲律宾

人对现政权的支持——至少也骗取他们不去积极反对它了。这一点对许多外国人说来也同样如此。美国国际开发署一个官员的话，大概是足以反映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美国人的情绪的。他说：“我是不大热中于支持独裁政治的，看样子我们（美国）似乎在越来越多地支持独裁政治了。因为象菲律宾政府所搞的土地改革那样的纲领，容易为人们支持独裁政治大开方便之门。”

所以，土地改革是别有用心的一种手段——也是菲律宾政府为了创造稳定局面、抵销潜在动乱而采取的几种手段之一。该政府对农民的关注，不过是一种表面文章；它只是在一定的框框内推行土改——把动乱控制在不超出尚能容忍的水平为限度，而以土改不致威胁现政权认为是更重要的其他各项政策为限度。

也有证据表明：包括马科斯总统在内，现政府对土地改革是缺乏诚意的。他以往的历史使人难以把他的种种保证信以为真。在戒严令颁布前，他当上总统已将近七年了；而当年写在本本上的土改法，基本上同现在的没有什么两样。他曾在许多场合许愿，要推行土改。但他的实际行动却远远没有他的辞藻漂亮。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项调查报告指出：马科斯在一九六六年就任总统时宣称，他要在一九六九年年末以前让三十五万零七百个佃农成为土地承租人。但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只有两万八千六百十六个农民执有租契。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另一项调查报告说，到一九七〇年年底为止，“……实行土改纲领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了，而从土改纲领中实际有所受益的，却还不到全国小农总数的百分之二。”

马科斯本人就是全国最大的地主之一。他和他那个家族的财产，就拥有包括在卡加延省的土地两万公顷、在伊萨贝拉省的土地一万公顷、夏洛泰甘蔗园、在东方尼格鲁斯的许多糖业中心

以及在棉兰老岛的达沃和其他地区的几百公顷土地。但他的土地改革纲领根本没有触动这一大片土地的一根毫毛。

令人怀疑政府对土改缺乏诚意的另一些事实是：在戒严令发布前，许多直言不讳主张土地重新分配的人，现在却被政府关进了牢房；农民的结社、游行也一概被宣告为非法行为。农民和工人均不得举行罢工；正如行政秘书阿尔疆德洛·梅尔柯所解释的，“罢工是一种奢侈品；在‘新社会’下，我们可供应不起。”

政府既未能如期完成自己所规定的任务，而且对所订计划又有自食其言的迹象。一九七三年，官员们在许多场合都这样说过：估计有七十万名种稻和种玉米的佃农将在同年年底拿到“土地转移证”。但是直到一九七四年一月份为止，取得转移证的佃农还不到十四万五千人。

土改纲领的指导文件——总统第二十七号法令保证佃农将成为“一户大小”的农田（按规定即水田三公顷或旱田五公顷）的所有人。但从数学上来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总共才有一百五十万公顷的土地，而估计的农户数却有七十万户。这就是说，每一农户约分到两公顷土地——而且如果根据政府方面某些材料统计，确实的农户数为一百万户的话，则每户所分到的土地就更少了。到目前为止，已经领到土地证的十五万七千七百二十三家农户所耕种的土地总面积为二十七万五千五百十八公顷（每户合一点八公顷）。

最后，根据总统第二十七号法令，原地主可以保留的土地最高限额为七公顷，而马科斯又于一九七三年十月把它修订为二十四公顷，以加强这些土地的所有人（中产阶级）的地位。在这些“中产阶级”地主中，有许多是现政权必须日益倚重的军官。这大概要比一九七三年的任何一项法令更足以说明：当土地改革同其他必须优先考虑的事情发生冲突时，土地改革被认为是可以

牺牲的。

菲律宾历次土地改革失败的原因，广泛地被认为是上层地主阶级对政治制度的控制。有时候，地主竟肆无忌惮地阻挠土改，甚至不惜利用私人军队对主张土改或加入农协的佃户进行迫害。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上层的菲律宾人士却要高明得多。因此，许多土地改革法突出地规定了甚至是有利于大地主的种种规定。一九六三年法允许地主为改用机耕和雇用农业工人而向佃户夺地的“自耕”条款，即是一例。各项土改法和土改指南也把相当大的法律解释权交给了法院和官吏。比起大多数农民来，地主是理所当然地能为自己的利益而更方便地利用这些法院和官吏，因为对他们来说，有的是世故人情、政治关系和财富。一般说来，土改机构也仍然落在上层阶级的掌握之中。最后，过去的种种土改尝试都是零碎地进行的，这就使地主阶级能够赢得时间，进行调整。所以，佃户是占不了地主什么便宜的。

在戒严令下，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上层统治阶级，继续阻挠土地改革并左右着法律规定的那些执行机构。首先，某些大地主明目张胆地进行反抗，而且是暴力反抗。马科斯颁布总统第二十七号法令后不久，土改部在一九七三年一月就有一项报告说：“据报，目前违反总统命令，逼走佃户的地主大有人在。”某些地主还强迫佃户签字画押，使他们成为农业工人，以逃避总统第二十七号法令的限制；另一些地主则“向佃户提出刑事诉讼，从而达到夺田的目的”；他们所采取的其他方法，更是“不胜枚举”，包括“用推土机压坏农田，拆毁或烧毁农舍，对佃农进行恐吓和粗暴地强行夺田等行为”。土改部虽一再发出警告，而不法行为却有增无减。

更为普遍的是，地主采取狡猾的办法来反对土地分配，他们把土地化整为零分给子女，把稻田和玉米地改为不受总统第二

十七号法令约束的甘蔗地，将农田改为宅基地，并把自己的土地抵押给不在土改对象之列的社团或公司等。此外，许多军官都拥有土地（其中拥有土地在十五公顷以上、三十公顷以下的特多）；何况在历史上菲律宾保安队和陆军部队一向是同地主阶级，而不是同农民阶级结成联盟的。因此，关于军方袒护大地主的消息以及军方对农民施加暴行的事件更是时有所闻。

最后，土改纲领的计划和决定，都是从上面来的：土改纲领是由土改部以及有关单位中的政府专业人员会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单位的顾问人员一起制定的；而执行计划的也是政府官吏；农民参与制定纲领是微不足道的，政府工作人员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就得怎么办。甚至全菲土改农民联合会也是由土改部一手炮制的。所以，中吕宋的政客马克·费边竟当上了联合会主席。

即使菲律宾先前的各项土改计划都得到充分贯彻的话，其影响所及，也只是佃农中的一小部分。如果按全体农民计算，则其所占比例甚至更少，因为早先的法令不包括农业工人。而此项规定至今仍未失效。在戒严令条件下，土地改革把不种稻谷和玉米的佃农排除在外，还把那些在中小地主（拥有土地不满二十五公顷）土地上种植稻谷和玉米的佃农也排除在外。因此，目前土改方案充其量也只能使现有百分之十六的佃农可以在十五年内拥有土地，而其余的百分之八十四的佃农将依然如故。

按照一九七〇年收获量统计，全菲种植三百十万公顷稻谷，二百四十万公顷玉米，这两种作物占当年全部种植面积九百万公顷的百分之六十二。其余耕地上最大两宗作物为甘蔗（三十七万公顷）和马尼拉大麻（十七万公顷）。既然把甘蔗、大麻及其他经济作物的土地不算在土改范围内，那么佃农中就有相当可观的一个百分比同土地改革不沾边。

这种不把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计算在土改范围内的办法，从一开始就对某些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的豪门作出了重大让步。以全国五百名左右的百万富豪为例，就有半数是甘蔗大王。土地改革对这些富豪和其他豪门的权势不会有丝毫触动，他们大部分人以拥有的蔗田为基础，向其他企业进行扩张。毫无疑问，这些占有土地的豪族在“新社会”中居于有利的地位，因为马科斯政府鼓励种植园耕作和“农业综合企业”。他们还可以钻另外一个空子来谋取私利，有人已经这样做了：即把稻田和玉米地改种其他庄稼。

土改方案既把占地不满二十五公顷的地主名下的佃农不包括在内，也就把全部种植稻谷和玉米的佃农中百分之八十（即八十万农民）排除在外。纵然把土地保留极限降低到十二公顷，这种佃农中也还有百分之七十受到排斥。政府把原先的土地保留极限从七公顷提高到二十五公顷，这是以牺牲农民利益对地主阶级所作的又一个重大让步。这样，包括在方案以内的，就只有全体佃农（一百二十八万）的百分之十六（二十万）了。

最后，土改方案对于菲律宾农民中也许是的那部分人——无地的农业工人来说，简直是毫无帮助的。这一部分的人数在三百万以上，大部分靠工资为生，他们在诸如棉兰老岛上的占地七千八百公顷的菠萝种植场以及中吕宋的大型半机械化的专业种稻农场之类的土地上进行操作。他们也替较小的地主干活，从事收割、移栽和运输等季节性帮工。其中有些人是流徙不定的季节工，例如在米沙鄢群岛上的三万六千名甘蔗工人；但大多数却终年定居一地。他们的工资本来就低于戒严令之前的法定最低额，此后就更低了；因为雇主根本不理睬工资标准的规定，何况一九七三年通货膨胀高达百分之三十。这种在大农场上挣工资的农业工人不属于土改范围之内。

虽然以往的土改计划从未充分实施，但在某些乡村中却得到了贯彻。在棉兰老岛和其他一些地方，政府经办机构对几千个老佃农作了新的安排，征购了几千公顷土地，由数百个佃农开始偿付地价。早在三十年代后期，政府已经计划帮助那些盼望拥有土地的人在政府征购的土地上组成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这和马科斯目前方案中提出的大致相同。不幸，就是这批极少的农户中，最后真正得益的却为数无几。因而在一九四〇年政府决定购进邦板牙中吕宋省的巴海·帕尔大庄园，然后把它分成二至四公顷小块土地再行出售给佃农。可是时至今天，耕种这片土地的农民大多数还是佃农。最终只有极少数人有了自己的一点土地。到一九五〇年，问题已经很明显——很多农民无力偿付地价。有些农民开始将土地转卖给别人，后者在买进几公顷土地以后，把土地分成小块再转手出租给佃农。另一些可望拥有土地的人也无法保持其土地，而土地却落入贪官污吏之手。相距不远的布拉干的新风光庄园上的七、八千农户也同样沦于这种局面，二万七千公顷土地上的农民几乎半数仍然是佃农。很多人就是无力继续偿清一年一度的付款。另一些人偿付了地价，但由于政府机构贪污成风，因而产权证从未到手。有些居民却有财力买进那么多自己种不了的土地，于是就出租给佃农。而原来的佃农中只有极少数成了小块土地的合法主人。

按过去情况来说，佃农不论取得土地转移证与否，每年都需要贷款。但取得转移证的佃农不能再向地主告贷，不得不改向农贷管理委员会之类的政府信贷机构借款（利率一分二厘），或向私人经营的农业银行借贷（利率也是一分二厘），甚至向债主贷款。

至今成问题的是，政府机构的贷款既靠不住，又发放迟缓。过去许多农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满足了各种要求，呈交了不少

文件以后，要坐等几个星期之久，贷款才千呼万唤始出来，而要用于生产，为时就过晚了。因而他们宁可向地主告贷，尽管利率较高，但相比之下，靠得住，手续也较简捷。另一个问题是银行资金不足。以一九七〇年的情况为例，很多佃农和小土地所有者虽有资格向中吕宋的农业银行贷款，但却借不到钱。一九七三年可供出借的金额也远远不够。何况农业银行和政府机构只愿借钱给“有偿付能力的贷款对象”，也即最有能力还债的那些农民。当然，使用农业机械和雇工的富裕农民或大地主在取得贷款方面仍将比别人容易得多。很多佃农势必向债主借钱，不仅要付出高利，还要以土地转移证作抵押。

佃农对自己有无能力如期偿付年度付款并履行其他义务，以便在十五年后拥有土地，也深表怀疑。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大部分人拖欠应付款项，不是推迟取得土地所有权的时间，就只好丧失购进土地的机会。

对于许多佃农最后能否成为土地所有者所引起怀疑的另一个理由是“绿色革命”本身。培育高产品种需要大笔现金开支。“奇迹”品种要求最适宜成长的大量灌溉用水、化肥和农药。所有这些都需要资金，而典型的菲律宾农民，不论是小土地所有者或佃农，都只能向人告贷。为了取得最高产量，往往需要较大的投资——现代化的谷粒干燥器、机械化的谷仓、拖拉机、改良化肥和除虫剂。这种耕作方式不仅由于连续施加化学药品而成为一场赌博，而且和小规模耕作大相径庭。按照一位知识渊博的作家的论点，“在私人企业占上风的地方，培育新稻种这一计划会使农民中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这种趋向早在别的国家里出现过，而在菲律宾也正在发生这种趋向。菲律宾的小农本身对这种耕作方式持怀疑态度，他们既担心会对土地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又怕债台高筑。一九七〇年新怡诗夏的一位佃农

曾经对我说，“与其孤注一掷，举债累累，买进大量化肥等等来种奇迹稻，还不如种本地品种，稳稳当当吃饱肚皮的好。赌注可能输光；这样，你只能落个一场歉收和浑身债务的下场。奇迹稻比本地种更容易得病，所以这场赌博不比寻常，风险很大。”而接受土改、即领有土地转移证的佃农，必须使用高产品种，并按照政府的农业耕作方法进行生产。

单单当前的化肥荒就意味着小农的日子难过。一九七四年菲律宾的稻、玉米、甘蔗和其他作物所需的化肥，有百分之七十要依靠进口。到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这个百分比还会上升。但是，由于全球性的石油荒，菲律宾不可能买到它所需要的那么多的化肥。结果，供应的化肥价格必将是非常昂贵的。只有大地主和经营种植园的公司以及一部分小地主才买得起，而许多领有土地转移证的佃农是决没有力量购买的。

即使真象马科斯说的，土地改革“打破了大片土地的持有”，那么，土改仍然无损于大地主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的财富不会被夺走而转给另外一个阶级。包括在土改方案以内的佃农仍将是佃农，至少还得当上十五年。以后，可能有些人真的拥有小块土地。然而，就在这段时期里，按照政府规定的六项对地主的补偿办法，原来的地主可以分期收回全部地价（每公顷的单价不低，外加六厘利息），此外还有优先股的进款和其他收益。更有甚者，总统第五十七号法令还豁免了地主“由购地佃农所付的分期付款应缴的资产收益税，以及全部地价以外加付的利息所应缴的所得税”。总而言之，原来的地主，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位官员所说，“将得到很好的补偿；他们最后收入的决不止仅仅是佃农陆续支付的每公顷四千至五千比索。”

这些颇具诱惑力的补偿办法对土改来说是必不可缺的，因为按照马科斯政府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说法，“这样才能把地主

卷入土改。这是‘投桃报李’的事情。”事实上，马科斯等人强调指出，从拥有稻田和玉米地的大地主来看，土地改革是极为有利的，因为现在他们可以把原先束缚在土地上的资金转作更加有利可图的投资。毫无疑问，有一些大地主乐于按这样的条件出售土地。新怡诗夏的一个拥有四百五十公顷稻田的地主在一九七〇年曾经对我说，管理佃农耕作的土地把他搞得厌烦死了，所以“我宁愿尽快把土地卖给他们，只保留一点机耕地，其余的只要价钱适当，我很高兴卖掉。”因此，这种土地再分配的后果决不是什么变革。少数受土改影响的地主并不会“丧失”土地；他们只是以挺不错的代价出卖土地，而且这种报偿还受到政府土地银行的保障。

对于马科斯政权来说，土地改革方案可能带来一点好处，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因为把几百个佃农转变成非常小的地主，并对另外几千名佃农许下了也将使他们成为小地主的心愿，这样，至少转移了土地问题上的骚乱。但是就绝大多数菲律宾农民说来，躺在改革道路上的障碍物依然存在，看来还将继续存在。充其量，现在的土改方案只影响农民中极小一部分人；即连影响到那一小部分人最后是否能拥有自己的土地，也是非常成问题的。何况，根本不存在财富的再分配问题，因为大地主还将收回地价。许多地主家族还在抵制或者操纵土改方案，而马科斯政权早已向大中地主作出让步。最后，负责执行方案的政府官僚机构仍处在上层分子的支配下，根本谈不上让农民参与方案的执行。

马科斯的土地改革方案陷入了其他许多国家的土改方案的窠臼，这种方案无非是根据私有财产、私人拥有土地、财富不均、对充公财产支付补偿等精神进行的一场伊莱亚斯·丢玛所谓的“第一类”改革方案。丢玛在研究了世界各地土地改革的十二个

实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第一类方案“往往不是老问题的解决，而只是把老问题压缩一番。实际上，新冲突的潜伏危机依然存在，因为造成冲突的制度根本没有变动……西方的第一类的改革类型的冲击力极为有限，因为它不象社会主义改造那样触及制度的基础。这种类型的改革并未防止，也不能防止革命；它没有创建民主国家，也做不到这点。它可能就象过去一样，造成短期安定，或许罗致到一批支持政府改革的人。因此，如果进行改革的国家想取得这些短期的成就，那么改革也可能是很有裨益的。但是，如果它们真的想要来一番彻底改变，它们应该对有产阶层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改变，或者运用土地所有制改革以外的其他手段。”

埃里奇·雅各比和夏洛特·雅各比曾对全世界的土地问题进行过多年研究，本文对菲律宾土改的分析就引他们的意见来结束。一九七一年他们对大部分国家的土地改革作出了悲观的结论：“在真正不发达的国家里，土改至今只起了有限的作用。有权有势的既得利益阶层控制着行政机构并且操纵着执行机器；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土改究竟切实可行到什么程度，还得拭目以待。”

*

*

*

作者后记：

一九七四年四月以来，最显著的发展结果就是土地改革几乎停滞不前。最近几个月中，政府对于土改所许下的空洞的诺言，几乎是无所作为，丝毫没有加以任何充实。佃农仍未根据方案得到任何土地；领到土地转移证的那些佃农甚至也未开始缴纳分期十五年的第一期付款。实际上，已由佃农、地主和政府官员三方商定地价的土地，只有一万三千公顷。这在土地转移证应予“重新分配”的将近三十万公顷的土地中，所占不过百分之五。

指导土改如何贯彻执行的重要“规定和章程”（包括规定地价），尚待政府颁布。

地主仍然采取不合作态度。据土改部里那些因当局贯彻不力而深感失望的好心的行政人员说，地主还在继续破坏方案，例如，他们拒不出席同佃农协商地价的谈判，要价大大超过佃农的能力和土地的价值。地主自报的稻田产量（因而也是土地的价值）和佃农提出的产量之间的平均差数达每公顷三十卡本^①。

同时，土改部的官员也无权迫使地主认真进行谈判。显然，马科斯总统及其最亲密的顾问决定不对地主施加压力，不强迫他们按照法令办事。至于继续利用非法手段规避土改法令的地主，政府官员同样不能或者不愿予以告发和惩办。地主还在撵走佃户，把稻田和玉米地改种其他庄稼，并把土地分散转移给亲戚，以免超过二十四公顷的土地保留极限。有些地区的土改甚至在走回头路。去年由政府建立的几个村镇联合会已告解体。政府发给佃农的数以百计的土地转移证已被吊销，大大引起农民的混乱和愤慨。更有甚者，最近土改部的一份内部通报表明，十七万名据称已获得土地转移证的佃农中，实际获得的土地转移证的仅占百分之三十。这种事情不过是受政府审查的报章上从不发表的许多事情之一。这些报纸还在继续欢呼“新社会的革命性土改”，但已不如过去那样频繁了。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秋季号加拿大《太平洋事务》杂志 叶封、仲人合译）

^① 菲律宾的谷物容量单位，相当于七十五升。——译者

西伯利亚散记

〔美〕罗威尔·汤姆斯

许多世纪来，西伯利亚一向是苦难和神秘的象征，也是不祥的奥秘之乡。在那里，不知道有多少人被镇压了，但却连一点痕迹也没留下。早在彼得大帝时代之前，就有多多少少持不同政见者和变得冷酷了的囚犯，象奴隶一般地在那里劳作。他们拖着脚镣，开路的开路、挖盐矿的挖盐矿，等待着死神的慈悲。难怪陀思妥耶夫斯基要称它为“鬼屋”了。实际上，“西伯利亚”原是两个鞑靼语单词所合成的：“西伯”（睡）、“伊尔”（地），即“沉睡之乡”。

今天，正如我最近所亲眼目睹的，西伯利亚已经不再是沉睡之乡了。在七十年代里，这片占全世界陆地面积十分之一的辽阔土地，其开发计划，无论在人力、资金和机器装备上，都要比苏联的宇宙空间发展计划，占有更优先的地位——成为苏联的一项最高经济目标了。

今天，西伯利亚的产量：钢、铸铁、煤和黄金已接近苏联总产量的二分之一；炼铜约占四分之三；水貂、黑貂等皮毛以及鱼子，则占世界产量的大部分。

但是，使西伯利亚成为苏联新的心脏地区的努力，目前只是开了个头。也许全世界矿藏和潜在动力的十分之四还蕴藏在这所基本上尚未开发的酷寒之下的宝库里呢。目前，成千上万的地质工作者正在那里工作，新的发现日有所闻。就在几年之前，人

们还以为全西伯利亚，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天然气或石油。但从那时候以来，已经发现了六十多个气田或油田了。

西伯利亚有待开采的储煤量，也要比世界其他各地的总和还多。铁矿石之丰富，也数一数二。至于金刚钻矿（去年曾发现了一块两百三十六克拉的钻石），其产量估计要达南非的四分之三。

幸而，把这一传奇之乡同全世界隔绝的铁幕已经打开。作为一项主要的政策改变，旅游事业在克里姆林宫的准许之下，已成为苏联的一宗大买卖了。最近，包括西伯利亚某几个城市在内的一百个苏联城市已经向外国游客敞开了方便之门。政府主管全苏国际旅游业的“国际旅行社”第一副社长列昂尼德·霍凌尔郭夫告诉我说：“去年我们接待了大约两百万游客，其中有四万名是美国人。虽然大部分人还没有路远迢迢地莅临西伯利亚，但我们希望会有更多的人去那儿观光。”

当然，还有大片大片的地区是不能让外国人去光顾的——西伯利亚是战略和军事要地嘛。苏联的不少核试验是在那里进行的；那儿还有许多空军基地；此外，更有几十个火箭发射场——针对的核目标是美国、中国、日本以及太平洋诸岛上的据点。为了保密，连苏联人都很少能去参观的秘密武库海参崴，就是苏联太平洋舰队的总部。萨哈林岛以及隔白令海同阿拉斯加相望的普罗维杰尼亚，都是可停泊一百至一百二十艘苏联潜艇的港口。在乌拉尔山脉以东至少驻有苏军四十个师，许多师军队就驻扎在离中国前哨只有三十五哩的远东城市伯力附近。今年六月，我从阿拉斯加搭专机，沿着一条新辟的直达航线，飞抵西伯利亚进行访问。西伯利亚虽同阿拉斯加只是“一衣带水”，我们却飞行了四千一百哩才到达远东边端的伯力；从伯力到莫斯科还得再飞上四千哩呢。

“世界上最大的！”这是在西伯利亚常听到的一句引以自豪的话。但是西伯利亚最奇特的，却是从有五十万人口的现代城市伊尔库次克一直铺到贝加尔湖的那条长达四十哩的公路。一位出租汽车的司机数说了它的历史：“一九六〇年你们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原定来苏联访问并乘飞机到这里来看看贝加尔湖。正是因为他要在这里逗留四小时，所以这条路就在几星期之内铺筑完成了。接着，我们打下了你们的 U-2 间谍飞机，总统的访问就此取消了。不过，我们至今还保留着这条路的原名——继续叫它‘艾森豪威尔总统公路’。”

一谈到今日的成就，俄国人一定要把勃腊茨克水坝挂在嘴上。为了水坝建筑，雇用了一万六千个民工，其中一部分是为了争取减刑而来的罪犯。工程全年进行，连冬天也不稍停。这份苦，只有年轻力壮的才受得了；大多数工人都住在帐篷里，气温低至华氏零下六十五度以下；有时候叫人冻坏了脸、冻炸了耳鼓；皮肤要是接触到任何金属的表面，就要冻在上面难分难解。谁都没有本事能一口气干活半小时以上而不停下来。

至于勃腊茨克这地方呢，每年有一万五千名新的居民来到这里。同整个西伯利亚一样，这地方是吸引苏联青年的一块磁石，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等机会、发横财的好地方。一位青年自以为是地说：“今天我们到东部，犹如你们美国人当年去西部一样。”目前，勃腊茨克人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五岁。结婚率和出生率都是苏联最高的——离婚率也不例外。同西伯利亚其他地方一样，在勃腊茨克，裙子的下摆要比莫斯科市所认可的高得多。

在勃腊茨克，人们迫切要求向上爬的心情是一望而知的。造纸厂的一位青年主管人说：“我们可以凭自己的本事往前走。路上可没有什么年长的上司挡道。我们正在自己写自己的历史。”

历史和时代给在西伯利亚东北北极圈之下的雅库茨克打上了烙印。多少世纪来，这个哥萨克古城，一向就是俄国酷政的同义词。

今天，对持不同政见的苏维埃人的管制和惩罚方兴未艾。雅库茨克也同西伯利亚其他地方一样，被又一次用作惩罚克里姆林宫眼中钉的场所。虽然大部分人还不必进集中营或牢房，但他们得在那儿做苦工，有家归不得。

雅库茨克的第一所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物是十三年前才落成的。驯鹿拖拉的雪橇停在列宁大街上等绿灯放行。冬季长达八个月，气温往往低达零下华氏七十度。普通的伏特加酒到冬天就结冻，只有一种在西伯利亚才作饮料用的一百九十度伏特加才合适。

十多万年来如一日，西伯利亚的土地一直是冻得结结实实的。今天，西伯利亚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地方，有一层大半都厚达九百至一千两百呎深的永久冻结层。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在永久冰冻的条件下生活和劳动，乃是西伯利亚的主要问题之一。

夏季虽来得匆匆，去得也匆匆，却又另是一个极端：气温高达华氏八、九十度。一天连续二十四小时都亮着，人们半夜里还在不落的太阳下游泳。表土一解冻，就化为一片泽国，孳生着数以万亿计的蚊子。

要冒着恶劣的气候和其他的不利条件而建立并维持西伯利亚的一支劳动大军可不简单。从一九六一年起，苏联法律允许把持不同政见者、轻微罪犯和地方警察称之为“寄生虫”的人，流放到西伯利亚，为期两至五年不等。在这个期间内，他们得按国家的规定干活，有的活是在劳动营里干的。结果，今天西伯利亚成万成万的工人可以说是“半囚犯”。

莫斯科还对东欧国家施加压力，要求派出工人来。根据一项

新协议，今年已经有一万两千名保加利亚人去东西伯利亚了。

为了进一步增加劳动力，克里姆林宫最近下令：现在已经退休的公民可以在西伯利亚从事全天劳动，而不影响原定的退休利益。

西伯利亚工人享有很多奖励和特殊福利：工资要比其他地区同类工作高出四成到六成；而在极北地方，工资往往要高出一倍。此外，定居到西伯利亚的人还有现金补助，去新居的旅费也是报销的。在边远地区，在计算退休金时，一年工龄作两年算。西伯利亚的男劳力在五十五岁、女劳力在五十岁就可退休——比苏联其他地区男女各提前了五年。据说，从别处来西伯利亚的“外地人”，每三年可报销去家乡的来回交通费，每年有休假五十天。

西伯利亚地方虽大，但粮食不能自给。几乎一切食品都靠输入，额外费用由政府补贴，消费者所负担的食品价格只比欧洲部分的俄国人多付半成到一成。

缺乏适当的交通运输，经常要同恶劣的气候斗，这就使改变西伯利亚面貌的工作要花费大量资金，光是七十年代计划中的建设，估计就要五百亿美元。可苏联哪来那么些现钱呢？所以它只好向资本主义国家去要钱、要技术、要装备。人们能越来越多地看到外国援助在西伯利亚日益增长：加拿大的卡车和拖拉机，欧洲出品的机器，从西德和意大利来的油管材料，由美国帮助开发铜矿也在计划中。

不过，外资中冲劲最大的是日本。一九七〇年日本同西伯利亚的贸易将达六亿美元的高峰，并继续以百分之五的比例逐年扩大下去。日本商人在西伯利亚东部到处活跃。在伯力：一幅富士山的彩色照片神气活现地挂在候车室里，我看到了不禁大吃一惊。旅馆休息室的书报杂志大半都是日文的。飞机场上有

一块招牌上写着：“苏日友协集体会员——伯力机场”。

随着西伯利亚的发展，外国投资必将继续，俄国人当然求之不得。一位苏联经济学家望眼欲穿地对我说：“我们当然欢迎美国人赏光！”

每年搬到西伯利亚来的成千上万苏联公民中，最得宠的要数科学技术专家了。其特权究竟有多大，只要看看西伯利亚南部鄂毕河水坝附近的“阿卡杰密格勒”——科学城——便知分晓。它是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总部。这地方是苏联其他任何地方都比不上的，其中一千两百人都拥有相当于美国哲学博士以上的学衔。

在面对着宽阔明亮的林荫道的现代化大楼里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城中，那些科学家们住的是美国式公寓或独门独户独立的花园洋房——这在全苏来说也是闻所未闻的。他们的孩子就在装饰漂亮的公园、游戏场或鄂毕河水坝所形成的湖滩上嬉戏。每逢夏日，人工湖上到处是私人所有的快艇和赛艇。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经常有芭蕾舞、歌剧和话剧等剧团来城里演出。

科学城里的知识自由更是惊人：书店里公开陈列着在国内其他地方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小说家的著作；许多图书馆的藏书中有包括象《华尔街杂志》和《纽约时报》那样的禁书；俄国侵犯捷克斯洛伐克时，城里许多大楼的墙上都出现了谴责这次行动的标语，但是却没有引起官方的镇压。

“我们就是未来，”一位年轻的博士说，“如今，政治家一定得赶上我们才行。”

（摘译自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号美国《读者文摘》 陈
忠诚译）

三十年后的广岛

〔美〕K·M·克莱

广岛，这个被一颗原子弹摧毁了的城市，在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仍有必要对它在死亡、疾病和人们悲惨遭遇方面作出正确的估计。

官方人士甚至还不能断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日子里被美国的核攻击所杀害的确切人数。估计数在七万到二十万之间。

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即在一颗试验性的原子弹在新墨西哥的阿拉默果尔多爆炸之后三周，一架美国 B-29 型轰炸机“伊诺拉·盖伊”在广岛投下了一颗铀-235 原子弹。

今天，对那个令人恐怖的夏天早晨的记忆，正在一些年岁较大的广岛居民中间渐渐消失。对于那些一九四五年以后出生的后辈和后来搬到这里来的外来居民来说，核攻击只是历史而已。

原子弹下残存下来的十一万四千多人现在仍住在广岛，他们大约占这个城市总人口八十三万人的百分之十四。两家广岛医院专门接受原子弹受害者，还新设有二百五十个床位的养老院。然而三个公共机构已经统统住满，官员们抱怨说，床位至少应该增加一倍。但是扩大的计划还没有考虑，甚至对将来大部分残存者年老后，需要更多照顾时的扩大计划也没有考虑。

被炸的人的待遇仍然在日本人中间引起争论。一些人认为当局应该慷慨地弥补以前的忽视。另一些人则确信那些被炸的

人应该被看作为战争中的不幸儿女，注定要受到痛苦和灾难，直到他们死去。

原子病医院院长广中哲哉博士说：“我担心，大部分残存者缺少钱、失业和无力为他们的孩子成家。”

残存者很难找一个工作，也很难保住一个工作。他们往往只能做些卑贱的活，并且占这个城市的失业者的大多数。

一个访问者闪开拥挤的交通，冲撞着在办公室和商店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他发现很难使人相信不多年以前的广岛是一片被原子弹爆炸所造成的荒野。

最初认为在这里七十年也长不出什么东西来的恐怖已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今天的广岛绿树成荫，公园要比日本的其他城市多一倍。

用了十年时间把广岛的瓦砾重新变为一个城市。不过，精湛的重建计划把那些曾经是狭窄的和弯曲的街道变成了宽广的大路，它纵横交叉形成整洁的方格形，具有一种非日本式的整齐宽阔的气派。

战后人口增长了三倍多，现在广岛已列为日本第十一位城市。第二个较大的发展计划要求把市区扩大四倍，在今后几年中使人口突破一百万大关。

有六十多座桥飞架在大渊和它的五条支流上面，形成了一个三角地，城市就建筑在那里。大约有四千五百家日本公司在这里开设了分店，估计有一千五百个酒吧间和酒店。

两个比较重要的工业，汽车制造和造船工业支撑着经济。然而，广岛的真正的重要性还在于它的位置，它位于日本主要岛屿本洲的西部，是一个地方性的财政、商业和文化活动的神经中枢。

虽然数以万计的受原子弹袭击的残存者大部分置身于这个

城市的经济复兴之外，但是他们给美国和日本的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来证明辐射对人的影响。

辐射基金会研究所主任霍华德·汉密尔顿博士说：“值得再三强调的一点是没有象‘原子弹病’那样一类的事情。辐射的影响在广岛同在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过去没有‘怪物’出现过，将来也不会有。”

科学家们报告了三点否定的发现：

1. 原子弹对遗传的破坏还没有得到证明。
2. 对十一万残存者的死亡率的研究，没有揭示过早衰老的现象。
3. 辐射没有增加疾病的范围，包括心脏和血管。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 陈月新译）

评罗斯托的新书：《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美〕唐纳德·F·戈登^①

编者按：罗斯托是以研究“经济成长论”著名的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这篇关于他的新书的书评中可以看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究竟阐述的是一些什么？

我们为什么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呢？

能够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是令人愉快的。如果我们真知道的话，或许就能够调整我们的政策，以便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富裕起来。或许我们也就能够对正在为富裕而奋斗的许多国家提出建议。

大约在两百年之前，亚当·斯密认为他和他同时代的人是富裕的，因此他试图探索其原因，写出了《国富论》一书。多少年来人们普遍同意斯密的诊断和处方。众所周知，斯密是私人自由企业制度最杰出和最成功的辩护士，而卡尔·马克思作为这一制度的批评家也同样是最杰出和最成功的。但是多少有点令人惊奇的是，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马克思对于斯密所作的财富起源分析是接受得多么多啊。

晚近，特别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学家感到触动

^① 作者是纽约市立大学经济学教授。——译者

的是世界上的贫困情况而不是它的富裕情况。几年以前，冈纳·米尔达(他最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出版了一本跟斯密著作规模相当的书,其副标题表明他是在研究各国的贫困问题,尽管自从一七七六年以来世界上财富的激增情况是斯密所不曾梦想到的。

当然,不论什么时候总有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富裕,也有一些国家则比其他国家贫困,因此,研究某一类国家不等于就是研究另一类国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学家们又重振旗鼓,以旺盛的精力回头重新研究世界各国富裕和贫困的原因。这不仅是他们深为贫困所触动,也是因为他们对斯密关于两者原因的分析更加怀疑了。W·W·罗斯托教授(一度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曾经担任过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的顾问,现在得克萨斯大学教书)发表了《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一书,意图是向我们提出这方面的答案。

根据这本二百二十八页的篇幅不大的书的说法,答案在于现代科学。论据可以概括为下列四点:

首先,罗斯托就地中海、亚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几处古代文明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许多这样的古代社会具有高度发达的商业活动,既然它们断断续续地也有过许多科学方面的成就,为什么它们未能闯出一个“起飞进入自动持续成长”的阶段。罗斯托认为,这种阶段是正确地描绘了一七八三年之后英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他认为,是当时的文化和思想潮流阻碍了当时的人们特别是统治人物去设想如何运用科学以寻求物质福利的不断上升。

其次,罗斯托概述了从十六世纪一直到十八世纪的欧洲情况,帝王及顾问们为了增长他们的财富和在国内外的权势,以种种努力去发展经济。他们刺激并保护特殊的工业,发展交通运

输以及改革财政机构。罗斯托认为，所有这一切是以后起飞的必要前提条件。

第三，他以同样的粗略笔法概述了这整整三个世纪中贸易和商业的巨大发展。据说这一发展成为起飞的另一前提条件。

最后，罗斯托围绕着一七八三到一八二〇年这个时期而发表议论。他断言科学在这个时期创造了一种气氛，使得发明家和有首创精神的企业家结合在一起，完成了一项突破工作，从而把英国推进到能够自动持续成长的阶段。新技术的普及以及由于认识到它是能够系统地加以利用的这种种情况，就成为我们所以富裕的原因。

遗憾得很，这个论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部分原因是，罗斯托如同他以前的其他某些历史学家一样，会从事实的描绘中，突然莫名其妙、轻描淡写地滑入了因果关系的断言。部分原因是，当他明确断言有因果关系时，其论据也是缺乏说服力的，而在好几处地方还表明他对经济理论的了解是很成问题的。

可以举出关于前一种原因的一个例子，这就是罗斯托对于大致从一五〇〇年到一八〇〇年这段时期各国政府创建并保护特殊工业部分的叙述。罗斯托在书中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各国政府在当时不采取那样的干涉政策，那末，腾出来的资源，究竟会用到哪儿去呢？究竟怎样利用才算是有利呢？下述的意见至少是一个合理的假设：被罗斯托竭力渲染为“现代化政策”的掠夺资源活动，结果必然是对经济成长产生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影响。亚当·斯密一定就是如此想的。无论如何，这个事实是不容怀疑的：今天的不发达国家，如果执行的是象罗斯托所指出的类似的政策时，那末，在一般的情况下，它们必然是减低而不是增加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所以，罗斯托的论点只不过是一个武断。

可以作为另外一个例子的，也是罗斯托的主要论点，即认为科学对于起飞来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很使人惊异地写道：“十八世纪的一些关键性发明不是直接导源于……科学家本身。”但是他却断言存在着一个因果关系，因为科学塑造了哲学观点；科学家需要实践家制作的工具（相反的因果关系），也因为在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的”密切关系。

这种论调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今天，创造我们的财富的是科学和技术。但是象罗斯托所表明的，在十八世纪，事情是大不相同的。

在其他地方，罗斯托的理论简直可说是谬误的。和其他某些人一样，他运用了“主导经济部门”这一范畴，作为对他的经济增长论的解释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任何时候，除非所有工业部门都按同一速度发展，某些工业必然要起着主导作用。但是主导经济部门这个概念暗示的是：某些迅速发展的工业部门会“拖着”其他工业部门前进，因为它们之间有着“连带关系”。举一个著名的例子：在十九世纪，铁路建设是美国经济中的主导部门。有人断言，铁路建设不仅大大地促进了它本身实际收入的增长，而且也导致了钢铁工业的大规模发展，这又进而推动了经济成长。

然而简单的计算一番就会告诉我们，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让我们多少异想天开地设想一下，假如铁路可以无需钢轨而能运行，而且也无需其他的替代资源，那么运输成本肯定会比较低，这样一来实际收入的增长是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本来生产钢轨的资源就可以生产别的东西，而不会减低运输效率。钢轨的生产对于铁路建设所导致的实际收入的增长是起了抑制的作用，是减少了收入，而不是增加了收入。

事实是，尽管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出现了为数可观的

积极的研究成果，我们简直仍然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而这种现象并不是全然出人意料的。

过去两个世纪中财富的激增是一个奇迹（这是指不可能事先作出预测而言），它或许要胜过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奇迹——例如象古代希腊以一个比科罗拉多州的丹佛还要小的社会，在几代人的时间内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在比较短的几十年内出现于热带丛林中的多得惊人的大量高棉寺院；印加帝国；文艺复兴以及其他等等。既然我们也不了解这些事物，那么我们不了解罗斯托提出的同样令人头晕目眩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内所取得的精微细致的、具有分析性和经验主义的学术成就，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经济成长的多半是反面的事情。例如，我们或多或少知道的是：

经济成长不是由于少量的惊人发明和主导工业部门所导致的，看样子它却是广大经济部门大量的微小进步的产物。

尽管现在人们关心资源的不足问题，但是撇开象科威特一些例外不谈，自然资源同经济成长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先前存在的资本以及它的实际积累速度都不是创造财富和收入的重要因素。只要出现经济成长机会，它们就会随之而来的。

就大多数国家来说，国际贸易对于财富仅是略有些影响。

我们之所以了解这些真理，是由于对一些专门问题作了一些彻底的、详尽的和理论上颇有根据的调查研究，而在非专业的人看来，这些专门问题与罗斯托的问题相比必然是相当平凡的。对于罗斯托这本篇幅仅有二百二十八页的、从其他研究成果摘取概要的书来说，我们所能期望的也只能是这样：罗斯托并未能答复这个大问题。

（译自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美国《商业周刊》 王宏儒译）

评松下幸之助^①著 《如何挽救崩溃中的日本》一书

〔日〕《人民之星》报

据说，垄断资本家松下幸之助所著《如何挽救崩溃中的日本》一书，正悄悄地声誉鹊起。这本篇幅不到两百页的书，是垄断资本家在国内外大动荡形势下，感到自己的政治统治日益动摇而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所作的一种绝望的哀鸣。它暴露了他们的具有这样一种本质的阴谋，即外表上用欺骗和诡计粉饰一番，实际上却是改头换面继续残暴地压迫和统治人民。

松下叫喊：“当前日本正在瓦解，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精神上，都真正是眼看就要沉没。”他列举了“国民的思想不一致”、“政治的紊乱”作为他的这种看法的理由。

只要稍加思考就可以明白这些说法意味着什么。所谓“国民的思想不一致”，不外乎就是表示：如在工人的“春季斗争”或农民的要求提高农作物价格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广大日本人民的矛头指向美日反动派的斗争，无论是质或量都已大大提高，人民要打垮一小撮统治者的统治和压迫的政治觉悟正在增长。而所谓“政治的紊乱”，则是美日反动派自己暴露了他们在这种形势下陷于前途茫茫的困境，现已不再可能实行全体一致的统一的政治了。松下无非是喊出了美日反动派统治的

① 日本有名的松下电器公司创办人，现任该公司顾问。

危机。

这种形势对人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危机。不但如此，在开展打倒美日反动派统治的斗争的过程中，他们的危机，对于不断遭受美日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而陷入贫困与痛苦的深渊、因而日益提高社会变革的觉悟的人民来说，却是有利的，是一件大好事。

松下害怕，这空前的危机是美日反动派的危机、却有利于人民的这样一种认识，在人民中间传播开去。在本书第一部分关于造成今天危机的原因以及第二部分关于克服危机的具体对策的那些段落中，他都散布了种种欺骗和狡诈的论调。

他首先举出通货膨胀作为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他首先叫嚷，“以前开始的物价的逐步上升”是通货膨胀加剧的理由。他说：“在国民活动中存在的大小各种浪费、损失、效率低”，造成了物价的逐步上升，具体的例子就是学潮、诉讼案件骤然增加，劳资不协调，生产者同消费者的对立，等等。也就是说，松下认为原因在于美日反动派压迫、统治人民所必然引起的工人和人民的愤怒、斗争和各种矛盾的激化。松下嚷道：要解决通货膨胀就得进行大手术；胡说什么“每一个国民都同样需要忍受它的痛苦”，“现在不是互相指责谁不好、谁不对，而只想自己得免于难的时候”。这就是垄断资本本性大暴露的恶毒的思想上的进攻，它企图把美日垄断资本的统治所造成的通货膨胀的责任推到人民身上，压制人民的反抗，继续把人民束缚在自己的统治下面。在书中所举通货膨胀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产油国提高石油价格”这一点，松下叫嚷“产油国是加害者，日本国民是共同的受害者”，煽动露骨的排外主义，同时又咬定“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之间互相责备，互相谴责，更加助长了情势的混乱”，结果，他坚持把责任推在工人和人民身上，强迫他们忍受牺牲和贫

穷。

随着一页一页地翻过去，松下的这种主张就更加露骨了。他胡扯什么不信任和缺乏自主性是加剧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主张资本家同工人、生产者同消费者、政府同人民、大学当局同学生之间，也就是说美日反动派同人民之间恢复互相信赖，实行阶级调和，以及克服贪图省事的依赖心。

恢复互相信赖这种欺骗论调的真意是不难识破的，但克服依赖心这一点却隐藏着狡猾的诡计。他在这里所主张的，等于是声称日本的人民和工人必须放弃贪图省事的对政府的依赖心，叫他们放弃为了维护生活和要求扩大福利等而进行的斗争。不仅如此，松下还说：“在向政府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以前，应该通过自己的劳动，从中创造和提高自己的福利”；他甚至宣称：工人、人民继续甘心受美日垄断资本的剥削和掠夺，才是实现人民大众的迫切要求的关键。

松下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这种论点，唠叨什么“误解了民主主义”，“只强调权利和自由，却忽视了义务和秩序”。

战后美日反动派采取了资产阶级民主作为进行统治的主要手段，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另一方面，却也提高了广大人民为无产阶级民主及其实现而进行革命的志向。松下对此感到恐慌，他叫嚷要有“由正常秩序（垄断资本主义的秩序）保证的自由”，“赋予绝对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的民主”，妄图以此抑制人民觉悟的提高。更有甚者，他还说什么“不仅企业，每一个国民都负有社会责任”，叫嚷工人、人民都应该对社会，也就是对美日反动派的统治作出贡献。

已经很明显，松下在这本书中引起人们有一种国民危机的错觉，他把美日反动派的危机偷换为人民的危机，胡说一通好象现实的人民困境的造成，其责任在于人民本身。他说要解决这

个危机，但主张重要的是人民放弃斗争，对美日反动派作出更大的贡献，说到底还是妄图使陷入危机的美日反动派苟延残喘。

在论述具体的解决办法的第二部分中，松下提出将大学裁减一半、公用事业收费和其他物价冻结三年、发行“安定经济公债”等非常不切实际的主张；它们的目的是，重点也在于思想上的进攻，即把人民拖入上述阴谋中去。的确，美日反动派是重视教育和物价对策的，但在这里不能说他们在推进具体的对策，应该说，他们的主要意图是煽起全民的危机感，在思想上动员广大人民去克服美日反动派的危机。

松下的《如何挽救崩溃中的日本》一书，恰恰是表现了面临统治危机的美日反动派的拚命挣扎。工人、人民对他们的统治的愤怒已日益高涨，识破了松下所散布的谎言，并将进一步开展斗争。松下的哀鸣也好，阴谋也好，终究推迟不了美日反动派的灭亡。

（译自一九七五年四月三日日本《人民之星》报 康
大川译）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

——评马克思：《资本论》

〔俄〕伊·伊·考夫曼

编者按：马克思在一八七三年所写的《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曾经摘引了这篇评论文章的一部分，并作了积极的评价，指出：“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书评作者伊·伊·考夫曼生于一八四四年，死于一九一六年，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圣彼得堡大学教授。考夫曼的这篇书评过去国内从未全文译出，现根据日译文全文转译，供研究参考。

一八五九年，马克思出版了一本《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书应当是同一标题的更大著作的开头部分。但病魔妨碍了马克思，经过了八年之久的中断，到一八六七年秋，他才完成、出版了按照他的宏大构思而建立起来的第一卷。马克思的目的在于：批

判地分析资产阶级社会,或者用他的表述来说,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然而,他并不满足于把经济学的文献看做是他的研究基础,他还亲自研究经济生活中的资本主义制度,探求其规律,在发现这些规律之后,提出了他自己的对它的批判。在许多的注释中证明了他那渊博的学识,他批判地追述了过去从事研究现代经济制度规律的前辈,并对他们进行了毫不宽恕的批判,有的地方虽然不客气,有欠妥之处,还附带地给它们加了一些富有生趣而又痛快的形容词。因此,马克思的著作具有三方面的价值。第一,他从过去前人从未涉及过的研究中,提供了他所得到的崭新的独自的结论;第二,这部著作对现代经济制度的主要基础提出了系统的批判;最后,第三,它表现了标志资本主义发展的极端正确的、历史文献的和文化史的知识的庞大积累。

在以批判为主要内容的著作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这种批判根据什么样的观点来进行。一般的情况,对批判所抱的基本观点,都带有非常浓厚的主观和偏见,但凡是思想与观点为批判对象的场合,只有用精密的深入分析的方法,才能确保其科学性。当问题不是批判这个或那个学者的思想,而是必须批判由他的思想所表述的事实本身的场合,应该怎样进行才好呢?这种情况下,要鉴别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正常的,它的标准应该放在那里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往往认为可以作为标准的是人类的企求。按照这种观点,凡是适合人类企求的就是正常的,凡是与它矛盾的就是不正常的。但是,这种场合要出现下面的问题。如果想把批判的对象连企求本身也包括在内,那将怎样办才好呢?

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末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即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

实际上,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人都无法比拟的现实主义者。因此,在他所进行的研究中,对于他来说拿什么来做标准这样的问题,连提都没有提出来。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只要科学地从事研究,会自行解决的。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那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他看出了这些后果中具有这样的特征,即由以前的各种后果中所产生的以后的各种后果,更为多数人所想望,而且表现出进步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批判已经不是随意选择的嗜好,而是先行的发展阶段和后来的发展阶段的科学的比较,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事实的单纯的列举和肯定。

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有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

马克思的这种观点是如何形成的呢?让我们听听他自己的说明,他在一八五九年的那本书的序言中就已经作出了阐明。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

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一八四四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即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种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

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决定经济生活中那些现象的基本原因，主要是经济界起作用的各种生产力。而这些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是自然史的现象，他在探讨这些自然史的现象时所关切的，主要是在掌握各个时代之所以采取这种现象而又舍弃它的各种形态。他认为生产力的增长，几乎是和物理方面的增长一样是属于机械性质的事实。意识只不过是反映这种生产力增长的本身和它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上述原因，这些结果完全不依赖于意识而独自发生的。人类对自然的关系构成生产力的主要内容，而这种关系的变化，成为人们相互间经济关系变化的条件。这种经济关系变化本身，随后又成为人们相互间的法律的、政治的和生活的关系变化的条件。随着这些变化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出现或行将出现，人们的意识就逐渐把它作为自己的东西，反映在自己本身，于是有意识的人们就以此习以为常，而从语言、形象、习惯和法律方面去寻求它的表现。

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从属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准确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样准确地把各种秩序的序列、把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联贯性研究清楚。

我们以为对马克思的基本的概念加以说明，对于刚刚知道马克思这部著作的俄文译本的读者所可能抱的某种不理解不是没有帮助的。第一、在这本书中，他自己并没有说明自己的基本观点；第二、他说了很多激烈的批评的话，对几乎所有的人都骂了。例如，他认为孔德是“深深扎根于天主教土壤的”，孔德的实证论只不过是学生的练习作业，是黑格尔《百科全书》的蹩脚的模仿，只不过对法国哲学思想发展史有点趣味而已。但是不能因此而得出马克思是反对在我国称之为实证世界结论。这从上述他的观点中可以充分令人信服。无论如何，决不能把他称为唯心论者。最后，俄国的读者，关于这一点，可能由于马克思的叙述方法（不是研究方法）而产生误解。它是辩证法的叙述方法，看起来好象从一个观念严密地引出来似的，但实际是经常必须要回到各种现象中去的。马克思对引证的事实所加的评论是极为难懂的，对于不习惯德国式的关于观念展开的手法的俄国读者，为了完全理解马克思，就必须自己首先用容易懂的语言来翻译它。

由于他的基本观点本身的性格，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必要对于各种事实给予很重要的地位，这一点，他的著作在社会主义文献中以及在狭义的经济学文献中，超过了最近二十五年来所

发表的许多有体系的著作。在学术理论这一点上，能与马克思的著作并列的，只有蒲鲁东的《经济学诸对立的体系》。在历史材料的丰富方面，在学识的渊博方面，马克思可以与罗雪尔相比。但对所搜集的材料分析能力和深度以及彻底的科学性方面，马克思超过了罗雪尔。马克思开始准备叙述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结构体系的顺序是这样的——资本、土地所有、雇佣劳动、国家、国外贸易、世界市场。在最初三项中，他准备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所分裂的三大阶级经济生活的各种条件。现在他将这个体系作了一些改变。全部著作原定为三卷。现在他的著作就用《资本论》这个同一书名出现。第一卷叙述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第一部），第二卷包括关于资本主义流通制度的第二部和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基础的第三部，第三卷是关于资本和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各种制度的思想发展史。

这样，现代的经济理论完全由所谓资本的理论彻底贯通了。这一思想是与上述马克思的根本的世界观有密切关联的。在实际生活中，由于资本成了统治的现象，同时，在现代，资本成了财富和幸福的几乎唯一的源泉，而且所有各个经济过程，都从资本出发，好象它是中心点一样，又回归到资本。于是在现代，一切经济现象，不管它是具有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意义，总是从某一方面按其资本支出的大小，而得出它在实际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因此，很明显，要彻底分析资本的理论必须对整个现代经济生活，它的原因和结果作出根本的解剖。

这时，读者会提出下列的疑问吧，就是说不首先去研究支配某一部门整个现象的一般规律，而只是说明这一部门的一些事实的某一部分，这种情况究竟是一种什么科学呢？这并不是什么科学，只是对大多数人不能理解的现象加以说明时，应用已经获得的科学成果加以科学的实地运用而已。但是有人会说，经

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所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从他的著作中,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经过直接研究经济发展史上各个阶段的经济现象,他终于否定对所有经济发展阶段都共有的经济规律。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当这个时代还处于过程中的时期,生活完全从属于这些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某一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个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所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低级的有机体,由于它是低级,它要遵从它独自的结构、成长和营养等等的规律。当考察进入下一发展阶段的有机体时,它的解剖学的和生理学的现象复杂化了,我们终于发现量的差异转化为质的差异,新的质引起了新的规律。对于经济生活的观察也出现和它同样的情况。

通过对经济生活现象的内部结构和它的运动形态特征的仔细分析,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许多研究家就已一再确认,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学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经过分析的结果,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他们要用类比的话,社会规律和生物学的规律是同样性质的,这一看法将更加和事实相一致。社会生活和生物界的生活一样,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发展史,就是说各种形态的可变性和改良的可能性是它的现象的特征。对现象所作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象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亚细亚专制下的社会有机体、古典的国家中间所可能确认的社会有机体、封建社会的有机体、最后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机体——所有这些都是彼此很不相同的,因此,如果根据对它们的共同特征的观察为基础而形成的规律,就不可能说明它们最为有意义

的一面了。即使同一个现象，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的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因此，他虽然连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也并不去拒绝，但必须严格规定它起作用的界限，也就是说，要严格规定产生由这个规律所支配的现象的各种条件。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依存于经济的生产力水平，也就是产生这些结果的是依存于它所具有的生产力。如果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

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这样，它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所必须具有的目的。不是为了考古学的研究，也不是为了纯粹观念论的哲学的研究，而是为了对现实生活有用的研究，就只能以上述目标为中心。但是这类研究决不能同时具有只限于通俗的解释性的意义。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这是一部纯粹科学的著作，这本书的读者不仅要有领会自己所不习惯的思想的能力，而且要能批判地跟得上这个思想所展开的全部研究过程，这是不用多说的了。这一点，上面已经指出过了，马克思的著作比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提出了更大的困难。因为他是以这样的读者为对象的：既具有相当的教养，即一般要通晓文化史、特别是经济文化史，而且还要更进一步熟悉经济科学的各种成果。马克思自己说过：我期待的对象是希望学到新的东西的读者。因此，它是以前学过的东西都已经学过的

的读者为对象的，对于这种读者来说，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是新的，绝不是象一般经济科学中一切对他来说是新的东西那样。

这次出版的这一卷是从交换过程的分析开始的。马克思通过分析交换在各个发展阶段采取各种不同的形态，证明了这些形态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继承关系，而且一种形态是由另一形态所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更高级更复杂的形态由于它自身发展而产生的那些要素，作为萌芽包含在它本身之内。因此，所谓物物交换的最简单的交换形态一经发展，在它体内就已经包含有产生货币交换的复杂现象的萌芽。马克思在阐明了交换的一般规律以后，进而说明商品流通，即产品在交换中的场合，并不给资本家提供比他所支出的有更多的剩余。为了获得这种剩余，就有必要在流通本身的领域里吸引被夺去经济独立能力的人们的劳动力。通过将交换的一般规律如同它适用于商品一样，也适用于劳动力，资本家就有可能从流通中获得比自己支出更多的东西，就是说可以获得利润。问题在于这一点，就是说，按照交换规律，任何商品都应按照其支出劳动量所表现的它的平均必要生产费来支付，但是劳动力却生产出比它的生产（即给养）所必要的更多的东西。这样，资本家通过以支付其他一切商品同样的标准来实现对劳动力的支付，就有可能为自己取得维持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生产产品的价值的差额。这种差额，马克思把它叫做剩余价值。

超过自己支出的这种剩余和对它的渴望，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从工资中获取利润，对劳动力尽可能支付得少些，从劳动力中尽可能得到多些，——这就是这个制度的现实的口号。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关于资本通过工资掠夺利润在现代所具有的意义，对资本榨取劳动的现象以及这种剥削的进行和发展，或者阻止这种发展的条件，第一卷的主要部分中

作了详细的叙述和分析。在开头部分,马克思叙述了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日来榨取由上述剩余价值所形成的他自己的资本利润的欲望,在同一地方叙述了英国关于规定工厂劳动日的持续时间的立法的发展。接着马克思就转移到为了尽可能增加劳动力的价格和劳动产品的价格之间的差额而采取的下述基本方法。这种方法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和劳动产品相比减少维持劳动的费用。其主要的方法是采用大量的同种劳动力的简单协作,分工(也就是大量的不同种类的劳动力的协作),最后广泛采用机器。在最后一章,马克思历史地宛如我们亲眼看到的那样,分析了资本形成的条件,说明了通过殖民的理论和实践的资本形成的过程。

(原载一八七二年五月号俄国彼得堡《欧洲通报》杂志,转译自一九六七年五月日本《经济》杂志增刊朱绍文译,漆琪生校)

《经济增长的限度》一书畅销一时

三年前,美国出版了一本题为《经济增长的限度》的书,其主题思想是:世界必须刹住工业和人口的增长,否则世界将冒在一百年内崩溃的风险。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达特默思学院一位三十二岁的青年副教授丹尼斯·梅多斯。此书出版后,适逢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经济危机接踵而来,因此这位原来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写的书竟然风行一时,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畅销书。此书现被美国许多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在各国已有三十种语言的译本,共销了四百多万册。

据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二日的美国《商业周刊》报道,该刊记者最近访问了这位畅销书作者梅多斯,要他进一步阐述一下该书的主要论点。梅多斯表示,美国早应在五十年代就制订出一个协调保存能源的计划,而现在的情况是廉价石油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美国必须在今后四十年内用煤和太阳能来代替石油和天然气。梅多斯提出要有长期计划,要约束生产和消费,并预言在十年到十五年内,美国的生活水平将下降,指出欧洲人平均每人使用的能量只是美国人平均数的百分之五十,认为美国人也应满足于那样的水平。梅多斯又说,现在人口增长的趋势是在三十年内要翻一番,而按照十二世纪时的人口增长率,要六、七百年才会翻一番。他认为世界上有些地区今天已处于部分崩溃的状态,不出二十年,世界上营养不良问题将变得更为显著。梅多斯还表明他反对象苏联那样由华盛顿集中制订计划,而主张由一些主要的大公司分散制订计划。梅多斯建议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他的一些具体建议包括要强迫限制汽车行驶速度,增加公共汽

(下转第 60 页)